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 沖繩札記

[日] 大江健三郎 著
陈言 译

论述了我一生的主题的，则是《冲绳札记》。我在书中试图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强大吗？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近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

于是我将焦点转向冲绳。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际，那个一直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是如何被纳入日本这个国家的？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冲绳和冲绳县民与日本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作为日本唯一地面战的战场的冲绳遭到美军袭击的冲绳战；我还论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的冲绳县民在战后的存续状态。

五年前，《冲绳札记》被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审判庭。在一审和二审中，我都胜诉了。现在正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

在五年审判期间，法庭内有勇敢而诚实的证言，法庭外则对这些勇敢而诚实的证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我被赋予信心的根据。

——大江健三郎，本书作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定价：19.80元


ISBN 978-7-108-03347-5
9 787108 033475 >



# 冲绳札记

[日]大江健三郎 著
陈言 译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冲绳札记／（日）大江健三郎著；陈言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2
ISBN 978－7－108－03347－5

Ⅰ．冲…　Ⅱ．①大…②陈…　Ⅲ．随笔－作品集－日本－现代　Ⅳ．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587 号

责任编辑　叶　彤
封面题字　张兆林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图　　字　01－2009－1889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6.125
字　　数　119 千字
印　　数　0,001－6,000 册
定　　价　19.80 元

# 中文版序言

## 最期待的翻译

《冲绳札记》中译本的出版，我期待已久。当我听说该书已经译完的时候，内心满是喜悦。

首先，《冲绳札记》中译本是最早的外语版本。而这是一本对我非常重要的书。在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开始写小说了。那时，我还没有下定决心是否把文学与自己的一生联系起来。

少年时期，母亲送给我一些书，我从中发现了小说。即便是孩子，也能感受到那不仅仅是娱乐之物。鲁迅的短篇让我理解了对人性的敬重。而我在大学开始学习法语的时候，以阅读让·保罗·萨特为主，也日益坚定了社会介入之心。

虽说从二十多岁就开始写小说了，然而我实在不能把握：通过自己的阅读学到的所谓“文学”和“文学家”的生活方

式，是否能在将来的工作中践行。而立将至之年，智力残障的长子诞生了。我打算与他共生，也决意去思考到那时为止自己作为小说家的生活意义。

于是就有了《个人的体验》这样的小说；接下来创作了《广岛札记》和《冲绳札记》这样的长篇随笔。广岛和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人类制造了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核武器，并且供以使用，也就是说，人类第一次面临灭绝的危机。但是我相信，在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人们趋于康复的生活中，以及在人类存续的未来，仍有希望的出路。我就写下了这种想法。从那时起，直到现在，废除核武器有多大的可能一直是我评论活动的主题。

而其中论述了我的一生的主题的，则是《冲绳札记》。我在书中试图思考的问题是：所谓“日本”这个近代国家是如何成立的？它果真强大吗？近代化的结果让它在（世界）、特别是在近邻诸国中居于怎样的存在？日本人真正吸取了战败的悲惨教训了吗？

于是我将焦点转向冲绳。在近代日本成立之际，那个一直处于特殊状态的独立国家琉球是如何被纳入日本这个国家的？在最初的情况调查中，我还接触到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他在中国的名字叫林世功，在琉球则被称为名城里之子亲云上）。

在这本书里，我写了日本近代化历史中冲绳和冲绳县民与日本和日本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日本的侵略战争中，作为

日本唯一地面战战场的冲绳遭到美军袭击的冲绳战；我还论述了作为美军基地的冲绳以及由美国返还施政权的冲绳县民在战后的存续状态。

而我也常常把“何谓日本人？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黯淡的内省”作为人的主题来追问，然而却被日本政治右翼批判为“自虐”史观，这是事实。不过，《冲绳札记》的写作与历经大约四十年的被阅读，使我超越了自我批判，构筑了积极的亚洲观、世界观同样也是事实。我打算扎根在自己的文学中、作为文学家来走完自己的人生。

五年前，《冲绳札记》被上述的日本政治右翼推上审判庭。在一审和二审中，我都胜诉了。现在正等待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因为在等待，我迟迟没写这篇序言，给译者和出版社带来了很大麻烦，我表示由衷的歉意）。

审判中论争围绕本书中所涉及的被日军强制集体自杀事件展开。很多幸存者的证言向忘记了（或者不了解）事实的日本市民传达了真相。在高等法院的二审中，有证言说，当时在场的少年，他耳闻目睹岛上那位可怜的审判长命令岛民说：你们不能死！审判长断定那是谎言。但是，怂恿做伪证的协力者们编纂的教科书今年重新被几所学校采用，这也是日本的现状。

我希望学习这种教科书的中学生们通过课堂讨论，能够去思考：在日本，以及在面对亚洲、面对世界的时候，将来如何成为不靠说谎去生活的日本人。而我也相信这样的希望是能够

实现的。这就是我现在的日本观和日本人观。在五年审判期间，法庭内有勇敢而诚实的证言，法庭外则对这些勇敢而诚实的证言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就是我被赋予信心的根据。

大江健三郎
2009年8月

怎样才能正气浩荡

当鲜红的血脉将我们牢牢地捆缚在历史之上？

老虎啊，你在我们所有人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彷徨

搅扰孩子的酣眠

我们果树园的梦中

是你不祥的足迹在猖狂

——朱迪思·莱特《火车》

# 目 录

# 序章　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而哀悼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凌晨，在日本青年馆，冲绳同乡会事务局局长古坚宗宪氏突然死去。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古坚宗宪不仅仅意味着事务局局长。日本青年会馆是古坚氏奉献自己的一生从事冲绳回归运动的据点，古坚氏之所以无法避免那天凌晨的火灾，是因为直到前一天深夜，他还在和从冲绳来到东京的同志交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古坚氏倒在了他终生厮杀的战场上。

我在这里想为古坚氏之死写下哀悼文章，并非是祈求他的灵魂得到安息。我们是无法使古坚氏的灵魂安息的。毋宁说，我如此呼唤古坚氏的那颗心，是在哀悼他的死之难以补偿。死去的人啊，请饱含着愤怒继续活在我们中间吧！请在怯懦地活着的我们中间继续燃起怒火吧！

青年馆五层浓烟滚滚，古坚氏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应该

有这样的一瞬：古坚氏从酣睡和头一夜的沉醉中清醒过来，目不转睛地看着在眼前向自己袭来的活生生的死亡。接到死讯，我的眼前立刻捕捉到这样一副形象：因为长年劳顿，从孩童般的体形内部渗透出的灰暗写在他的脸上，那张独特的面孔同时还充满了善意和温厚；他的身体臃肿滚圆，四肢短得让人感到有些滑稽。就是那样的古坚的身体，完全隐没在被浓烟包裹的床上，当他清醒地意识到的时候，恐怕一同向他袭来的还有狼狈、恐惧和无力感。濒死的古坚的样子牢牢地抓着我，我不禁热泪纵横。

然而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所想象的濒死的古坚氏的模样在本质上是错误的。在古坚氏生命的最后一瞬，占据着他那清醒意识的，既不会是狼狈和恐惧，也不会是无力感，那无疑是愤怒，强烈的愤怒。在那样的愤怒面前，我悲痛地流着的泪水大概就像滴落在烧红的铁片上的水滴，转瞬即逝。

我意识到这一点，是在守灵夜及遗体告别式上。尽管古坚氏的兄长宗淳氏靠着惊人的克制一直在压抑着自己，我们还会被他那每每迸发出的强烈的愤怒之声所吸引。它让人感到，只有努力地对死者的愤怒感同身受才能真正哀悼古坚氏之死。不过，从根本上说，冲绳人最为明确的愤怒，汇集到濒死的古坚氏那里的愤怒，那最沉重锐利的矛头，无疑在指向作为日本本土人的我们。回首古坚氏三十八年的生涯，有谁会否认这一点吗？我们对古坚氏之死的哀悼之心，连同羞耻心，无法不让自己陷入黯然凄惨的深渊。

从古坚宗淳氏的嘴里迸出了“羞耻”这个词。我想在他使用该词时的语调及内涵的意义上来使用它。在常乐寺的灵前守夜时，古坚宗淳氏跪坐在陈列着的花圈旁，他把脸贴在花圈的花上面，一动不动，就好像要把头埋进花圈的花丛中一样。那异样的举动触动了我。我觉得那是巨大的悲痛使然，因而不忍正视。不过，那样的姿态不是要发泄悲伤，而是因为蓄积着愤怒的意志。不久，古坚宗淳氏开始致辞。他说，这个“弟弟兼同志的宗宪君”长年生活在常乐寺，弟弟对宗淳氏“最后一次为自己洗脚”表示感谢。他的这种表达方式感人肺腑。接下来，更为让人震撼的，是古坚宗淳氏沉稳地控制住自己的声音的同时，对在冲绳当地和日本本土把古坚说成是具“被烧死的尸体”这种不实报道表示的抗议。

在遗体告别式上，致辞完毕的古坚宗淳氏走过出席哀悼仪式者的面前时，尽管同样保持着极大的克制，喉咙处却不由得哽咽起来。宗淳氏向来沉稳、坚强，在致辞的结尾处，当再次抗议“被烧死的尸体”这样的不实报道时，是那撼动他内心的愤怒的力量让他呜咽起来的。

古坚氏自参加冲绳回归运动、直至过早地离开人世，十六年来未曾在老家吃过一顿饭，也未曾睡过一夜觉。古坚氏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令人无限惋惜。而报道中一概写成“烧死”，就好像火灾的原因与死者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对此，古坚宗淳氏强烈地控诉道：这是所有从事报道的日本人的羞耻。尽管他对这不实报道进行抗议，却不见有任何干脆利索的更正迹象。这

难道不是“日本的羞耻”吗？宗淳再次满腔愤怒地说。

古坚宗淳氏是伊江岛的农民。童年时代他有过这样的经历：家中为了偿还债务，本来是想把他卖给丝满[1]的渔夫去当苦力的，无奈他连游泳的力气也没有。被逼得走投无路时，他决定与其死在丝满，不如早点死，于是大量吞食长在潮湿树干上的毒蘑菇。最后吃下去的全都吐了出来，终究没有让生命就此结束。他钻到床铺下痛哭起来。母亲曾一度铁了心要把长子抛出家门，现在也痛下决心，决定断掉抛弃孩子的念头。宗淳被留了下来。此后的岁月，为了那个大家族能维持生存，家人变卖掉四反[2]的田地，购买了面积比原来大八倍的荒地，通过栽培蔬菜来艰难寻觅活路。古坚宗淳就是这样一个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残酷劳动的农民。

古坚宗淳氏付出的牺牲得到了回报。古坚家次子宗明氏考入八重山高等农林学校。他不仅在学业上，在学生活动方面也非常优秀。但他在当地被应征入伍，其后死于冲绳战。古坚家三子十五岁那年加入铁血保皇队[3]，其后勉强生还。在古坚宗淳的培养下，三弟成为冲绳开洋高中和边土名高中的老师。当三弟立志要到本土学习时，兄长毅然相送。而三弟因为参加学

[1] 丝满位于冲绳本岛南端，渔业昌盛。——译注

[2] 日本土地面积计量单位。一反约991.7平方米。——译注

[3] 在太平洋战争末期，因为战局恶化、战争持久化而导致兵力不足，日本政府就动员大专以上的在校学生上前线，即所谓的“学徒出阵”（在当时的日本，一般人上前线被称为“出征”，这种有意识地用阶层区分的方法，是为了鼓励学生兵卖死命。参照田中正俊《东亚近代史的方法》，名著刊行会，一九九九年）。1945年3月31日，由1780名冲绳学生组成“铁血保皇队”奔赴战场，有一半死于冲绳战。——译注

生运动，回冲绳探亲的“护照”也遭到拒签。那么在弟弟投身冲绳回归运动的十六年间，在这个岛中央被掠夺建成基地的伊江岛上，作为贫苦农民一直维持着生计的兄长，从理论上讲也是冲绳状况的典型体现。为了给他这个把全部青春、乃至整个生命都投入到冲绳回归运动的弟弟湔雪污名，古坚宗淳氏发出了愤怒的声音。

面对那种愤怒的声音，如果那些日本人并没有从内心受到强烈震撼却试图去思索冲绳目前的状况，或许无法触摸到古坚氏致力探索的冲绳问题的核心。借助古坚氏濒死的愤怒，如果试图一直触摸到冲绳县民灵魂深处真正的、实际存在的深沉的愤怒，恐怕是无法减轻想象力的砝码的。

因为在人们看来，古坚氏是实践家，他是把政治当作人类的伦理问题来认识的，并以此作为行动的内核。与古坚氏相比，对政治更为敏感的活动家恐怕不在少数。但以我贫乏的经验而言，就像前面所说的，对于我来说，古坚氏虽然只是基于人的本性而行动的实践家，但他比任何一个常见的有魅力的、才能出众的、积极的、坚韧顽强的实践家都重要。并且恰恰是因为如此，才让人感到他的死实在难以弥补。濒死的古坚氏的愤怒在指向我自身的本性，使我不断受到难以逃脱的痛苦打击。

如果允许再就我个人来说说的话，我以为古坚氏是一个缓冲体，他努力使我们能够把政治现场的工作非常灵活地理解成为人的工作。关于冲绳的政治状况，我到底做了多少？反躬自

问，不禁又感到羞愧。古坚氏是那种甚至连我这种羞愧也能真诚理解的人。特别是关于广岛以及冲绳问题，在本土上幸存下来的我如果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可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清晰地意识到羞愧、犹疑的话，是不能在众人面前开口的。但是，在最初的主席公选中，为了屋良革新候选人[1]能赢得胜利，在冲绳和东京的集会上，我却藉着古坚氏登上讲坛，多次发表自己贫乏的见解。那时，我以为没有必要硬要去掉自己的羞耻和犹疑，也就是说，只有带着羞耻和犹疑才得以表达我自己的见解，在勇气自然而然地被赋予的情感中，才能够特别理解冲绳听众的反应。坦率地说，现在，我不得不再次承认，支撑着我的是古坚氏的温厚。然而同时也不得不承认在他那温厚的背后潜藏着最为强烈的愤怒这一事实。

我常说从古坚氏那里我能感受到作为多年老友的那份亲密。然而当我每每说到自己并不知道他生前是个酒豪时，古坚氏的诸多同志都会表现出诧异之情。我也是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有时还要找出那个讲述在苏丹的荒野村落里不断酗酒闹事的探险家的话——以此来表现人生的缺失，来表现被逼到绝路而绝望地自暴自弃这样的根源性不满——来作为自己酩酊大醉的根据。古坚氏偶尔也回冲绳探亲，但只是在码头跟与自己血脉相连的亲人见上一面。就像前面说过的那样，我和一直奔

---

[1] 是指屋良朝苗（1902—1997），日本冲绳县读谷村人，为美国治理琉球时期琉球政府及日本冲绳县的政治家及教育家。在琉球政府时代担任唯一民选的行政主席，并持续主张冲绳回归日本，冲绳回归日本后又担任了两届的冲绳县知事。——译注

波的古坚氏在那霸[1]的宾馆谈至深夜的情形也曾有过，当然也常常在东京见面，但是在一起喝酒的事儿一次也没有过。

怎么会这样？“你在假装真诚地说些什么呢？”我预先就料到会招来这样的嘲弄，那么我只好说，对于作为本土人的我来说，我是无法跟古坚氏一边喝酒一边讨论冲绳问题的，至少是无法在预感到喝到酩酊大醉的程度的时候来谈论冲绳问题的。在古坚氏突然死去之后，我遍访了他生前常去的几家酒馆，了解到喝醉的古坚氏是个易怒并且执拗的辩论家。我独自饮着泡盛[2]，迅速醉倒，我看到了愤怒的古坚氏的幻影，并且是清清楚楚地看见了向我本人异常愤怒地控诉着的古坚氏的幻影。回忆着与我有限交往中古坚氏的种种温厚，每个场景都带着明显的愤怒再次浮现出来。

我在原来古坚氏经常光顾的冲绳料理店、烧酒屋收集到的有关信息表明，古坚氏的形象并不仅仅停留在易怒的辩论家这一点上。有一位女子，她是比古坚氏担任班主任的那个年级高一级的学生，未曾直接师从古坚氏，后来到了东京，一直追随古坚氏。她证实，冲绳战爆发不久，古坚氏在冲绳外语中等教

〔1〕那霸位于冲绳本岛南部的西岸，面积近四十平方公里，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是冲绳县政府所在地。十五世纪以来，作为琉球王朝的首都首里的港口，在对外贸易中起着重要作用。一八七九年，由于在冲绳实施废藩置县，政治中心从首里移至那霸，那霸作为县政府所在地兴盛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冲绳战使那霸成为一片废墟。战后被美军接管。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以制陶业为突破口重新建设，人口也逐渐增加。一九四九年七月，美国文官管理政府从知念村移至那霸，那霸开始发挥首府功能。进入一九五〇年代，通过都市规划，在那霸形成了有名的中心商店街，被誉为“奇迹一英里”。如今，那霸是冲绳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译注

〔2〕琉球特产的烧酒。用黑麦菌发酵，原料主要使用泰国香米。——译注

员养成所[1]接受培训，即成为教师。他的确历经重重恶劣环境，但非常优秀。据说，古坚氏年轻时是位自然科学老师，他甚至发现过一个新的植物物种。

仔细想一想吧，在“钢铁暴风”中被烧成一片废墟的冲绳这块土地上发现新的植物物种，它的意义何等重要！我相信，这也是我要讲述古坚氏之志的必不可少的插曲。

然而，这位年轻教师在他二十二岁那年夏天，重新立志走新的学问之路，去了东京。他就读于两所大学——明治学院大学和东京外国语大学，并先后中途退学。当然，这个冲绳出身的学生并非因为成绩不好而中途退学，他是要为反对价格劝说[2]、贯彻四项原则[3]而组织国民大会，在本土打响冲绳回归运动的第一炮，并不断地把运动向前推进才离开校园的，为此他付出了自己的全部。而这大概也应该是这两所大学引以为荣的事情。

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凌晨，直到走完三十八岁的人生道路，在他倾注全部心血的冲绳回归运动的现场，的确有不少人见证过他所做的一项项工作。而所有的证言，都发自于那些对濒死的古坚氏之愤怒感同身受的人、或者希望能够感同身受的

---

〔1〕 养成所，是指规模比较大的培训机构。——译注

〔2〕 价格劝说的内容包括：承认土地费用的升值；返还不用的土地；确保军用地的绝对所有权，一笔算清土地费用；把新土地的接收限制在最小限度。——译注

〔3〕 是指保卫土地的四项原则（关于军用地处理的请求）：反对一次完成土地收购，反对一笔付清土地使用费用；进行适当补偿，每年支付土地使用费用；适当的损害赔偿；反对接管新土地。——译注

人。因此，我把唯一一次见证的古坚在冲绳回归运动现场的工作作为物证出示出来，大概也就足够了。努力地、饱含热情地向冲绳当地大量运送印有日本宪法的文件的，就是那个古坚氏，这就是一个事实。在得不到宪法保护的冲绳的今天，普遍弥漫着把作为武器的宪法当作政治想象力根基的思想——如果考虑到这一现实，有谁会怀疑：那个边土名高中刚满二十岁的自然科学教师，一定要从在焦土上生出的嫩芽中发现新的植物物种，这种坚韧意志在一直兢兢业业地往冲绳运送宪法文件的古坚氏的内心没有得到永生？

这位年轻教师的内心蕴藏着在焦土上寻找新的植物物种的激情。在现实中冲绳得不到宪法的保护。可以看出，宪法只是因为具有完备形式而看起来尚显体面，但被弃绝的冲绳人则拒绝伸向自己的本土的同胞之手。这位年轻的实践家硬是要从本土把宪法文件运送到冲绳，无疑，那常常激荡着灵魂的绝望的愤怒之火在他的内心燃烧蔓延着。我们不是应该再次承认那深沉而孤独的愤怒之火吗？

面对带着羞耻感意欲重新认识这些事实的人，愤怒的死者发出呐喊：用我那双在烟瘴弥漫的屋里睁开的濒死的眼睛，去坚定地表明推选屋良主席的态度吧！去倾听那伴随着B52轰炸机的爆炸燃烧而产生的活生生的恐惧的冲绳的声音吧！在冲绳人的土地上去听一听要求美军撤退而进行大罢工的核基地上的冲绳民众的声音吧！死者还发出呐喊：再去听听那些强权者的声音吧！面对为了“保命”而采取最低限度自卫的民众，美国

强权却通过颁布综合劳动命令加以全面拒绝；而在厚颜无耻方面与美国不相上下的、现在、也始终是露骨地炫耀自己的我国驻美大使、外相，也就是日本的强权，面对冲绳民众的意志和他们对当下和未来生活的定位，却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

作为拥有这样的日本国选举权的民众，我们哀悼古坚氏之死，除了怀着羞耻的自觉的同时，努力让死者那最为黯然的愤怒感同身受，愤怒于死者的愤怒，让那用组舞《大川讨敌》中“死不瞑目”这样的语言所唤起的愤怒感同身受，愤怒于作者的愤怒，还有别的可能吗？而且，如果说他那最为沉重、最为尖锐的愤怒之矛不是在指向我们自己，还有别的可能吗？但是，我们是无法因此让古坚氏的灵魂得到安息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

# I 日本属于冲绳

我为什么去冲绳？这个从我自己内部发出的声音，与那来自冲绳的拒绝声“你为什么来冲绳?”互相啮咬着，要将我撕裂。你简直是个废物！饭桶！两个声音同时在说。就那样去（来）冲绳容易吗？诘问不断。我暗自思量，不，对我来说去冲绳是不容易的。我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每次去冲绳，都会遭到从那里疯狂袭来的理应拒绝我的压力。形成那拒绝的压力的，是历史，是现状，是人，是事物，是明天的全部。而压力的焦点，则是在多次冲绳旅行时我所领承的最爱的人的绝对的友善以及与之交织在一起的强烈的拒绝。问题因此棘手起来。

我是为了更深刻地了解他们而去冲绳的。然而，所谓的更深刻地了解他们，也就是近乎绝望地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会很友善并且断然地拒绝我。即便如此，我还是要去冲绳。我时常感到，我能够用完全客观的视野捕捉到自己，就像我能用自己

的眼睛来眺望那个落荒而逃的自己的背影。这个废物、饭桶——我冷静地观察——很可怜，很寒酸，赤手空拳，我没有什么渊博的学问，也没有依靠行动来超越现实壁垒的经验，我只是患了热病而渐趋衰弱，却像是受了什么驱使一般，还是要钻牛角尖，奔走不息，苦思不断：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那家伙活像一只早早地从自己的势力范围里跳出去的水老鼠，或许会有失体面地瘫倒在广场中心吧？真是可笑。但是那个家伙自己折腾着自己，把那算好了的账单统统记入他的名下，并摇摇晃晃地跑来跑去。正因为如此，尽管他脑袋中的命题有多么不自量力、夸大其辞，那也都是那个废物、那个饭桶的自由。

实际上这些年，特别是最近一年间，我发现自己就像是无能的胆小鬼，露着瘦削多毛的小腿，虚张声势，苦苦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如果那个时候对着镜子窥视自己，那里一定会出现一副贫血的面孔，是因为衰弱而非亢奋，被发烧弄得神志不清，那么这个时候我大概会从镜子前悄然离开吧。有时觉察到自己在茫然地、或者是黯然地思索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些问题时，不禁露出连自己都会感到讨厌的冷笑。某天凌晨，古坚氏突然死去。他生于冲绳、长于冲绳，他的死也清晰地昭示了冲绳。接到他死讯的那天凌晨，我想到自身的死亡问题，想到袭向友人的死有可能也正伺机袭向我，那如死亡的恐惧一样的恐惧、无力感、孤立感

和悲观情绪扼住我的喉咙，让我不顾体面地流着泪水：在死亡来临之前，对“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能交出自己的答案吗？

之所以这么写，是因为前往冲绳时，我肩负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命题，我试图去弄清楚。就像前面说的，那属于日常生活空间。正因为如此，对于我个人而言，我才违拗着内心犹疑的声音以及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或者也说不定甚至是借助那种抵抗感，切实感到有必要反复出发去冲绳。当然，我并不是要以这样的开头来为自己准备任何意义上的免罪符。并且，也不打算要以忏悔者进行忏悔的方式将写作继续下去。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继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以及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并且他们也不可能真正地忏悔。来自冲绳的拒绝的声音，不用说就是对假的免罪符、对死死纠缠的忏悔意向做出的清高严正的拒绝。从个人角度上说，在我就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叙述中屡次犯下的错误，自己也不能没有察觉。即使局限在琉球处分之后的冲绳近现代史，本土日本人关于冲绳以及冲绳人的堆积如山的观察和批评中，不论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的确存在大量恬不知耻的歪曲和错误。这无疑是对冲绳的歧视，更是日本人对自己最可憎的特性进行的自我宣传，是诸如此类的歪曲与错误。

那关乎日本人特性的歪曲和错误，也不能说与我毫无干系。坦率地说，每次对冲绳所进行的恬不知耻的观察和批评，

那就是我自己的观察，那就是我自己的批评，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常有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冲绳之旅终究没有走出个人的视野也是确凿的。尽管如此，它却让我从悲观主义深渊的尽头艰难地升腾、突破，思考着“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命题。

我最初的冲绳之旅是在一九六五年春天。至少对于飞往那霸的飞机上的我而言，因为无知，因为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冲绳只是作为概念而存在，我无法把握它的实体；也因为我还没有建立起自己与将要着陆的那片土地上的人之间的联系，这层层防御网造成了我内心的犹疑和来自冲绳的拒绝。我一度动摇又回到原状，甚至没有觉察到，我们必须反复地进行难堪的自省。那时候我只是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

但是，在结束预定的旅行计划之后，我再也无法做一个天真幼稚的旅行者了。我独自留在那霸，在与现在的冲绳休戚相关的感觉缠绕中，我写下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承认，“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已然在我的脑海里萌芽了。文章开头这样写道：

> 不论哪个国家，不论什么样地方，那片土地上的人最为昂扬美丽的时候，他的美在很大程度上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任何独特的地域特征都会在他那富有魅力的外表鲜明地呈现出来。反之亦然，那个地域的人

最为猥琐丑陋的时候，他的丑陋同样与他的身躯和容貌的地域性特征有关。也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国家、一个地方的地域个性，与当地人的美丑紧密相关，大概宛如盾的两面。若说我们是美的，那与日本这样的地域个性相关。若说我们是丑陋的，那丑陋则集中了日本人地域特性中所有的负面要素，实在是日本人才具有的。

那之后不久，我就远远超出用“日本人特有的丑陋”这样仅仅指涉容貌范畴的词语来加以认识。这是我现在思考的发端。我感觉到，正因为那是冲绳，才会引导我对它抱有这样的认识。这种认识又与更多的问题相关联，将我逼进没有出路的死胡同，在尽头处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让我发出无力叹息的问题。

在胡差市[1]的少年教养院，我曾和教官一起从探视窗窥视单身牢房（那之后不久，对从探视窗窥视这件事本身的记忆常常让我陷入不安），看到一个少年一动不动地坐在没有任何铺盖的地板上。“为什么把你关进单身牢房？”面对教官的询问，少年回答说：“我反抗了。”当听到少年的声音时，我内心一阵感慨，于是写了这篇文章的一节，以倾诉我的触动。那里的训练设备本来就匮乏，却收容了超出规定人数两倍的少年。

---

〔1〕 胡差市，曾经是冲绳本岛中部的一个市，原来该地叫“越来”，“二战”后由驻日美军更改为“胡差”。一九七四年一月与美里村合并成冲绳市后，废除了原胡差市的名称。——译注

于是我就有了这样的假设：那到处破损的铁丝网内的秩序之所以能够勉强得以维持，难道不是在仰赖那些教官——在被收容的少年这样的年龄时，他们被迫参加了令人绝望的毁灭性战斗——异乎寻常的努力吗？不是在仰赖为了回报教官的努力而克制自己的失足少年吗？

我这样写道："在塞满成倍超员的少年教养院，如果引发暴动，想必是很容易的吧。可是少年们，那些失足少年并不去主张作为失足少年应享有的权利，连那寒碜的设备也忍受着，在循规蹈矩地适应少年教养院生活的背后，对那样的教官们怀有男子气概的友情，这样说应该是可能的吧？"一九六七年秋天，当我重访冲绳时，不得不即刻纠正自己在这篇公然表露多愁善感、满怀祈愿的文章里所犯下的错误，在那里，将自己的错误连同多愁善感的祈愿一起亲手埋葬掉。我这样写道："我有这样一种感觉：那个危险的平衡被打破了。今年已经发生了高达三十五起、一百四十九名失足少年逃跑事件。不仅如此，教官也不得不开始觉察到，他们已经对失足少年的抵抗束手无策。包围着教养院的铁丝网明显遭到严重破坏，他们正在想方设法修复，那是黑社会为了夺回自己的干将而公然袭击的痕迹。"

我只是又写了订正这些错误的文章，却没想到就像被这个错误的钉子划破自己的皮肤一样，第二次到少年教养院时，我不得不遭遇到这样的问题，最终也没有答案。我不能自己犯下错误却毫发无损地逃掉。在那霸的宾馆，我反复阅读再次访问

这个琉球少年教养院之后写在札记上的各种片断，让我清晰地想起那个夜晚，为了赋予深陷混乱的自己以一种形态，我尝试着去提炼诸如小说轮廓之类的东西，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不眠夜。而一旦开始写小说，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承认，自己只是个尚未修行到家的低级学徒在从事小说创作。尽管如此，在想方设法去克服自己内心黑暗的时候，作为写小说的人，我发现自己正依赖于所谓的职业惯性。

总之，我在札记上记下这样的假设：在胡差或者是那霸的街角，和那位在单身牢房里睁着混沌的双眼回答说“我反抗了”的少年相遇了。我曾经从他那丑陋的根源里看到冲绳人的地域性个性，如今它与那晶莹的目光一起，鲜活地构筑了失足少年的容貌之美。正因为我曾经有那么一次从探视窗口俯视过这个被塞进单身牢房里的他，他要死死地抓住我的肩膀、要发起与我的论争，我没有拒绝的权利。他会责问道：你当真以为我们失足少年有作为失足少年能够要求的权利、而我们却并不主张、偏要忍耐吗？为什么我们必须忍耐？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对关押自己的教官抱有男子气概的友情？为什么我们不去轻易发起暴动而必须坐在单身牢房里？你说我们冲绳的失足少年不发起我们的暴动、不主张任何权利，对什么都忍受着，即使是对关押我们的教官也抱着友情，还不都是在虚构，以使本土日本人肮脏的灵魂得到安宁。不是吗？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我与这位进行控诉的少年并没有相遇，但是在其细节处都清晰可见的幻影中，每每看到与他长得

酷似的冲绳少年，这种控诉的声音就会在我的内心回荡，久久不消逝。今年春天，也就是一九六九年四月，我乘船去冲绳。与我住同一船舱的那个美国人是个性倒错者，这一点谁都看得出。我并不是要非难性倒错本身。他们大概有他们的自由和地狱吧。然而这位自称是在东京从事外语教学的人，却将几个也许是从冲绳到本土集体就职的、正逢假期或者也许是度假归途中的人诱入船舱。而这几个人是已经走入社会开始工作的少年了。那个美国人最初态度还很暧昧，渐渐地开始明目张胆地试图去引诱他们。

我坐在四周挂着帘子的床上，听着正在上演的诱惑剧中不可思议的语言往来。开始进行的是单纯的英语会话。这是撒下的诱饵。然后，那位外语教学专家将会话切换成日语。于是诱惑更为露骨。这时，其中一个冲绳少年不知为什么，竟拉开我的围帘朝里面窥视。恐怕是那个诱惑者的态度让他发觉一股煽动不安的苗头，让他嗅出船舱中有蹊跷的味道。碰巧诱惑者走出船舱去买小道具可口可乐和罐装啤酒。我提醒留在那里的冲绳少年。然而他们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于是开始用冲绳方言交谈。不久诱惑者回来了。每当他表现得更加露骨时，我就能察觉他们用流畅的方言相互表达着不安和勇气，但他们还是留下不走。罐装啤酒喝得太多的冲绳少年呕吐了，我趁机按铃叫来船上的服务员，一出激情戏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谢幕了。我一直在等待时机，一旦那个美国人真的超出单纯的语言诱惑，开始对冲绳少年进行性倒错的初步训练，我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我会警告他们：进行充满色情暗示的诱惑的美国人有着怪异的性嗜好，你们就像要受到袭击的小姑娘一样。然而在少年们的眼里，与我这个向他们发出警告的本土日本人相比，那个美国人倒显得更为亲近。于是，当少年们嗅出异样的气息时，他们完全不向我求助，相反，用我所不能理解的方言交换着信息，互相加剧着那份紧张感。

如果将其幻化成那位失足少年的语言，可能就成了这样的诘问：你认为你有道义上的权利，来妨碍我们和这个美国人在喝可口可乐和罐装啤酒中享受一时的快乐吗？你是真心想把遇到危险的我们从和那美国人危险的关系中解救出来吗？你干吗要满脸忧伤地躲在那里？因为回故乡，他们穿着新近流行的衬衫和裤子，俨然是与装束相般配的华丽美少年。客观地讲，他们那种在小小的冒险中寻求乐趣的劲头十足。

六月十七日的报纸报道说：为了那些在全军劳[1]罢工中遭到美军武力镇压而被刺伤的人，为了抗议那明显指向自己的刺刀的现实，召开“抗议武力镇压全军劳县民大会”。“大约百名第一次真正动用棍棒、铁管的学生和部分工会会员试图闯入司令部，猛烈投掷石块，与机动部队反复冲突，不断有负伤者出现。”第一次真正动用棍棒、铁管，不是在冲绳民众遭到刺刀刺伤之前，而是在对此进行抗议的集会上，这一点必然会铭刻在民众的记忆之中的。但是，现在我想唤起注意的是，在该

〔1〕 全军劳，即“全冲绳军劳动组合”的简称。——译注

报纸同一天的社会版面，登载着“冲绳三少年是强盗”这样的新闻。

他们与那个被关押在单身牢房里的失足少年的年龄相当，与在性倒错的美国人的诱惑剧中配戏的少年的年龄相当。这些那霸市出身的少年，应该与大多数本土出身的人一样，能够说标准话[1]。他们在横滨的铁工厂集体就业。按照报纸上说的，“但是，由于语言差异，也由于和同宿舍的员工相处不融洽，心生厌烦”，于是离开铁工厂来到新宿。他们在东京这个新的消费文化中心需要金钱，就用在工厂自制的匕首恫吓甚至伤害过往行人，以夺取些许钱财。

语言差异。我不得不停留在报道者这一简单描述之上。那霸市与横滨市少年的“语言”并无相异之处。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相异之处。但是，因为在同一宿舍里，那霸市少年遭到孤立，他们被迫抱成团，因此为了拒绝自己圈子外的其他人，他们重新使用冲绳方言，采用那种只有被孤立的人之间才能够沟通的方式。因为我在去往冲绳的船中经历过这种奇妙的事情，可以从中类推出来，恐怕这也是切合实际的类推吧。少年们拒绝了所有本土的日本人。为了从“繁荣的日本的消费文化”那里获得遭到断然剥夺的市民权，他们亮出在受到孤立的铁工厂里自制的匕首。我感觉到，那自制的匕首对准了我。

---

〔1〕“标准话”是日本近代言文一致运动以来，以东京的山手语为基础方言形成的现代日本共同语。该词是日本的英国语言学者冈仓由三郎（1868—1936）从英语的standard language直接翻译过来的。——译注

幻象中的失足少年责问我道：你们究竟打算如何处置这些你们用那引以为豪的强大警力轻而易举地逮捕了的少年？打算把这些初次违法的少年遣送回冲绳，关押在那个反复发生逃跑事件的琉球少年教养院吗？他们也只是将自制匕首的制作方法当作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对这些少年来说，所谓日本到底是个怎样的现实场域呢？我甚至产生了这样的错觉：美军晃动着刀剑向冲绳人传递的信息，不正是由那些少年用自制的匕首试图传递给本土日本人的信息吗？但是，“冲绳”果真用刀把“日本”砍伤了吗？还是恰恰相反？

日本啊
祖国啊
到了如此程度的日本
面对我们的叫喊
背转过那张无赖的脸
冲绳的海
日本的海
隔开它们的
北纬二十七度线
消溶在波涛中
就像一把大刀
朝我们的心头
砍来

与这首诗的作者相遇，也是在一九六五年春我的第一次冲绳之旅中。在去冲绳旅行之前，我对这位诗人略知一二。他是创立于一九五〇年的琉球大学的第一届学生。那一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了大意为“美国的安全保障线是阿留申群岛、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演讲。就在同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冲绳被重新委以赤裸裸的“美国安全保障”基地这样的重任。从学生方面来讲，作为琉球大学的缔造者之一，这位诗人的入学别具象征意义。他参与《琉球大学》的创刊，在那里除了发现作为诗人的自己之外，还逐渐意识到，在他的内心还有更为丰富的东西。

在核基地冲绳，通过在那霸市街头举办原爆展，第一次将广岛、长崎经历的原子弹轰炸的悲惨状况（有很多人从冲绳到广岛和长崎工作，被炸后返回故乡，他们的原爆症完全得不到专业治疗。他们是活的见证人，但却不能获得有关原爆症的正确知识。几乎所有的冲绳受害者都保持沉默。毋庸赘言，就在这种沉默中，在新的核备战基地冲绳，不少人没有得到赔偿就死掉了）。公之于众的，就是琉球大学的学生。冲绳民众在战后发起的第一次全面抵抗运动是一九五六年的土地斗争。在这场斗争中，琉球大学六名学生受到退学处分，一名受到停学处分，其中就有四名是《琉球大学》的同仁。《琉球大学》就是这样一份杂志。

这位诗人离开琉球大学和《琉球大学》杂志，去了冲绳当地一家报社。我和他当时是在石垣岛见的面，那时他是报社分

社的负责人。从在《琉球大学》上写诗的时期起，就创作以石垣岛为中心的各个离岛的风土记，到协助喜舍场永珣氏完成《八重山民谣志》的一九六五年，他始终保持一贯的个性。

我对于冲绳回归运动的意义几近无知。诗人恳切地向我讲述：当时不仅在石垣岛，在冲绳本岛也都抱着难以摆脱的“回到母亲怀抱”的想法。然而，无论是纵观历史、结合实际，还是展望未来，这种想法都不过是一种欺骗。在诗人过去的同事里，有一个青年，他的父母中的一方出身本土。比起自己的冲绳血统，那个青年更愿意把自己身上属于京都或奈良的血统看作是自己血统的核心。诗人谈起这些时，绝对不激愤，但饱含着强烈的嫌恶感。诗人自己就有个出身本土、从事教育事业的母亲，他是一个对自己的冲绳人身份能够正面接受的人，并且一直以石垣岛为据点来清楚地审视冲绳本岛以及日本列岛。

在日落后的一片黑暗里，仿佛让人感受着这样一种体验：柳田国男[1]、折口信夫[2]和伊波普猷[3]的想象力，连同住在那里的民众的共同想象力一起，在黑暗及对面大海的涛声中完

---

〔1〕柳田国男（1875—1962），民俗学者。生于兵库县。毕业于东京大学。曾担任贵族院书记长官，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创立民间传承会和民俗学研究所。著有《远野物语》、《蜗牛考》等。——译者注

〔2〕折口信夫（1887—1953），日本文学研究者、和歌诗人。出生于大阪。毕业于国学院。国学院和庆应大学的教授。他把民俗学导入国文学，开辟了国文学研究的新领域。作为和歌诗人，以释迢空这个名字广为人知。主要著作有《古代研究》、诗集《古代感爱集》等。——译注

〔3〕伊波普猷（1876—1947），语言学家，民俗学家。生于冲绳，毕业于东京大学。主要研究琉球语言、历史、民俗。编著有《南岛方言史考》等。——译注

美地发挥着。八重山那个夜晚，我从诗人那里受到的感动至今仍然能够鲜活地复苏，栩栩如生。在冲绳，“五一”劳动节集会在白昼是被禁止的。进入夜晚，人们则开始集会庆祝。在听着广播里肆虐石垣岛的台风讯息——这讯息有可能是他用电报发出去的——的深夜，诗人所歌唱的黑暗中的“五一”节连同石垣岛上那绝对的黑暗，占据着我的内心，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挥之不去。

在黑暗中
旗帜飘扬。
涂上漆的
悲痛的旗帜
带着同化在黑暗中的憎恨
飘扬着。
雨
为了让夜更黑
哗哗不止
制造着比黑暗更黑的夜。
这时
翻开屈辱的历史
暗淡的旗帜
忍受着夜的沉重　飘舞
飞石般的雨撞击弹起

为把那鲜血收回到自己的掌中

昂起头

齐声唱那无歌的进行曲

也就是在一九六七年秋，我再渡石垣岛，尽管不得不反复更正自己在第一次旅行中所犯的种种错误，但我断定，即使在这痛苦的第二次旅行中，只要是与诗人有关的印象，没有任何必要改变自己的看法。他在坚持，平静而坚韧地坚持着。

我搭乘他的吉普车，去见一位四十五岁的原子弹受害者。他在澡堂里干着用柴油烧锅炉的工作。此人是从海军被派遣到长崎的鱼雷工厂工作期间遭遇轰炸的，体内到处都钻进了玻璃碎片。他回到故乡多良间岛，忍受不了在那贫瘠土地上繁重的耕作劳动，也尝试过驾驶混凝土搅拌机，此后到了现在为澡堂烧锅炉的工作。远眺着用灰浆加固的红瓦屋顶、用竹子葺的草屋顶，和满是黑色石垣的藏青色的海，这个生活在几乎不能使用原子弹受害者手册的环境里的受害者开始讲述。

有一个五十一岁的农民受害者，在长崎遭到轰炸后引发肝脏疾病，他放弃去照管菠萝园、甘蔗园，以及稻田和家畜，但是要到广岛的原爆医院就等于经济自杀。他的妻子一边照料在小连翘丛中吃草的马，一边说道。当时，隔着太平洋，佐藤[1]

---

〔1〕佐藤是指佐藤荣作（1901—1975），政治家，山口县出身。岸信介的弟弟。毕业于东京大学。1964—1972年，三次组织自民党内阁。在任中实现冲绳回归。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注

和约翰逊[1]正举行会谈。然而，回归问题自不待言，这些冲绳受害者一直无法获得真正治疗原爆症的机会，这就是事实。而关于冲绳那片土地上的核基地问题，我的推测更无法乐观起来。我被夹在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以及那不带任何幻影、从石垣岛上正视冲绳本岛和日本列岛的诗人中间，大概无法不感受到自己是个多么无能的废物、饭桶。这年春天，我又见到了诗人。他在继续着自己的坚持，同时也说有必要拒绝，必须拒绝日本、拒绝日本人。你为什么来冲绳？这种明白无误的诘问，无疑可以用“拒绝”这样的词来表达。丑陋的日本人！这种控诉也不过是寻求连带感的伪装。“拒绝是出发点”。诗人温厚地微笑着说。我却笑不出来，那让我受到强烈打击的信息，我能理解。

我想起在美国曾与核战略专家谈话时的那种奇妙体验。他用铅笔描绘出远东地图，然而那地图上日本列岛竟然小到不足冲绳的十分之一。那在核战略专家的头脑中无疑是理所当然的地图。在核时代的今天，若论所付出的牺牲与所受歧视的总量，冲绳确实几乎涵盖了整个日本，并且支撑着超出这些的庞大重负。诗人站在石垣岛上，用不带有任何幻影的拒绝的目光瞭望着东方。在他清醒的意识里，大概也可以透视出，今天日本这个实体遮蔽在冲绳这一存在的阴影中。并且正因为凭借着

---

[1] 约翰逊是指林登·贝恩斯·约翰逊（Lyndon B.Johnson，1908—1973），是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在外交上奉行前任总统约翰·肯尼迪既订政策，使越战不断升级，由于美军在越战中伤亡惨重，其政策遭到了国内外普遍反对。——译注

从属于冲绳，才能显示出今天它这样的“伪”自立。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我那颗贫弱的心已经思考得疲惫了。在到达冲绳机场、走出港口的时候，在我意识的地图里，日本也属于冲绳。

（一九六九年六月）

## II 《八重山民谣志》’69

想到有一个人，是位诗人兼记者，他站在石垣岛上，注视着冲绳本岛和日本列岛。对友人的思念让我的眼前浮现出他的神情、举止。在以石垣岛上各种瞬间风物为背景的画面上，那个男人皮肤浅黑、身材矮小，内省的眼神里交织着严谨和机敏的幽默。他的确是这样一个人。然而，我印象中的他公然流露出自己沉重的愤怒和强烈的紧张感，渐渐地幻化成石垣岛上那个在漆黑的夜晚眺望大海的男人，让我心生畏惧。他用异常激越的言辞，不断向我发起声讨，直戳我最脆弱之处。我也不试图反驳，并且认为必须把那看成是真正的打击。那段时间里留下的痛苦回忆，宛如难以愈合的心灵的创伤。他外表温和沉稳，然而实际上每当与他的作品接触，我都会感觉到那伤口在作痛。并且那种痛，就是我詈骂自己是个废物、饭桶一般内心充满自我嫌恶的痛，是像自己患了难以启齿的疾病那样的痛。

我并不想夸下海口说，借助自己的这份痛，大概就把自己与那位诗人的愤怒与绝望之深连结在一起了。恰恰相反，那种痛，无疑是一种他明确拒绝接受我的刺痛。

现实生活中见面谈话时，他总显得温厚而寡言。第二次见面和接下来这年春天的见面，以及那霸那里已经是夏天的第三次见面，这三次见面说的所有话，也远远没有超过初次见面时的谈话。他以初次见面时的谈话维系着彼此的交谈，继续坚守在石垣岛。再次相见时，面对沉默寡言的他，我只得承认，从他那里听到的话语渐趋凝重，矛头直逼我的要害，让我很难躲闪，就像接种过某种起决定作用的疫苗的人来向医生报告其后的病情。

实际上，从诗人的角度说，有什么必要去大量增加新的语言吗？关于冲绳和本土的状况，他所持的观察和批判的基本方向并没有改变，只是那种状况中蕴藏的毁灭性毒素更加切实了。为什么非要去说那种简直是徒劳的新的语言呢？你是发自内心地在听我说并且改变自己了吗？他要是这么质问我有多好！然而相反，他只是微笑着，不说几句话。这比被震怒的男人狠狠地揍一顿还厉害，我受到了致命一击。然而如果没有这一击，我便无法面对他那温和的神情及其背后所隐藏的东西。

现在，在诗人的内心，有怎样的存在，那种存在如何像泉水般汩汩地涌出？而涌出的东西又如何像火山凝固般，成为确凿可靠的核心？他一边发挥自己的诗人特质，一边协助喜舍场永珣创作《八重山民谣志》。他发挥着执拗的报社记者的才能，不仅仅

局限在石垣岛，而是围绕所有的离岛进行创作。为便于表达，我将他在《冲绳时报》上连载的《新南岛风土记》与《八重山民谣志》对照阅读，进行具体阐释。我初次见到《八重山民谣志》便发觉，在书中注释的细微之处潜藏着定位明确的信息。于是我便依次翻阅旧《冲绳时报》，重新去全面地触摸那些信息，于是不仅诗人本人，还有喜舍场永珣这位老学者——勉强要说的话，是八重山的民众在历史和现实的连结点上霍然起身唱响的所有的歌，这一切好像都出现在了眼前。在这种感觉中，我理解了。

崎山小调是原歌[1]的一种，在八重山、特别是西表岛依然很流行。这部《八重山民谣志》非同寻常的价值大概在于，它牢牢地扎根于历史，同时是集直到今天依然保持勃勃生机的民谣之大成。说到它保存至今，我想若就冲绳民谣而言，是说三味线音乐的确至今流传，而且民谣超越了历史的局限，其内容与今天的状况遥相呼应，让它从本质上不致成为死去之物。总之，崎山小调在原歌中是这样开头的：

崎山上
建新村

[1] 所谓“原歌”，是指原谱既没有被换词、原词谱也无引用的出自原典的歌，在日语中也写成“本歌”。——译注

若是把它用散文形式翻译出来，也就是将换行处和断开的段落连接起来，它就是一首包含如下内容、长达二十四段的长歌。

创建崎山村这个山村的是哪位官员？是谁、在什么情况下、出于什么理由去建新村的？正因为有野浜口这样的良港，还有肥沃沙地的平原，就下令从波照间岛和下八重山岛强行移民二百名女子和八十名男子。正担心着谁谁谁，牵挂着某某某，我也成了其中一人。这个那个都被强行移民。行行好吧，行行好吧，官人啊，饶了我吧，请可怜可怜我吧，官人啊。也不是我个人意见，我也不想这样，是可敬畏的国王的诏令，因为是国王的诏令，所以是绝对的，你逃不掉的，我也没法可怜你。

天降大雨，雨滴不停，会被淋着吧，戴斗笠，披蓑衣，能防雨吗？哭啊哭，嚎啊嚎，移民命令来了，登上休息的山顶，登上游玩场所，眺望父母岛波照间岛，想看一眼生我的故乡，想看一眼生我的母亲的面容，真让人怀念啊。凝神一看，眼泪噗噗地往下掉，泪眼迷离，伸出手，却在遥远的海边，遥遥不可及。哭了一场又一场，心不甘，情不愿，还要回到移居地，住下来了，日复一日，居住的崎山村，生活的岛屿啊，也成了安居之地。

除去民谣本身的语言构成与音乐风格部分，注释中还标

注："因为在西表岛西北部没有村落，为了监视异国船只、救助遇难船只，由于有被称为野浜（别名果肉地）的肥沃土地和良港，为了开拓肥沃的沙质土壤的平原和良田地带，基于调节人口的四项条件才断然进行强制移民。"如今，村庄已经荒废，只剩下这首歌在讲述与今天相联的历史。"崎山废村东接崎山港（与那国），从海岸线开始就慢慢倾斜，哪里是能建村落的地方？还有那疟疾横行，就用歌谣来见证废村的悲剧吧。"这首歌是被带到波照间岛的人唱的。如果不把其他岛屿的移民人口算在内，这个岛"在创立之初人口是四百五十九人，七年后的宝历十一年（一七六一）人口减少至三百八十二人，由于完全不具备卫生设施，风灾、饥馑、旱灾、传染病疟疾的侵袭，人口逐年减少，明治六年（一八七三）骤减，仅有六十四人，在昭和十七年的调查中，人口仅剩三十八人"。从十八世纪中叶截止今天，划出一条悲惨的粗线。

在以诗人身份协助这位老学者工作的大致同一时期，他还作为报社记者来到西表岛。"虽是一个岛，却因层峦叠嶂而将岛的东西部隔断，往来断绝，成为孤岛。"他就到这座岛上野猫潜伏的原始森林中进行实地调查。他关注着"废村之路"，关注着"因强制移民建起新村，在地方病疟疾的淫威面前消亡的悲惨历史的遗迹"。他并不设定日本本土人为听众，而是明确地面向冲绳本岛人，以自己的犀利进行揭露，试图传递西表岛的状况。而冲绳本岛人向来以为，国土之上没有真正的山地，所以很明显，他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向冲绳本岛人清晰地描绘出山峦

起伏的西表岛的状况。“冲绳本岛人称呼八重山为‘雅克伊’。所谓‘雅克伊’是自古以来让众多八重山人饱受折磨、夺去众多人命的地方病疟疾。”这位在西表岛潜心调查的诗人、报社记者以这种方式，明了地揭示出冲绳本岛和八重山的隔绝状态。

由于强制移民，“自宽永十四年（一六三七）至明治三十六年（一九〇三）的二百六十余年间，靠‘人头税’将八重山人民榨取得一穷二白。极端罪恶的制度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痛苦，他们悲痛的呼声被编成许多民谣传唱，流传至今。”说起这些，如今岛上居民咏唱的民谣唤起他诸多感慨。

当然，并不是说，在他由八重山向冲绳本岛发出质问的过程中，我是在听不到质问声的地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在八重山举行民意总统选举。在成立八重山群岛政府之际，他从以喜舍场永珣氏为中心创作的《八重山历史》一书中引用如下一番话：“琉球沿袭了萨摩巧取豪夺之手段，采取了人头税这样苛刻残酷的榨取手段”，径直将声讨的矛头指向日本本土。

在他看来，最有魅力的民谣是西表岛的“沙蟹小调”。小调假托沙蟹，表现了被压迫民众“对压迫者的尖锐讽刺”和“以庶民独有的幽默为母胎的讽刺”。在西表岛驿站里昏暗的油灯下，这首民谣浮现在他的眼前。这首歌唱的是：沙蟹不如蟹中的梭子蟹强大健硕，想到自己的大蟹钳要被踩烂，它就反复盘算怎样才能安全脱身，要不要逃到呼吸根延展张开的红树里去。诗人、报社记者将这首民谣与现实叠合在一起，再次揭示了八重山民谣的整体面貌。在引用伊波普猷的话的同时，他也

发出自己的感慨："'并非仅止于八重山人，在四百年专制制度下，南岛人呻吟着，尝尽孤岛苦难。'也就是说，它倾诉的冲绳人的心情，不也同样适用于今天的我们吗？"

就在这位诗人兼记者的友人的只言片语与沉默之间，裹挟着一股强大的压力，那大概姑且可以置换成上述文字。然而，他的执著——那即使在沉默时也不会消失的语言，在背后支撑着上述文字，那不是一些报纸上刊登的匆匆过目就会忘记的东西，它总是同时存在于他的寡言少语与沉默间，让人一遍又一遍地去感知、去体会。他所揭露的状况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由于一度的伪装、掩饰变得更为严重了。这些事实让他的控诉填充进更为强烈的起爆剂。他温厚而沉默，不会发出令人惊恐的叫声，只是去追问：你果真能理解那不过是沙蟹的我的话吗？我表示怀疑。今天本土的日本人中究竟有谁愿意去理解沙蟹的话呢？而我也常常去想这个问题。

从令人怀念的追忆中只需迈出一步，在我的心目中，诗人兼记者的新川明氏就渐渐地幻化成石垣岛上那个在漆黑的夜晚眺望大海的男人，成了拒绝的现实化身，公然流露出自己沉重的愤怒和强烈的紧张感。

从那天起，
故里在南方的海里
化作一条蛇。
蛇　在原子弹的剧痛中麻木，

惊恐藏身之际，
无法在故里居住的我们
站在祖国的街角，
变成凶猛的雄鹰
怒视着南方的天空。

我曾经写下，在冲绳，我反复体味着沉默的意外造访之苦。我不得不再次讲述在冲绳的友人，每次相逢，他的话都越来越少，变得更加沉默了。同时也应该说，沉默到了那种程度，语言或者反语言的冲击力，以及在冲绳时时可以听到的某个暧昧含糊的措辞，它成了辗转潜入我灵魂深处的同样可怕的伏兵，是向我发出的信号，是敦促我醒悟的语言——啊，啊，这里有陷阱，底下有怪物的牙齿。

事实上在冲绳，每次接触到带有特别意味的暧昧含糊的措辞时，就有一种无力感和浸满毒素的嫌恶感袭来，让我无法不去注视对方那张脸。含糊暧昧的措辞的内涵、说话人的态度以及他试图直截了当地主张的都是多样的。然而在冲绳，当那些用赤裸裸的语言所无法包容的沉重事实往往借助含糊暧昧的措辞来呈现时，它就超越了上述的多样性。某日清晨的报纸以其含糊暧昧的措辞暗示的，就让我明确感受到，那是不容置疑的沉重事实与更为沉重的事实，而且那沉重的事实大概还将继续存在。

冲绳含糊的语言、暧昧的措辞虽然在履行一种类似于迷彩网一样着色、铺上青草的职责，这个迷彩网深处大抵总是隐藏

着骇人的怪异本质。然而拆除迷彩网，把那种东西藏在迷彩网背后的人并不会因此而张皇失措。拆掉迷彩网，本质就显露出来了。于是，就会采取两种态度。不，那里显然可见的东西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正因为不存在，它是否真的存在尚需调查。我们想明确地说：那是不存在的。

另外一种态度还算坦率。是的，迷彩网下出现了怪物。那就让怪物作为怪物存在好了！将怪物加以正当化、进行强化的工作由我们来做就行了。你们能做什么呢？这可是比你们的岛屿还要庞大的怪物。拆掉迷彩网，怪物就露出来了。你们只有去习惯它。哎，你们要是不知道就好了，不是吗，诸位小人国子民?! 态度强硬的格列佛说道。这种同等强硬的态度在冲绳的确被不断重复。

B52 轰炸机起初也在语言的迷彩网里，说它只不过是为了躲避台风才临时从关岛飞到冲绳来的。但所有人都在用暧昧含混的语言谈论：B52 轰炸机常驻冲绳，它直接飞往越南实施轰炸，并将不断被派上用场。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一日，就在约翰逊下令全面停止轰炸北越时，在冲绳，只要留心，谁都能注意到：业已抛掉迷彩网的 B52 轰炸机频频起飞。三日的《琉球新报》谨慎报道说：前所未有的是，在嘉手纳基地飞来近五十架 B52 战略轰炸机，且陆续飞往南越实施轰炸。该报道也基于上述事实。它同样让人感到，报道在含糊与清晰的定位之间揭示出：停止轰炸北越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迎来冲绳的和平。

自此不到三周，含糊表述所隐含的不安就以比它清晰不了

多少的形态变成现实。"试图从嘉手纳机场起飞的美国B52战略轰炸机尚未完全升空，就失速坠落到机场东侧弹药搬入门附近。好像B52轰炸机上装载有弹药，在坠落的同时引发十数次大爆炸，与跑道毗连的十六号线上的知花弹药集聚地一带成了一片火海。"B52轰炸机给冲绳民众带来怎样的危险，还将带来怎样的危险，它们连同至此所有的暧昧讲述全都在瞬间被火海照亮。不仅如此，凶猛的火海还将美里村有核武器储藏库这种含糊的传言几乎完全是事实这件事也照得通亮。所谓几乎完全，不过是说专制君主格列佛在阻挠冲绳民众证实此事。

此前人们常常用含糊措辞谈论在冲绳美军储藏核武器一事，已经无人怀疑那种传言了，只是因为有人在阻挠对其加以证实而未敢明确断言罢了。这架B52战略轰炸机坠落起火，冲绳民众在深夜的爆炸声和火焰中惊恐而又徒劳地四处乱逃，在他们内心，因核武器带来的所有不安和恐惧已经在任何意义上超出了暧昧所容许掩盖的界限——《琉球新报》所做的如下清晰报道大概就表明了这种意味："对在冲绳部署核武器的观察以前就在进行，将核武器分放在嘉手纳空军基地附近美里村知花地下储藏库的六个地方一事，虽未经核实，但基本上可以视为确凿。"嘉手纳基地的相关人员于十九日证实：储藏核武器的地下室被加固两三层，即使平日也戒备森严。就在十九日凌晨发生的B52轰炸机爆炸起火时，该弹药集聚地仍然处在森严的警戒中。相关人员心有余悸地说："受核武器储藏库影响如果引发大爆炸，冲绳将化为乌有。"

但是语言的追讨也因此陷入了僵局。面对核武器的实际存在，语言由含混暧昧的阶段渐趋明确、犀利而精准。最终，迷彩网被剥离掉，精准的语言射中了核心，冲绳民众对核武器的存在有了切实的把握。追讨也到此结束。知道这里确实藏有核武器，然而美军并不予人以核实的机会，日本本土政府要么保持沉默，要么佯装不知，正是因为意识到民众运动目前尚不具备撤销核武器的能力，那么他们就无法向前迈进——认识到这一点，撞到墙壁上的脑袋低垂下来。“知道又有什么用?”阻挡在那里的格列佛说，那不过就是更为切实地在为自己重新调和不安与恐惧的毒素罢了，不是吗，小人国的诸位?

这次情形与此前从那霸港的泥泞中发现钴60时所经历的顺利进展和陷入僵局的情形相同。核潜艇自由出入于那霸港，一次冷却水被大量排出，冲绳原水协[1]证明，他们从海底的土中取样检测的钴60浓度较之美琉共同调查的结果要高出数倍。私下里嘀咕说鱼贝类中蓄积有钴60的含糊语言具有了明确的实质。琉球政府也摆脱美军，开始整顿理应能独自调查放射能的体制。那是因为不得不食用钴60蓄积量超标的鱼贝类的民众对美琉共同调查表示怀疑。

在那霸军港工作的潜水员控诉身体发生了异常。受到钴60污染的淤泥被反复选取采样，将污染带进并蓄积于人体的罗非

---

[1] 原水协是“原水爆（原子弹和氢弹）禁止日本协议会”的简称。昭和三十（1955）年，由原水爆禁止署名运动全国协议会与原水爆禁止世界大会日本筹备会联合发起，昭和四十年分裂后以日本共产党为中心运营。——译注

鱼和紫贝证实了淤泥的污染。然而事情也因此陷入僵局。美军断言：潜水员体内异常并非放射能所致，试图粉碎全军劳将患者送到本土放射病医院的计划。撞到绝壁上的脑袋仅仅惊恐地意识到：正因为冲绳民众不具备阻止核潜艇入港的能力，港口淤泥污染和鱼贝类对钴60的蓄积态势就只能继续。钓上罗非鱼，撬开紫贝，甚至挖出港口底部的淤泥进行调查，你们看清了让自己不安和恐惧的对象了吧？但因此又能怎样？嘲弄的声音或许会不断萦绕在撞到绝壁的脑袋中。原本就没打算去将迷彩网下的怪物打翻在地，为什么还要特意去剥掉迷彩网？屡屡撞到绝壁的脑袋里沉淀些什么？与钴60污染相比，那难以消除的沉淀是什么？

我不得不承认：在自己思考方式和感触方式的根柢，有种要坠入危机深渊的悲观，而这悲观是我无法凭借自己的力量去遏制的。同时，我也不得不说：为了设法与之保持平衡，我决定用一种叫作臻于百科全书派式的思考方式和感触方式，以及在接近自己独特风格的意义之态度，去理解冲绳人苟活下去的理由。我预测：对我而言，与其苦于含混暧昧的语言所暗示的局面，不如明了而彻底地去追究更容易些。并且我认为：明确地认识暧昧黑暗中的某种现实，就已经历尽艰辛地找到了克服那一现实的线索。

然而，我在冲绳的屡次遭遇却力大无比，再次将我上述的乐观毫不留情地打翻在地。当暧昧、含糊的语言加以暗示的本质清晰彰显的时候，就只有吃惊、愤怒，就只能朝着绝壁上撞

得头破血流——还有其他模式比这种认识更能将人引向疯狂的绝望吗？不允许自己陷入疯狂的强韧精神让愤怒在内心凝固，而凝固了的愤怒很难化作语言。那么，怎样才能够把积压的愤怒传达给那些并没有像我们那样、激愤地将脑袋撞向曾经撞中我们脑袋的壁垒的人呢？

冲着首次访问冲绳的本土人，冲绳人也明确地讲述了壁垒的存在。对于再次访问冲绳的男子，只说那壁垒依然存在，实际上就无须再说什么了。为什么生活在冲绳的人要为激活旅行者的好奇心效力、去不断讲述新的冲绳残酷物语呢？第一面壁垒被揭示出来，也揭示出它的难以逾越性。如果听者不去思考逾越第一面壁垒的途径，那么向他揭示第二面壁垒的意义何在？因此，真正要扎根冲绳的人，他们那充满拒绝的顽强沉默，其核心非常坚固，并且他们还在紧紧地加固着，并将其彰显出来。正因为他执著地坚守冲绳人的秉性，他的沉默才蕴涵着更为强大的拒绝的力量。

召开四·二八那霸集会的那天傍晚，我在集会广场邂逅一位友人。他询问我道："你知道去年夏天在具志川的临海学校发生的多达二百七十三名小学生患皮肤病的事件吗？"我知道这件事。还记得报纸报道对该事故原因的追查并不顺利，就在该报纸的同一版面，还登载有为调查放射能污染而提取海底淤泥的原水协的船只遭到美军LST[1]阻拦的消息。不过，友人追问

〔1〕 LST是Landing Ship for Tank的简略语，指美国海军坦克登陆舰。——译注

的核心在以下部分。自己的孩子从老师那里得知：那不就是一种叫作芥子气的毒气症状嘛，那不是在越南的美军使用毒气造成的嘛。带着这些放射能污染问题，孩子们感到极度不安。但是，把这些告诉年幼的孩子又能怎样？

当然，友人并不认为老师是煽动家。我知道他并非单单作为父亲而感到担忧，他还是个有责任感的作家，揭露了美军在冲绳部署 CBR[1]部队，该部队研究用化学、细菌和放射能来制造最为卑劣、令人恐怖的武器一事，尽管措辞暧昧。而作为父亲，他只是试图向我这个来自本土的旅行者——至少我可以不到具志川的海里游泳，不吃那霸一带打捞的鱼、贝也没关系的——追问：让孩子的脑袋往自己撞过的墙上撞，又能怎样？我无言以对，陷入痛苦的沉默。本土的日本人生活在冲绳的 CBR 部队威胁不到的土地上，他们因为核潜艇自由出入也在谋求一时的防护对策。然而友人大概想要说的是，因为他和孩子不得不在这里绞尽脑汁地考虑如何去担负起这个问题。对此，无论我做出怎样的回答，我的话都无疑将被烙上耻辱的印迹。

七月十八日，就在《华尔街日报》揭露此前十天在冲绳发生的致命神经性毒剂[2]泄漏事件时，即曾经风传的有关冲绳

---

〔1〕 CBR 是化学（Chemical）· 生物（Biological）· 核（放射能）（Radioactive）武器的总称。——译注

〔2〕 致死神经性毒剂（nerve gas），属于有机磷酸酯。1936 年，服务于德国法本化学公司（I.G. Farbenindustrie）的德国化学家吉拉德 · 施拉德（Gerhard Schrader）博士，合成以磷为基础的一种化合物，准备用来制成杀虫剂；这是人类制造出来的第一种有机磷化合物，且被发现对哺乳动物有极大的毒性，这种化学物命名为塔崩（tabun）。接着又研发出毒性更强的沙林（sarin）和梭门（soman），这三种化学物都是毒性很强的致命神经性毒气。——译注

CBR 部队的实质被赤裸裸地揭露出来时，这位友人又愤怒起来，在报纸上撰文道：这是对冲绳人的侮辱。无论怎样控诉恐怖、怎样发怒都没有成效，却又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发出声音，就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作家，他大概不能不担心：自己的语言已经无法充分表达恐惧和愤怒了，因此才使用“侮辱”这个宛如沉重的铅锤穿透灵魂的词。

也许明天，愤慨多少会沉潜下去；后天，重又开始控诉恐怖，而他将选择黯然沉默，恢复往昔的日常生活。然而，侮辱是一股酸性侵蚀力量，它在自己的内心深深挖掘着伤痕，无止无休。

二十二日，美国国防部貌似宽大地宣布：冲绳的毒气不是 VX 毒剂[1]，而是只有其十分之一威力（尽管如此，装在弹丸里二点五公斤就能杀死两个足球场范围内的居民）的 GB 毒剂[2]，并且打算将其撤离冲绳。然而，遭到侮辱的记忆难以抹去，而他似乎也要与侮辱共生。另外，美国国防部并没有说要撤除显然已经存在的核武器，以及那含糊其辞地暗示的、应该即将公

---

〔1〕 VX 毒剂的学名是 S-（2–二异丙基氨乙基）–甲基硫代膦酸乙酯，是一种比沙林毒性更大的神经性毒剂，是最致命的化学武器之一。它也是一种无色无味的油状液体，一旦接触到氧气，就会变成气体。工业品呈微黄、黄或棕色，贮存时会分解出少量的硫醇，因而带有臭味，主要是以液体造成地面、物体染毒，可以通过空气或水源传播，几乎无法察觉。人体皮肤与之接触或吸入就会导致中毒，头痛恶心是感染这种毒气的主要症状。VX 毒气可造成中枢神经系统紊乱、呼吸停止，最终导致死亡。——译注

〔2〕 GB 即沙林（Sarin），学名甲氟膦酸异丙酯，是“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研发杀虫剂的副产物、一种致命神经性毒气，可以麻痹人的中枢神经。它是常用的军用毒剂，按伤害作用分类为神经性毒剂。它可以通过呼吸道或皮肤黏膜侵入人体，杀伤力极强，一旦散发出来，可以使 1.2 公里范围内的人死亡和受伤。中毒后表现为瞳孔缩小、呼吸困难、支气管痉挛和剧烈抽搐等，严重的数分钟内死亡。——译注

之于众的细菌武器。并且，何时撤除GB毒剂（国防部公布的气体）也模棱两可。冲绳民众无法亲自去核实具体做法，美军尽管已承认毒气的存在及其引发的事故，而要追究起是谁烧伤了具志川海上为数众多的孩子，这种责任没有人会去承担。

我怀着畏惧，在内心想象着：这位诗人、记者朋友是怎样洞察此次毒气事故暴露成为焦点的一系列动荡及暂时的了结——当然，它仍在进行中，并没有得到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决——的呢？

是令人敬畏的国王的诏令，
因为是国王的声音，
所以是绝对的。

他大概重新认识到：发出绝对的专横之声的，不就是美军的“御意”吗？除了坚持继续全部拒绝他们，还能有怎样的活法？凝神注视着他那堆满愤怒的犀利面孔，我再次遭遇这句话：日本属于冲绳，而非冲绳属于日本。我感觉：自己除了积极回避日本对于冲绳的“潜在主权”这个词之外别无他法。为了真正让冲绳从毒气中解放出来，除了凭借冲绳人的主权来把握冲绳之外别无他法。但是，侵犯冲绳人的主权、站在毒气一方的，却并非只有美国“主权”。坦率地说，由于被拒绝参与日本国政，实际上冲绳民众是无法行使主权的，而我们却将其伪装成好像它是所有日本人的主权的模样，从本土提出日本国的

潜在主权这另外一个“御意”——我们也是站在毒气一方的。

再说一遍，揭发在冲绳储藏毒气、因毒气引发的事故的，既非日本国，也非日本人。报道外务省调查冲绳毒气事故的本土报纸在其头版头条刊有“拒绝带入国内”这样一行标题。一般认为是华盛顿把ABM[1]配置问题的表决作为眼前的“家庭内部事情”，才第一次决定撤除毒瓦斯的。但何时、怎样撤除依然含糊其辞。日本国和日本人试图钻入核保护伞、毒瓦斯保护伞或者细菌武器保护伞里去，仰仗保护伞的威力勉强生存。如果不打算否定这种固定观念的话，日本就属于作为那保护伞的支点支撑着巨大黑暗的冲绳。

为了去关注自己的这个如此国家的如此日本人，我在想，除了将自己推向冲绳别无他途，我要去冲绳。我要一次又一次地去冲绳，那里有我寡言少语的友人，在这位友人的内心潜藏着八重山民谣中的沙蟹，潜藏着凶猛的雄鹰。

（一九六九年七月）

---

〔1〕 ABM，是Anti-Ballistic Missile的缩写，反弹道导弹。——译注

# III 面向多样性

你是否简单化地理解冲绳形象了？不论是出于善意还是恶意，在把握一个共同体时将其简单化，这是最糟糕的。——责难我的声音传来，让我停下脚步。忆起那些与冲绳息息相关的具体人物的各式面孔，现在我无法把那一张张迥异的面孔（内在的与外在的面孔）统称为“他们”。正因为如此，我们照理不该粗略一扫就去对他们具体的人性逐一进行简单化的理解。并且，我不断地想到冲绳的一个人，当试图借助他的肉体与意识去思考冲绳和作为冲绳人的他自身的情况时，认为就应该将目标定位在与简单化全然相反的方向。我不正是这样开始写作冲绳札记的嘛。

设定的目标作为语言刚一独立就开始束缚着我，既然事先就清楚地知道自己将冒这种危险，我就想在多样性中去理解冲绳。“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

日本人?”这种对自己的诘问同样是试图去做多样性的展望。而最糟糕的是，语言写作者自身缺乏多样性，接下来，还有一件最糟糕的，就是对对象多样性的把握能力。而显然，这两者如同一对双胞胎。

“日本人是什么?”我打算在这种不断追问中来反复探究。而进行思考的标准之一，恐怕也是核心问题，即，所谓日本人，就是在维持生动活泼的多样性方面不具备才能的国民，不是吗?我必须说，我抱有这样的疑问。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抱着对多样性莫名其妙的嫌恶感，或者说，在或明或暗处，有意欲将其除掉的冲动。与此同时，在这个天皇制依然实际存在的国家，将很有可能促成民主主义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轻而易举地发生根本性逆转。到那个时候，“天皇是日本国的象征，天皇的地位，基于拥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全体意志”这样的宪法语言，恐怕将要对那种大逆转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而当我这么思考的时候，重又碰到冲绳这堵墙。对于冲绳民众来说，天皇是什么?对于失去主权的日本国民——冲绳民众来说，天皇是什么?借助这种持续的思考，如果触及对天皇制所持态度的多样性，或许能够掌握抵抗天皇的根本性动机形成的线索。毋庸赘言，如果不朝着日本人对天皇制的普遍认知方式、展望的多样性方向发展，那终究不过是不会充分实现的线索罢了。

如果是因为我的观察力、或曰想象力太简单，而使自己对所有冲绳印象进行简单化的理解，那么，我必须倾注所有注意

力，来铲除由于自己的责任而造成的简单化毒素。因为那是比别有用心的简单化更为恶劣的事态。如果一个作家因为特别的理由而被允许围绕冲绳写点什么，那么把简单化视为禁忌大概只是出于他作为职业作家的本性。我把那造访我的、时时难以定位的噩梦般印象也不断记录在札记上，祈望它与我本来的出发点、即“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样的诘问一起，一步一步向前进。

现实中纠缠我的噩梦之一，与覆盖冲绳的核战略体制有关。每当接触到讲述核武器的语言，我都不能不感觉到，自己像是被卷入黑暗漩涡的深渊。比如，曾经是创作过几部优秀短篇小说的作家，现在是保守党中首屈一指的显赫的英雄、国会议员，这个人主张，如果不搞核装备，就无法进行像样的外交。这种政治主张很难说是全然简单化或者其他。在报纸或是周刊杂志上读到它的时候，我想起这位议员访问冲绳时曾说过类似的话，结果受到民众狠狠的反击。但是，对这种冲绳经历的记忆大概没有让他受到丝毫震动。一想到这些，那命题重又如噩梦般攫住我：在由于核武器而逐步升级的恐怖体制中，为什么不仅美国人、连逐步升级的胁迫竞争的对手也承认冲绳的核基地是有效的？为什么在中国拥有可以使冲绳遭到毁灭的核武器的今天，冲绳的核基地仍然被认为是具有威力的？是威吓力与恐惧心相抵构成了升级的核心。正是这本质性的心理问题让我做着与升级有关的噩梦。我思考得不耐烦了。然而大概我应该有这样的权利：我并不把这些看成是全然无意义的浪费

时间。

我进行了如下不祥的构想。正如美国国际关系专家、法国资深新闻记者所指出的，面向大陆进行的岛国核装备，是规模最为宏大、且保证实效的全国性自杀计划。那位已不年轻的议员说，不搞核装备，就无法发挥外交关系中的政治想象力。因此，姑且不论这位议员，只要是具备正常判断力的人，大概不会认为，由于日本本土的核基地化，那么在核威胁所造成的升级体系中，日本本土能承担起有效的责任吧？我隐约感觉到，从进攻的意义上看，支撑着核保护伞之类宣抚工作的根基的，是将凶鹫的羽翼伸至日本本土的美国核武器体系，日本本土仰仗羽翼的力量，并非是为了免遭攻击，只是想略微抑制一下所遭受的攻击。尽管矛盾不断明显地显露出来，暧昧的现状仍在持续，也并不理会核保护伞的神话，只求在这个核时代能够暂时整天安稳地度过漆黑的日子，这大概是接受宣传一方大多数人的态度吧？大概我们不能无视，在那种根植于无力感、持保留判断的态度的深处，隐藏着最为悲惨暗淡的悲观主义：当被美国这个所谓巨大的核凶鹫打翻在地的时候，我们自己虽然被放射能滚滚的黑色火焰焚烧殆尽却不试图做任何反抗。

不过我也因此意识到，用数枚核武器进行报复性攻击，被毁灭的将是那个岛国上所有的人，这是一幅确切的、不远的光景。那个狭小岛国的强权开发核武器，试图将导弹头指向广阔的大陆，如果从民众一方来看，这种构想显然像是发了疯。那个岛国的人是具备大规模自杀倾向的民族，如果不对这一点进

行明确的诊断，那么这种形式的威吓，大概是不能让理应受到威吓的对手产生动摇的吧。无论多么荒唐无稽的情节都能想得出来的美国通俗小说家，为了让从日本本土向中国发起核进攻这样的小说在心理逻辑上好歹能讲得通，他做出这样的假定：在中禅寺湖附近的美军基地内，像是在近乎疯癫的热情的驱使下，将军偷偷地独自准备配备核弹头导弹。这是故事的梗概。

然而，冲绳比日本本土更为狭小，与中国大陆更为接近，并且几乎全岛裸露，为什么会作为核基地，在恐怖升级中起着重大作用呢？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开始被噩梦般的景象纠缠着。也就是说，在设置核的基地上，在试图发出恐吓的华盛顿白宫和五角大楼的人的想象中，他们确信，冲绳民众就是在报复性核进攻中应该遭到歼灭的人（敌人）。如果这个核基地作为抑制力量能够发挥作用这一点是事实的话，即使在美国借助冲绳的核武器进行威胁的对方国家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当局的想象中，他们也清楚地知道，冲绳民众将会被歼灭，成为廉价的牺牲品，正是配置于此的核武器在威吓着冲绳人自己的生存。这就是事实。因此，那个裸露的小岛上的核基地，作为胁迫的武器和恐怖的焦点才开始成为实际的存在。

如果来自大陆某核基地的报复性核攻击是以冲绳核基地为目标实施的，那意味着冲绳本岛将遭到彻底毁灭。付出如此大的牺牲，你们还打算从冲绳的核基地向大陆发射核武器吗？接受核升级威胁竞争较量的一方想说。

对此做出回答的，如果是冲绳民族，或者是他们直接选举

的主席，那么答案一定是：不，这种事我们不干。因为威胁竞争成了对方的完胜，冲绳核基地的意义将远远受到限制。但是，毋庸置疑，对该质问进行回答的无疑是来自华盛顿的声音。

是的。大概华盛顿的白宫及五角大楼会如是说。冲绳核基地乃至冲绳全岛可能被毁灭，有什么不可以呢？正因为如此，它不是才能够为保卫大规模的“自由世界”起到弃子作用吗？我们在游戏中可没有在冲绳装备核武器！我们也没有在冲绳装备从那里出动的B52战略轰炸机啊！因此，恐吓竞争的胜负要么出现逆转，要么达成紧张的升级平衡关系，从而形成激烈地相互对峙的核体系下怪异而恐怖的沉默。

说到底，冲绳民众的抵抗，就是面对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均衡体制，深感恐惧、整日活在歼灭危机中的冲绳人不断提出的异议。但是，驻冲绳美军及高级专员怎样无视他们的抗议、怎样压制他们的抗议，这也都是我们知道的。然而，能说我们对此相当了解，而且这种了解刺激了我们，促使我们朝着一个目标发出各种抗议，引发各种行动了吗？不，根本没有这回事儿。回顾自己与冲绳的关系，不用装作可怜兮兮的，我应该坦白：大概我在根本上就在动摇吧。

好歹也要在核保护伞的暧昧主义里安居啊。这种逆来顺受与冲绳的核武器无疑对冲绳人具有现实意义。它与不想去认真思索的我们本土日本人的意识在结局上是一样的。不过也许唯一可以判明的是，后者的内心沾染着对冲绳民众浓重而赤裸裸

的背叛色彩。

由此进一步地，应该如何去理解在本土政府的掌权者与华盛顿的掌权者之间将冲绳“带核”回归的想法作为具体计划加以思考的这一段时期？这个不祥而阴暗的构想着实意味着：即使华盛顿将冲绳的施政权返还给日本，将冲绳民众从他们的军事控制中解放出来，东京的政府同样会将包括冲绳的日本人在内的冲绳当作弃子的。进行这种观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吧？若非如此，在以所有核基地为核心的威吓升级中，冲绳的核基地价值就会暴跌，将失去“带核”回归的意义。

也许会有消息灵通的人士说，美国方面根本不存在“带核”回归的计划。但是，日本保守政权的官员把“带核”回归计划视为后半生的大事而为之四处奔走，则是不可动摇的事实。而开始让这个计划动摇的，则是冲绳当地的民众。对于回归计划，他们在以各种形式来明确表达自己拒绝的意志。

若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去挖掘，当本土政治家主张“带核”回归时，在他们的内心是怎样认识至此所讨论的问题的。他们明确意识到，在报复性核进攻中，冲绳民众有可能遭到歼灭。从这一点来看，或者应该更为坦率地说，他们已经估算到：在核战争时代拥有冲绳这样的核基地（拥有将遭到歼灭的一百万人的肉体所支撑的核基地），多少可以加固本土的核保护伞这座暧昧主义城堡。

我们会想到，他们会自私而任性地辩解，将其归咎于美国的军事控制。我们同时还会想到，对于冲绳民众来说，核战略

体制是可怕的东西，是有可能歼灭他们的东西，而“带核”回归，正是对生活在这种体制下的冲绳民众佯装不知的欺瞒，很明显，这是重新把日本国宪法下冲绳的日本人当作牺牲品。若不将其视为对冲绳民众的根本歧视，还有其他什么可能吗?

或许会有人追问：你有现实根据吗?那不就是你的噩梦吗?出示证据过于容易，而那容易本身，就像是扎入我这个本土人的一根燃烧的利刺。根据《旧金山条约》第三条，冲绳人先被当作牺牲品，继而在核武器造成的恐怖升级中成为弃子，而直至今日他们也不能申诉，如同沉默的羔羊被束缚着。本土的态度（我们的政府至今尚未发布声明承认冲绳核基地，而且“带核”回归之类的声音交错乱飞，极为厚颜无耻）就是鲜活的证据。而为了“捍卫国体”，冲绳民众就成了牺牲品。有必要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把这场不具有任何正面意义的冲绳战的悲惨性拿出来作为另一个证据吗?

上地一史在其《冲绳战史》中明确记述了在庆良间列岛发生过七百名老幼集体自杀的事件。试图保命的本土日本军人发出如下命令：“从今以后部队将进入迎击美军的长期战。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勇自决。”以冲绳民众之死作为抵押来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这个命题在血腥的座间味村、渡嘉敷村的凄惨现场清晰有形，一直绵亘至核战略体制下的今天。回到本土、隐匿在我们中间的幸存者、事件责任人，直至今天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但是，本土的日本人正在全方位地重复着这个个人行为，“为什么只有

我一个人非要谴责自己?”面对本土的日本人，这个人会突然改变态度，将错就错。而大概我们也立即会从他的内心深处发现，自己和他是多么地接近!

岛袋全发著的《冲绳童谣集》中有一首歌，向乌鸦发出呼唤，催促它“躲起来、快点儿!”彰显出明治时期冲绳的孩子面对本土日本人的威胁时，将自己同化为鸟的感情。这首歌所揭露的情况延续至今，可以说冲绳没有得到任何补偿，倒是把步枪换成了核弹头导弹。

咿呀——乌鸦——
大和人
扛着步枪
射向你
快来呀
藏到阿檀丛中去
藏到苏铁底下来
快呀快
快呀快

走在冲绳街头，我最害怕的，是碰到疯子。我常常有这样的体验：疯狂是难以言喻的鲁钝，我就像被钝器痛揍般遭到打击。同时，疯狂自身就像鲁钝的匕首那样，拥有直刺对方要害的力量。而且有的时候，从我内心涌起难以抑制的冲动，即当

自己碰到一个疯子，想将自己与他的疯狂同一化。不过，我在冲绳遭遇的疯狂，却绝不容许我把自己与之同一化，那是一种用拒绝的铠甲牢牢守护着身体的疯狂。

骄阳似火的夏日，我在本部町渡久地码头等待着去伊江岛的渡轮。这时候，一对酷似双胞胎的中年妇女突然开始狠狠地大声训斥我。我想自己很难忘记这两个梳着女孩子发型的肥胖女人让我产生的根源性的不安。这两个发疯女人的拒绝和冲绳友人的拒绝，以及对我表示明显反感的人的拒绝，大概都是其性格使然。这被拒绝的多样性，连同冲绳所展示出的多样性，和在被冲绳人接纳而展开交流的基础之上所显示出来的交流的多样性一起，我将一并理解并接受。我想抱着这种心态去面对冲绳。

恐怕在日本本土的中央报纸以及各类地方报纸中，冲绳的报纸对疯狂消息的报道最为频繁了。那基于冲绳精神卫生实况调查的具体数字虽然姑且能够让我们信服，毋庸置疑，我们必须对此进行心理上的挖掘。

根据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实施的这次调查推算，全琉球的精神疾病患者有二万三千一百四十人，其中分裂症等所谓精神病患者比本土高达二点五倍，并且其中百分之七十一点二的患者没有接受任何治疗，处于被弃置不理的状态。报纸对此予以了报道，同时刊登出仪间厚生局长公布结果时的照片。照片上局长的表情凝重，犹如要把头撞到在冲绳随处可见的绝壁上。在该项正式报道之前，《琉球新报》曾报道过本部町周边放任自流

的疯子的真实情形。就是在那个地方，我遭到那两个肥胖的、女孩模样的疯女人破口大骂的。也许下面的这个女人，正是我在码头遭遇的两个疯女人中的一个。

> 据悉，一位从田间收工的妇人被无人管教的精神异常者用镰刀砍伤了头部、肩部，因伤势严重而住院。此事发生在本部町。这位精神异常者是个三十七岁的妇人，虽然此前由政府安排住院，病情已有好转，但出院后再次恶化，四处侵扰乡里。据说，每日带着竹子、镰刀等凶器游走，多名孩子遭到竹子抽打。每当与不懂人语的精神异常者相遇，镇上居民都战战兢兢。镇政府的福祉主管与卫生主管经商量决定再次安排她住院，并于四月向名护保健所提出申请。但据说，由于北部没有精神病房，既有设施也是人满为患，尚无法预计何时能予以收容。该事件因为村当局向仪间局长申诉而被公开，但说起来它只是冰山一角。目前，在本部町，像这样在家治疗或者无人看管的精神异常者有七十四名，在其他村镇同样很多。比如今归仁村大约有一百三十人在家治疗，久志村有三十八名，东村有七名，羽地村有二十七名，屋部村有三十九名。

与上述具体事例一起，在此前列举的厚生局的调查中，男性患者比例很高，三十至五十之间年龄层的患者居多，这大概也是有必要关注的事实。这个年龄层的男性在冲绳战中结束了

少年时代，开始其青年时代，他们被迫参加了那令人绝望的失败的冲绳战。

毋庸置言，在思考冲绳精神病患者的状况时，我无意讲述新的冲绳残酷物语。与我同住那霸宾馆的那位本土作家讲述着他从宫古岛或者与那国岛挖掘来的精神病患者的悲惨故事，对此，我抱着无以名状的嫌恶感。这种嫌恶感是针对说话人的，同样也是针对听话者、我自身的。他之所以对着我说那些话，很明显，是基于这样的意图：想向我的脆弱处予以直接一击。你不是到冲绳来驱邪的吗？这是他对我的基本态度。被泼了这样一头难以净化的污水，因此就能驱邪了吗？这种挑衅，就是他的用心。如果我们不相互撕咬，能跨越鸿沟，将事实当作彼此想象力的种子相互分享，并由此各自展开，那么我们或许能够把那些悲惨的话题升华为超越单纯的残酷物语的东西，从而达到相互理解。但是，说起来，我们仅仅相互看到了，在我们这些来自本土的旅行者之间存在着近亲憎恶般的东西，但并没有能够跨越那不毛的裂谷。

如今，面对着那些无法确定的、陌生的读者，我写着这部札记，同时，最害怕落入那般残酷物语讲述者的陷阱。所以，我想明确的是，对冲绳的疯狂的思考，无疑是对日本的疯狂的思考，将两者叠加起来，而最终又不得不成为对我自身与疯狂关系的思考。我正是沿着这样的方向思考的。

实际上，在思考作为本土日本人的自己时，我不是有可能在做着将冲绳人逼疯的事情吗？被这种嫌疑纠缠着，我常常不

得不黯然止步。据说，从本土来到冲绳的评论家批评冲绳战的牺牲者靠动物式训练所养成的忠心。听到这种话，有人因愤怒疯狂而死。这后半句话也许是传言。但是，如果说我和我的家人都生活在冲绳那块土地上，当在如今的状况中日日思考着过去和未来的冲绳时听到这样的批评，我想是找不到能冷静下来的理由的。尽管疯狂致死的谈论只是传言，它作为传言有可能存在，也是因为这个传言具备触及现实核心的本质。所以我只好希望自己的想象力朝着这个核心沉潜下去。再一次去认真地听一听下面要讲的发自冲绳的正气的声音，当那种声音成为语言之前，我便不能不感慨：在一个人内心的黑暗处所积累的感受性有多么丰富，逻辑性有多么清晰。

那是在八·一五集会上一个非常温厚的学者讲的话。“我认为，去批评冲绳年轻人动物式忠心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到要去分析考察支撑它的历史背景、社会状况，是不公平的。面对那些诚实地构建冲绳历史的人，那就是不诚实。我担心：尽管去构建历史的全貌，那不也有失准确吗？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冲绳的年轻人受战争的驱使，让他们的思想染上一层枯黄色呢？我感觉围绕这个问题有不同解释。然而对于我来说，那是从数百年间苦难的孤岛历史中解放出来的冲绳县民具有历史必然性的行动。如果这么来考虑的话，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偏题的。意欲积极地将其编入日本的体制中，摆脱历史性的后退，这种思考方法才是问题之所在。”

按照这种思路进行推理，这位琉球古歌谣专家引领着我们

进入他的研究领域，从而展开问题，揭示出这样一副历史全景图：从琉球处分直到冲绳战，其间中央的政治、经济、文化对地方所进行的渗透，无非是把中央的不良影响扩大到冲绳的年轻人中间。“当与中央直接关联的思想失去批判力的时候，国体的根本意义与臣民之道受到了过分强调，动物式忠心作为思想的产物便产生了。我认为，当时，立誓效忠天皇制意识形态的思想虽然在日本具有普遍性，但在冲绳它则以被强调的形态喷涌而出，那种特殊性里令人痛心地镌刻着冲绳历史的落后性及其现代化的焦虑。”

应该说，在今年八·一五期间发出的各种言论中，限于我所接触到的，刺穿我内心最深处的，是外间守善氏[1] 用他那平静的声音甩在我们面前的一段话：二十四年前的那一天，“生于冲绳、长于冲绳、参加了冲绳战”，“始终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我还在冲绳岛中部的山中彷徨着”。教授是那种无论内心潜藏着多么汹涌的漩涡也不会将它袒露出来、粗暴谴责的人。但是，只有被这样的学者真正接受，感觉愚钝的残酷物语的讲述者之类的批评才勉强显出一点意义，才使我不得不将它与比那因愤怒而疯狂致死的传言更为可怕的冲击力并置在一起，进行重新思考。我感到，作为本土的日本人，必须对那种信口开河承担连带责任。我开始被这样接受的时候，才体验到救赎感。

---

〔1〕外间守善（1924— ），冲绳人。语言学家，冲绳文化研究专家。著有《冲绳语言史》（法政大学出版局，1971）、《南岛文学论》（角川书店，1995）、《回想八十年通往冲绳学之路》（冲绳时报社，2007）等。

然而那种救赎感也包含着一种要素，它要重新唤起更为敏锐、更为苦涩的味道。

坦率地说，这是因为，直至今天，本土人仍然会反复地说“一想到那因愤怒而疯狂致死的传言中的人物，不能不感到畏惧”之类的话。并且其中最糟糕的话暗含着一种召唤力，不能不让人切实地感到：这无非是日本人说的话，日本人就是说出这种话的人。

今年四月，枥木县的医生在给《琉球新报》的投稿中这样说道：

> 琉球国人啊，诸君之国本应是独立国家。德川时代之前，在唐代，向萨摩和中国进贡，好不容易才独立。但不也是个堂堂的独立国家吗？乘明治之乱，日本领有冲绳县民。此后由那些被贬的内地官吏统治，成了日本的赤字县。……非常幸运的是，拜第二次世界战争所赐，诸君脱离了日本。虽然落入美军的管辖，也因此，诸君了解了以前不了解的世界。请看一看诸君的左右和街头，你们是完全自由的。除了军事设施以外，诸君拥有内地完全想象不到的自由。虽然是同样的领土，朝鲜独立了。……诸君的琉球啊，为什么没有独立呢？……诸君之国琉球啊，应该独立。去创建诸君的政府吧！不要担心财政。靠观光和旅游来维持就行。财源由此而生。那要是国营的赌场。但是，琉球国民不能去赌。那要由外国人去赌、去享受。它

将成为欢乐之国。忘掉遭受战争的戕害，权当遭遇了一场强台风。……自由之国琉球，无论如何都是诸君之国度。在政治上实行自由投票，不搞人种歧视。主席或者大总统是在冲绳居住一定年限以上的人，不问人种，日本人也行，美国人也行。诸君不想以自己的明智，去建立一个自由的国度、开明的国度、没有纷扰的理想乡吗？放弃你们那毫无价值的回归本土的悲壮誓愿吧！这是赐给诸君的最好机会。

这位医生于五月再次投稿，文章在反复表达相同旨趣的意见后，又增加了新的批判：

最后，有消息报道说，屋良主席主张向国会派送议员。为什么要干涉外国政治呢？现在这个时候，冲绳还是外国，日本也还是外国。把派送国会议员当成誓必实现的决心，实在是严重的错误预测！……一旦回归日本，将不再可能拥有永远独立的政府了。到了那个时候，即使发起独立运动也晚了。正是这个时候，冲绳应该独立！

如果仅止于第一次投稿，那有可能是与他内心指向完全相反的自虐式的滑稽文章，我们可能不得不做保留判断。然而到了第二次投稿，不容置疑，我们可以认为：不管怎样，这位枥木县医生用一种很难说是奇怪的或是其他的某种语言，在向冲

绳认真地传递着信息，他认识到了这样做的意义。在对该投稿进行分析批判之前，哪怕仅仅是将文章的用语和文体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我就足以感觉到其中所传达的意味了。我不过是本土的日本人，没有受到任何人的指示，只是醉心于某种莫名的热情（并且那种热情不具有破坏性的、消极的、反社会的性质，仅就本人意识而言，无论如何都是道德的），在像是严重晕船的心绪中，反复回味将这样的文章送交到冲绳报社的事儿。他说的已经深入到冲绳民众意识里了吗？不好说，也就姑且不论。既然事实上它已被广泛阅读，就如挥之不去的噩梦一样纠缠着我。所谓日本人，就是这种人。我不得不睁大眼睛，重新去看连结着这位医生和我自己的血缘纽带。

事实上，这份投稿直接唤起了我多重记忆。就我个人经验而言，在冲绳首届主席公选的投票日前夜，我在池袋车站站内碰到冲绳出身的学生正在那里宣传选举的意义，请求行人签名、募捐。一个普通的年轻男子频频地去对那些学生无理取闹。那个男人有几分醉意，周围无人指责他的胡闹。人流如潮，但捐款很少。我走到他和学生中间，签了名，将一些钱放进纸袋。就在这时，那个男子对着我的侧腹捅了一下说：“你是托儿吧？”我从在板桥的医院接受手术的儿子的病房里出来，正在回家的路上，无疑是偶然碰上那种场面的。接着，那个男子读着我在签名簿上的名字，马上转向旁边那些正排队候车的漠不关心的人发表一通贬低我的演说。从他议论的方式看，我不认为他属于特别的政治团体。这个男子大概从公司下了班、

喝了点酒，突然产生了向冲绳学生发起挑衅的情绪。这就是日本人。我忘不了，那一刻再次感受到：从另一个角度看，那就是我自己。

此外，我很难忘记，那篇在序中追悼古坚宗宪氏之死的文章一发表，就有人送来禁酒同盟机关报，报纸在加上旁线的专栏里质问道："古坚不就死于酩酊大醉吗？战前的冲绳难道不是因泡盛、战后的冲绳难道不是因泡盛加威士忌走向灭亡的吗？"既然那是受了我的文章的刺激而写下的批评专栏，那么他也知道，古坚是位投身于冲绳回归运动的满腔愤怒的、死于非命的人。但他却仍和枥木县的那位医生一样，完全出于激昂的道德意识，突然向本该痛惜的死者投以石砾。只要所抓住的是本土的人，不管对方是谁，都会向他执拗地发出愤怒之声，那个烂醉的古坚宗宪氏的幻影让我听到真诚、正当的愤怒的声音。是的，这就是日本人。想到这里，我感觉自己和那个禁酒运动机关报纸栏目的笔者是处于同一立场的日本人。

古来忠孝几人全
忧国思家已五年
一死犹期存社稷
高堂专赖弟兄贤

这首七言绝句有唤起我某种牵挂的异常力量，那种召唤力与山里永吉氏的思想常常相互纠缠在一起。山里永吉是画家兼

历史学家、同时又是冲绳人，他以异常明确的形态表现出了自己和冲绳人思考方式多样性的一面。首先是因为他的著作，我才与这首诗相遇的。大概是因为山里永吉氏围绕这首诗所展开的思考，与对冲绳现状的考察密切相关吧。

在《冲绳历史物语》中，山里永吉氏对留下这首七言绝命诗的林世功——若以琉球名来称呼，即“名城里之子亲云上”[1]——做了这样的评价：“是从首里国学[2]到北京国子监读书的秀才。明治七年从中国留学归来。在废藩问题举国哗然之际，他担任王世子讲官。明治九年，与紫巾官国戚向德宏一起，偷偷到中国寻求救援，为热血之士。”他同时还介绍了东恩纳宽惇的言论：“啊，林氏世功，乃琉末之志士丈夫也。不应论其一时之成败。然若论其贻误名分之根本云云，夫复何言。”可以说颇为客观。明治十二年，林世功在福州听说最终“废藩置县”，首里城开城投降，琉球国王父子即尚泰父子被日本皇帝召集到身边，即奔赴北京，请求清国朝廷援救琉球。未能奏效，留下这首七言绝句，自刎身亡。

在《冲绳人的冲绳——日本并非祖国》这本小册子中，山里永吉氏再次出示这首绝命诗，更为直截地走向林世功。“‘林世功的悲壮自刎毋宁是贻误大义之名分。’持此说的后世历史

---

〔1〕“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是琉球古代对于官职的称谓。一般三品以下的官称某某地亲云上，如果没有自己的领地，就称“某里之子亲云上”、“某筑登亲云上”。六品以下另有称谓。这是译者请教清华大学刘晓峰老师所得。——译注

〔2〕首里国学创建于1798年，是琉球王国的最高学府。——译注

学家也有。但是我认为，从当时琉球的国情来看，林世功因企盼祖国琉球独立而自刎的行为，反倒永远都是合乎情理的大义。”

而始终贯穿在山里永吉氏那套笔触温厚、内容丰富的随笔集《壶中天地——从内部看琉球史》深处的长年主张，也以犀利而激烈的方式重新统合到这本小册子中。作为沉潜到文化史深处的历史学家，山里永吉氏的工作，就是要弄清冲绳是独立的国家，他致力于反复彰显冲绳独特文化的根本特性。而这种做法的意义，在现今冲绳的本土回归运动面前，重又处于与之相对立的状态。

> 假若冲绳的领导者年轻时因接受殖民地教育而滋生出劣等感，在“真想早点儿成为日本人”这种无意识冲动下，开始提倡回归日本，这是更为可悲的事情。因为现在叫嚷着日本回归没有理论依据，没有经济理论，也没有思想上的证据，有的只是感情。至于有人说“哪怕吃不上饭也想早一天回归日本”，那无疑荒谬绝伦。因为他不知道饥饿的痛苦。同宗同祖、使用同一种语言，那成不了理论。因为冲绳本来就是独立的国家。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同宗同祖、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同一个民族，一分为二，争战不止。合而为一之时，即一方降服另一方之时。因为他们都没有忘记自主独立的精神。冲绳同样如此，本来就是独立国家——长久以来，我们的先祖用自己的双手

> 经营着自己的国家。多少世纪以来，在世界上一直存在琉球这个国家，它不是传说，也不是童话。我们难道没有必要在内心反复思考这个事实吗？施政权的回归，我本来是赞成的。但是，那无论何时都应该归还到冲绳人的手里，而不应该归还给日本政府。从虎口下归来的尊贵生命，不应该交到狼的手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要求施政权回归到冲绳人的手里。只有带着这份自信和信念，我们冲绳才能得救。

如今，也如林世功那首七言绝句一样，山里永吉氏内心长年积压的强烈主张或者思想喷涌而出。而针对他的主张或思想，同样是经过长年的思索和实践所发出的反驳，大概也只能出现在冲绳。而用力唤起这种声音的尝试，也可以说是这篇文章的主题之一。

因此，我将山里永吉氏这本小册子放在他至此所做的全部工作之上，当试图再次让从中唤起的记忆沉潜到自己的内心时，毋庸赘言，我并非要自作聪明地去尝试加入到某种彻底的反驳之中。在二十七岁的那年春天，他创作了剧本《首里城开城投降》，该剧的主题已经构成了这本小册子的思想根基。我期待将这本小册子的主张和冲绳其他各种主张进行绝非武断的相互对照，在理应自然而然地显现中来把握冲绳的多样性。

比如，当把山里永吉氏所谓的“殖民地教育”这个词

与《壶中天地》一文联系起来的时候，简直像有一把沉重的利斧抡向本土的日本人。文中说：“距今八十年前的琉球人决不会认为自己是日本人，这种说法也许不太恰当。而琉球一般庶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的，则是日清战争[1]以后的教育力量使然。……在太平洋战争的冲绳战中，这类琉球人说乐意作为日本人去死，也都是教育力量使然。但是，那种教育并非是日本人来施行的，而是琉球人自己向自己的子弟来实施作为日本人的教育的。”将这些与前述的八·一五期间外间守善教授的言论作比较——而且，我反复说，那绝非武断——重新作为日本人来认真接受并试图思考时，有谁能从那挥舞着的斧头下安然脱逃？

而目前我们的政府派往美国的使节正在进行阴谋活动；此外，针对举行示威的民众的权利，政府投入了机动队。将这些事情和“把施政权交到冲绳人手里”这种话，与“除了将冲绳回归与日本解放一体化，还可能有什么未来吗？”这种实践型的年轻人的思想一起，同样进行并非武断的对比的时候，我们能够游离于那个强大的磁场吗？

山里永吉氏的文章诚然是直面冲绳民众的，无须加以对照；那位投稿的枥木县医生的意识实际上并没有渗透到冲绳民众当中。投稿虽然喊着“琉球国人啊”，但它越出叙述人的意志，在我们面前浮起“日本人啊，诸君”的呼唤，成了全体日

[1] 日本人所谓的“日清战争”，指“甲午战争”。——译注

本人难堪的告白：诸君之国日本应该独立，那么就去缔造诸君的政府吧！自由之国日本啊，无论如何都是诸君的国家啊。已经不可能拥有永久独立的政府了。到了那时，再发起独立运动也就晚了。正是这个时候，日本应该独立……

我不得不再次回到在清国自刎的那位琉球知识分子的诗上来。自刎之前，林世功这位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既已确知清国不能救援祖国琉球，毋庸赘言，他那封遗书与其说是写给清国朝廷的，不如说是写给琉球同胞的。也许是作为抗议正在进行琉球处分的日本国人的信息，他才留下这首七言绝句的吧？

在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日本在亚洲的定位这些问题上，我们国家也有人持续地深入中国内部进行切实思考、尝试将其现实化，尽管死于其中的人的尸体无法与在日中战争[1]——包括那场南京大屠杀——中被我国杀戮的、堆积如山的中国人的尸体相比，总之也是一目了然的。将他们未竟的努力与林世功那未竟的努力作并非武断的对比——已经是第三次这么说了——我思考着今天的日本应该有的理想状态，想把那无非是给今天的我们的信息、那不得不再次回忆起的遗书、“一死犹期存社稷，高堂专赖弟兄贤”那样的诗句，放置在记忆的面前。我期待着，至少，从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开始，包括今日的写作者、讲述者以及沉默着的人，能引发出包括冲绳拒绝的多

〔1〕 日本人所谓的“日中战争”，是指中国语境中1937—1945年间的日本侵华战争。——译注

样性在内、我们自己关于中国的思考方式的多样性。在那种意义上，关于冲绳的思考，也就孕育着思考东洋中的日本及日本人这个问题的根源性的契机，它将再次引领我回到“日本属于冲绳”这个命题。

（一九六九年八—九月）

# Ⅳ　内部琉球处分

一个正值英年的冲绳学者带着他那天白天野外调查时的疲惫和几许醉意，无意间谈起："随着冲绳近代史料的挖掘以及对它的深入研究，坦率地说，我开始感到厌倦了。"他的声音中满是孤寂的愤怒和绝望。平日里，这位学者有着顽强的自我克制的毅力，然而这番话并非意味着心胸的狭隘，它道出了年轻时代经历战争的冲绳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人格。坐在学者身边，我一言不发，随着自己所见的深渊以及对冲绳知识的掌握，我越发不由觉得，那是更加难以补偿的可怕的深渊。我不得不承认：那深渊之所以可怕，因为所谓日本人，就是那样的人，就像迎面遭到从自身患处散发出的毒气的侵袭，让我感到眩晕厌恶——那深渊无疑蕴藏着凶险不祥的本质。

如果事先说，那已经是无法消除的污点了，那么为了保持精神健康或者单纯的天真无邪，最理想的状态是：对它一无所

知。但是，无知也有无知的残酷。一旦那窥伺深渊的人稍加留神，大概他的耳边也会响起这种声音：“你们又要来这一套了，现在又来这一套了。”那可不是只要悔改就能了结的事，也不是随政治态度的决定一变、就立刻站到声讨恶的一方那种机械性的东西。日本人仍然是那样的人——只有在自己的内心掀起这黑暗无底的漩涡，才能认识到它的存在。

就艾希曼被处刑与德国青年的罪孽感之间的关联性，汉娜·阿伦特曾说过：不做任何坏事反而有罪责感，实际上是予人以满足的漂亮话。然而真正地认罪，并且进行忏悔，则是令人痛苦郁闷的行为。对冲绳及冲绳人所抱的罪孽感，就属于这两种类型。直到发现与自己作为日本人的本质相关的实际罪责，在一往无前地奔赴冲绳之后，在一往无前地亲近冲绳人之后，我们要在内心承认那黑暗无底的漩涡，是件痛苦且郁闷的事情。

本来，“日本属于冲绳”。如果一般日本人对该命题感到像被粗糙的手掌逆着抚摸那般别扭的话，我在这里要陈述的就直接根植于这种感觉。那就是“中华思想”式感觉问题，它贯穿于日本人的近代史，以怪异的扭曲形态顽强地存续着，并不停更换新的欺瞒的外衣，公然出现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林世功年轻时留过学，直接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接受教育，亲眼目睹现实，虽然他不像那些幼稚的人们一样相信黄色军舰一定会来援救自己，但当背负着琉球一个阶层的厚望远渡福州时，他确实在激烈地摇摆动荡的中国发现了“中华思想”

的核心。对于林世功而言，清国即便不是世界的中心，也仍然是亚洲的中心。

然而，当幻灭与绝望直接置他于死地时，日本所拥有的，无非是日本中心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作为面向中国的琉球知识分子，名城里之子亲云上所传递的信息当然不可能直接为那样的日本人接受。然而毋庸赘言，对于历史学家来说那不过是些常识。但只要尝试着去做具体的反省，就会发现，即便作为今天的实际问题，也不能认为这个日本中心的“中华思想”式感觉具有被超越的依据。我想就这一点来谈谈。

尚不清楚此前提及的那个令人悲痛的信息是否被认真地理解并接受了。就在琉球那位年轻的知识分子留下信息自杀的那一年，我国应该最具有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代表，特意给着手琉球处分的中央权力执行官写了这样一封信。

> 此番任琉球公事甚为辛苦。废藩一事，吾有耳闻，觉意义颇大，且请恕我一言。去年本土废藩立县之际，诸藩地士民狼狈不堪之态亦可理解。实因政府只下一纸柬帖，唯“废藩立县”四字。敕令之文以简洁为上本亦无可厚非，然废藩立县至关重要，何以无告示晓谕之文？藩地士民只闻废藩，而不知何以废，故此更添狼狈。小生闻之，亦深感遗憾。

> ……内地状况即如此。此番于琉球颁布废藩之令，琉

> 球士民之惊诧亦当在智者意料中。废藩立县之敕令虽为谕旨，亦当附以谆谆谕告之文，如琉球国无两属之理，两属于国不利。日本政府取琉球非为利己，乃心怀拯救琉球百姓之厚意。今闻废藩之令一时惊骇亦无碍，静候其成。本土废藩之后已成典范。窃以为，第一要义乃在恳切说服、笼络民心。先玩味琉球普通文章采用何种体裁、语言、口音最易沟通，后选著者，择辩者，一再晓谕，反复演说，唯如此方能以笔端口头取胜。

琉球处分官员松田道之率领逾三十名随员、一百六十名警备巡查以及大约四百名步兵，开进首里王城。他是带着各类人等的建言踏上征程的。福泽谕吉的这封信，大概姑且可列入上乘之作。靠诉诸永久的武力而不进行外交交涉的琉球官厅，业已不是处分官员松田道之的对手了。而清朝政府所持的外交判断，只是那些招致对其寄以期盼的琉球知识分子的绝望而死之类的东西。在此之前，就在琉球藩王尚泰向住在那霸内务省办事处的松田道之递呈接受废藩置县的文书时，数百名琉球人堵在街头阻止。而松田道之对此进行的强烈反对显然就是恫吓。

如下特别引用的质问信中提及“居住在久米村之辈”。事实上，示威者除久米村之外，也涉及其他地区。硬要加以如此狭隘的限定，正如山里永吉氏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他们抱着这样的先入之见：久米村是来自中国的入籍者后裔的村

落。也就是说，松田道之试图在对琉球人的抵抗做出片面化的理解。

> 此番，居住在久米村之辈就命令之事议论纷纷。据悉今日已及粗暴之举。若知其意图、名单，应详告之。

只要考虑到那是一封给抱有如此政治情绪的官员的信，大概就应该可以说，福泽谕吉的文章的确尽显情理了。但丝毫不见信件的宗旨变为现实的迹象。而在认识到这点之后，再重新阅读这篇文章时，不得不让我那郁闷的内心忐忑不安起来。琉球观、琉球人观就这样持续了近百年，现在它在日本权力中坚力量中那些所谓“通情达理”的思考者心中以及对冲绳寄予关心的一般民众心中，不是依然根深蒂固吗？如今，肩负冲绳回归使命的政府借助宣传、大报纸的评论等等，大肆宣扬血脉相连的关系，不断唤起人们难以表达的复杂感慨，并且将这些加以固定化：日本人就是持这种想法的人。

日本政府取琉球并非利己之举，而是心怀拯救琉球人民的厚意。这种想法，或者是福泽式“譬如说”的说法，与松田道之迫使藩王尚泰到东京之时、也就是近乎把琉球王拽到日本国皇帝的膝下时的命令式口吻相重叠，发出明确的回音：

> 耗费百万巨资，向台湾兴师问罪，战死病殁者甚众，圣上英明苦虑，政府诸臣辛劳勤政，此皆出于保护本藩百

姓之心。然若其藩王之任在，当为其臣民火速进京，臣民方不胜感恩。

琉球人漂流到台湾，为数众多者遭到蛮族杀害，幸存者为中国人所救。日本政府乘机出兵，用弯刀硬将琉球和无非是其救助者的中国劈开；紧接着，强权执行官又发出上述言论，这与今日的日本人对美国战略下思考冲绳的根基直接相关。美国耗百万巨资，向越南兴师问罪，对远东安全保障忧心忡忡。但是，在过去的台湾征讨和今日的越南战争中，冲绳均被强加如此“厚意”，被迫拖着政治齿轮中最沉重的负担。关于冲绳及冲绳人，硬要说出那些话，这是在压抑自己负疚的想象力——我们的父辈、祖辈曾做过这种事，现在我们紧随着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怎么能够不把它作为近代日本人心态的本质之一加以重新思考呢?

而本土日本人对冲绳的认识水准低下且肤浅，并且态度倨傲强硬。如果不尝试把这些与以下说法相对照是不可以的——第一要义乃在笼络人心。那个国家通常的文章用什么样的体裁?用什么样的方言口音最容易沟通?首先来玩味一番……

这里欠缺具体的知识，欠缺与之相关的却根植于更深处的想象力。在这两大不足的支撑下，粗暴的政治操作对人的肉体和精神造成的影响，就有可能因为道德的迟钝而被掩盖——实际上就存在这种情形。不论对冲绳处分的政治评价扩展到怎样的程度，明治日本人这种性格倾向的本质一目了然，这大概是

否定不了的。关于包括冲绳战在内直至今日的冲绳状况，我们再次暴露出那种秉性，是因为，把冲绳回归的交涉用看似新的琉球处分的形式向前推进，招致危险也在所不惜，也就是说，松田道之与佐藤内阁的言行是一致的。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大概最终所有本土的日本人才再次暴露出这种秉性的——这一点也很难否定吧。

暴露出这种秉性的不仅是权力方，在野党一方同样有所流露，甚至是在最有实践性的抵抗者中也隐约可见——它难道不是所有日本人的痼疾吗？这是我沉重的疑虑。每次接触从本土进入冲绳的政治游说团体，我都暗自在想，那无非起因于日本人“中华思想”式的感觉，他们仰赖那种感觉来抚慰自己想象力的欠缺，并且试图使它更符合逻辑地被传达。然而在我内心，它只是一种逻辑尚不完备的假说之类的东西。大概因此我才试图对这个疑虑重新不断思考。

但是，姑且不论日本人从何而来这个含糊的问题，即便彻底辨明，在它究竟从何而来、如今是否存在的诸问题中，更为复杂且含糊之处在于：日本是作为世界的中心、至少是亚洲的中心而存在的这种“中华思想”式感觉。比如在我最初的命题“日本属于冲绳”的构思中看到的在肉体及精神深处那种被触犯的不舒服感觉。不过至今我仍然坚持我的观察。或许那是洞察日本人政治想象力中最恶劣的疾患的形成之关键。

与上述类型的日本人的政治想象全然对立的，是一个具

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冲绳知识分子所说的话。这位冲绳饱学之士持这种观点："我认为琉球处分是一种奴隶解放。"伊波普猷记录下了这种怪异的暗示性语言。

旧三司官例行谈判时松田的对手浦添亲方某日会后回府，对家人说："日本刚刚兴盛，清朝则在走下坡路，因此清朝靠诉诸武力来救济冲绳是不可能的。众人空盼一场，然而已历七十年，不等到日本穷途末路之际是不会实现的。"

谢花非冲绳之谢花，乃日本之谢花。

谢花昇农科大学毕业后想要回到冲绳，惜才的恩师说出了这番话，这番话唤起的感慨具有多种指向的感召力。谢花昇对日本人的"中华思想"式的感觉发起彻底挑战，尽管终至疯狂，但为了回应那种感召，他直接拒绝道："不，我不是日本的谢花，我是冲绳的谢花。"他就在这种拒绝中度过了自己的一生。他的存在是一束投向日本本土和冲绳现状的犀利而澄澈之光。毋庸赘言，我并非要煞有介事地讲述谢花昇的故事。明治三十一年，谢花昇呼吁"赋予冲绳县民选举权"，大田昌秀氏从中听到与之紧紧缠绕的对现在的参与国政问题的本质性影响，重新对其予以评价；大里康永氏著的《冲绳的自由民权运动——先驱者谢花昇的思想与行动》也增添了新的资料，重新出版。

谢花昇是如何表现的？随着对他的了解逐步加深，出现了

怎样的鼓起勇气的时期？最终又是怎样不可避免地与那黑暗相遇的?——再次提及的谢花昇，对于我这样一个成长于战后的本土人来说，只是一系列个人体验的总和。

冲绳第一次举行主席公选是在一九六八年秋。在我参加的屋良革新候选人的诸种演讲会上，除去候选人本人，被最频繁提及的名字，就是谢花昇，特别是在有本土政党支援者参加的一种正式见面会上，尤为明显。那种集会不那么郑重其事，比如在暴风侵袭的黑暗的校园，直接坐在铺着席子的地上，好像那席子转眼就有可能成为筵旗[1]，那是紧张集会中的必需品。坐在席子上，演说者不得不屡屡在军用飞机的爆炸声中沉默下来，农民们也出乎寻常地忍耐着。在北中城村那个沉重而孕育着燃烧般的热情的集会上，特别是用琉球方言的演说中，“东风平谢花”竟成了强有力的语言武器，被一遍又一遍地呼喊着，那种场面我至今依然记忆犹新，依然具体而鲜明，它让我重新回忆起：那种琉球方言的高谈阔论我无法理解，只是当作一种魅力无穷的声音，我一边听着，一边反复思考着那个于一八六五年出生在岛尻郡东风平村农家的人，想着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事实。

在那些集会上，谢花昇主要是作为冲绳人具体希望的实现者被述说的。所谓冲绳人的具体希望、与那里颇为关注的，就是冲绳人充分具有从正面与中央权力对峙、斗争的能力，并且

〔1〕 筵席，即把席子绑在竹竿上的旗子，指的是百姓起义时用的旗子。——译注

现实中也的确在进行斗争。谢花昇这个名字，就是最有效的语言，它表明了冲绳人有与中央权力斗争的能力，有现在正在斗争、还会将斗争进行下去的决心。而所谓的中央权力，毋庸赘言，就是摆在面前的华盛顿权力，以及与之纠缠在一起的东京权力。

作为来自本土的人，在这个具有多重感召力的谢花昇的名字面前，是否感受到那里也作着驱逐和拒绝的信号？倒也没有。谢花昇这个内涵丰富的名字，与此前我对他的认识好不容易达成平衡，为我架起了几座拯救之桥。

如果对其稍加整理，就会发现：首先，尽管宪法在冲绳尚未施行，它却支撑着冲绳、特别是教职员的全部想象力。宪法中所谓地方自治的宗旨，就与冲绳县民反抗中央权力的精神相吻合，这促使我重新思考民众的权利。而作为那种主张的先行者，谢花昇的名字在冲绳被反复提起，分明是在给日本国宪法注射强心剂。

谢花昇是个农民的儿子。他和出生于首里的人一起，被选为县费派遣生到东京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他借助那些呼吁无论如何都要恢复和不断扩大冲绳日本人的民权的声音，使得兆民所谓的没有“恩赐的”民权、只有“恢复的”民权的言论得以复苏。而我也得以把本土的日本人与冲绳的日本人在关于民主主义方面共同的先驱形象，假托在站在中江兆民旁边的谢花昇身上。

在与本土的自由民权运动的连续性中来看谢花昇，会让人

的内心亢奋起来，这种体验至今也没有从我身上消失。然而现在，不得不说，在为谢花昇这个名字如此亢奋的同时，也在它的冲击力之下，我的心被强行驱逼陷入萎靡不振的窘境，就像用自己的手指触摸那无法愈合的伤口，我的内心投下较之以前更为浓重的阴影。

也就是说，“谢花非日本的谢花，乃冲绳的谢花”这个命题中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拒绝越发明白无误地摆在面前，并且与今日的现状相呼应。

谢花昇从抵抗到终至疯狂这种彻底性的自我毁灭之前，那被他扭倒打翻在地的斗争对手、奈良原繁[1]县知事如果靠着个人素质及其背后中央政府的强权、局限在历史的一隅，那大概倒容易对付。但是，那些对奈良原县知事的暴政及谢花的抵抗不断思考的人不得不承认，导致最终结局的，是蹂躏冲绳抵抗者的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这么一个巨大的实像，而且它至今尚存，是生命力顽强的怪物。也就是说，在描述谢花昇的生涯时，我不得不黯然地将面孔朝向自己最初的课题，苦苦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

谢花昇生涯中每一个选择都非常具有典型性。在一一规划殉教者生涯之前，他被拣选出来，并被饰以光彩和阴影。而我

[1] 奈良原繁（1834—1918），萨摩藩出身，曾任静冈县令、第四代冲绳县知事，贵族院议员、日本铁道社长等职。担任冲绳县知事期间，他依靠强权压制谢花昇组织的冲绳俱乐部，与谢花昇严重对立。作为政府选任知事，破例在位十六年，人称“琉球王”。——译注

们只不过属于那充塞着各种各样宗教画卷近景的群众，目睹着殉教者的死亡，在内心涌起骚动。

谢花昇把学问的核心放在农业上。那些最初与他一起从冲绳来的县费派遣生，在进入学习院学习期间，除了一人放弃学业、两人进入高等师范、还有一人升入庆应义塾。与他们明显不同，谢花昇走了就读山林学校、东京农林学校、农科大学这样一条特别的道路。正如大里康永氏也指出的那样：那应该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选择农科的谢花的心中，大概早已萌发了要为冲绳的农政改革尽瘁的想法。作为冲绳解放的使徒，面对奈良原知事鲁莽的开垦政策、滥伐政策，谢花发出第一声呐喊。尽管可以说，这对选择农科的他来说理所当然，我们仍能感觉到个中的奇特因缘。”

明治二十四年，冲绳的第一个学士谢花昇回到那霸三重城的码头时，东风坪村里的人拿着筵旗出来迎接。由此我想到距离那时的十七年前，从清国留学归来的另外一个秀才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谢花农学士出身贫民，他的学问是在日本本土养成的。然而面对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他毅然径直亮出控诉的刀尖。尽管疯狂而死，实际上那刀尖的锐利与韧性已经超出了名城里之子亲云上的控诉。而将这两位才子相提并论所引发的诱惑，我无法抵御。自杀的名城里之子亲云上从清国朝廷得到了殓尸之资——尽管那是徒然的厚意；而为死掉的谢花昇送上“舆论之母　冲绳之志士”这句话的，则是革命成功之际的孙文。

回到冲绳县后，谢花昇立即被任命为冲绳县技师。他从把砂糖、粮食的实物纳税制改为现金纳税制，设立农工银行，到下工夫打破股票所有者的垄断，做出了扎实的业绩。谢花昇活跃在制糖法的改良、造林法的实地指导、蚕业的研究等等广泛领域，再加上踏实的活动性情，他的确是位实学启蒙家。而且他不得不与奈良原知事开始正面斗争。就在谢花昇被任命为技师的翌年，奈良原成为冲绳县知事。就在他发疯致死的那一年，奈良原离开了冲绳。大里康永氏对冲绳的特权阶级作了如下的揭发。毋庸赘言，奈良原这个名字，大概在这里让人明显地理解为一种惯称，它赋予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以肉体的存在。大里康永氏说：

> 冲绳的特权阶级总是持怯懦的首鼠两端的态度，窥伺着日清两国的脸色。奈良原一方面显示其强硬手腕，一方面又以利益相诱。于是，立即有人追随，俯首屈尊去做奈良原的走狗、官僚党派的爪牙，猛烈地压迫人民政党，去做迫害自由志士、迫害冲绳解放的使徒。这种是冲绳人而非冲绳人的态度，应该与奈良原的暴政一起永远被记住。同时，正是这个特权阶级导致谢花悲愤而死，应该是作为遭受诅咒的存在。

面对奈良原强行开垦杣山，造林专家谢花的抵抗方式是：在科学的、现场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同时面向未来。贯穿其中

的理论，朝着冲绳县民经济独立的方向不间断地展开，是强有力的。但是，奈良原用自我欺瞒的理论，对谢花加以逐一瓦解，将他从开垦事务主任的位置上赶走，以此践踏对方的抵抗，强行推进自己的企图。从那以后，冲绳山林私有化的势力猛如洪水。代之以本来应该救济贫穷士族的口实，我们所看到的广阔土地的开垦者的新名单，是包括尚家在内的屈服于中央权力的冲绳的特权阶级，是与奈良原有关系的本地财阀及政治上的掌权者。

“只要去冲绳，就可以自由获得土地。”大里康永氏的表达如同愤怒的叹息。正是本土的日本人乱伐森林，夺下农民的杣山入会权，真正自由地夺取了冲绳的土地。而一位具有真知灼见的冲绳实践型知识分子，看透了日本“中华思想”式感觉的暴行对冲绳的自然条件进行蛮横无理的破坏，并竭尽心力奋起反抗，结果遭到全面驱逐，最终疯了。

谢花昇对奈良原恶政的抵抗，作为以参政权问题为核心的积极的自由民权运动长久地进行着。但是，明治三十一年，他解甲归田，而冲绳俱乐部最为主要的根据地在坚持抵抗一段时间后，即被逼进死胡同，陷入物质极度缺乏的窘境。他最终离开冲绳试图去本土谋职。现在看来分明是因为他暴露出敌人的内幕，在那个心怀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的爪牙们上蹿下跳的神户站发了疯。那是明治三十四年的事情。那个绝望而果敢的激烈抗争如火如荼，其持续时间之短，大概不能不让我们重又感到不安。

我心中的谢花昇具有难以抗拒的感染力，他留给我的幽暗可怕的固定观念呈现为这样的印象：在神户车站前，一个眼看就要发疯的极为聪慧的实证型的脑袋，和脑袋上那两只睁着的眼睛。日本人自私自利、迟钝麻木、逆来顺受、鼠目寸光，以及透过这些可以看见的带着假面、千方百计地要让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一错再错的人，也就是我们自己，在神户车站前四处走动。而谢花昇看透了这一切。他发现，用他自己积累的理念及实践支撑着的冲绳构想、乃至日本构想，被逡巡在他周围的卑贱的日本人逐一蹂躏着。他发现自己是个异邦人，正被一群最难以对付的、卑劣可憎的敌人包围着。恐惧和憎恶就像螺丝钉一样牢牢地拧入他疲惫的内心，直到死亡降临，那被穿透的伤口血流不止，疯癫的血液滴了下来……

我被谢花昇这种形象纠缠着。然而，那自然地又揭示出另外一种形象，即，在达到疯狂的顶点之前，在清醒的谢花的周围四处走动的日本人并非为不安所驱使，并且各自都毫无理由地笃信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当谢花去精神病院以后，他们仍在那里逡巡；现在一如既往地在那里四处游走，而我无非也是那人群中的一个。

现在，在佐藤和尼克松会谈前夕，充斥着日本报纸的，是那种或许让像谢花昇那样兼具敏锐洞察力与实证精神、科学精神的人焦虑不安的言论，其间隐约散发出暧昧、欺瞒的气味，是可疑的语言洪水。去核，即“处理完毕”。使用“去核”这种“模棱两可”的大标题，政府首脑是在用这种不足

凭信的措辞来支撑自己发言中最为关键之处。然而，诸如“坚信政府”、“坚信核的撤除”之类的小标题，也并非企图愚弄普通日本人，但它同时以一本正经的意图呈现出来，究竟又意味着什么？

对于暧昧、欺瞒的言论，一般日本人属于那种缺乏科学实证的探究精神的类型。尽管如此，他们却不曾被不安所困扰。这是因为，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盘踞在尚未理论化的阴暗处，即使就这样暧昧下去，也认为没什么不好，倒是认为那些被驱逐到“中华思想”之外的弱小之人才会疑神疑鬼，并毫无根据地对他们嗤之以鼻——这不就是真相吗？此外，他们还要小聪明，想方设法让人引领自己到丰富而甘美的野生牧草处，从而得到那牧草。然而，一旦其天真的企图落空，眼前则一片黑暗，如被鹰鹫缚住一般，奇怪地开始听天由命。这不是秉性在起作用吗？

而与此相呼应，在以下的外电报道中也充斥着赤裸裸的语言：“在冲绳的美国企业担忧：若将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方面，是否会对这些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各企业担心与日本企业的共同经营会受到强行限制。作为驻外美国商业会所的亚洲·太平洋评议会将此要求致电给尼克松总统。”它只是作为消息登在报纸一隅，实际上，那里却贯穿着一道深深的裂痕。

发疯之前，极为清醒的谢花昇一直用他那黯然而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冲绳回归的交涉，一想到这些，琉球处分的纠葛就一

点点撞击、摇晃、挖掘着自己内心的“中华思想”式感觉，我难以抑制那种骚动。那么，前方是光明的吗？那双黯然而犀利的眼睛问道。

（一九六九年十月）

# V 苦世

随着首相访美的临近，有一个词，让我的内心好像被污秽不堪的手掌扎入般冲击而来，直逼向我。它时时映入眼帘、进入耳朵。它一瞄准机会就从报纸上、街角的传单上、集会的演说中跳出来，将我逮住。它尤其深植于革新政党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核心，并从中站出来，以独立的形式鲜活清晰地从我的眼前、耳畔出入往返。这个词就是“本土的冲绳化”。

我国的外相说：“美国军人牺牲惨重的冲绳能在和平谈判中回归，我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的‘伟业’。”读着这样的新闻报道，我茫然地度过那一夜。那夜的噩梦，我已无意重提。数月前，美国退伍军人团体举行示威活动，说，“我们的战友在那里流血牺牲，冲绳是我们的”。接到这样的外电时，我感到内心满是黑色的苦汁；而外相的言论又仿佛给我喷上一层正在发挥功效且难以抹掉的毒物，那是我在这里将要讨论的异于语言问

题的维度。

毋庸赘言，关于冲绳问题，以本土的革新政党为核心的革新势力不断加强举措，并在此基础上积累着理论。在首相访美前夕，从突然推到大家面前的几个口号中，新近采用了一个反对“本土的冲绳化”口号，而我也在思考着这件事。长久以来，冲绳通过克服一系列具体困难来加强运动本身，明确定位，扎扎实实地将回归运动向前推进。介入回归运动的一系列本土力量虽说与革新政党有关，但那已经奠定牢固而深广的基础的回归运动却不时遭到粗暴势力的动摇，这仍然是主要问题。不过，中野好夫[1]说的以下一番话在任何意义上却都难以动摇：“自一九六〇年以来的十年间，再次将废除安保问题、特别是冲绳回归问题委托给了保守的自民党政权去交涉，痛定思痛，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感到一种巨大的责任。”把它也联系起来思考，我只有期待：从今以后，本土的革新政党能将在冲绳问题上应当承担的责任与迄今为止的运动持续下去。

尽管如此，或许正因为如此，本土的革新政党中不止一个政党，还包括总评[2]在内，都一致采用“本土的冲绳化”一词，这让我不得不驻足思考，我想在此把我的思考写下来。

“本土的冲绳化”这个词脱离创造者独立出来、潜入接受

〔1〕 中野好夫（1903—1985），生于爱媛县，英国文学研究专家、评论家。1958—1976年间，参加宪法问题研究会。主张护宪、反安保、反核、主张冲绳回归。他还设立了冲绳资料中心。——译注

〔2〕 总评，是“日本工会总评议会”的简称。——译注

者的想象力时，这个自然的过程究竟创造出怎样的形象及其与实体的联系？对于具备有关现实冲绳的准确可靠的知识与经验的人来说，它是怎样的呢？一想到这些，就会发现，那时这个词距离创造者最为亲密。然而它的接受者，恐怕姑且要将施政权与基地问题分开来考虑了。而想到基地、冲绳的基地，大概就会想到冲绳，那里装备有核武器；现在越战中出击的B52战略轰炸机在那里自由起降；核动力潜水艇不断从那里的港口出入，常常使港口面临危险事故的威胁；而海和鱼类正遭受污染。但是同时，接受者大概会根据他的常识（尽管并没有确切的根据）来考虑，不，这些具体的现象可能并非意味着“本土的冲绳化”。与本土相比，冲绳美军基地的密度远远大于本土，纵令不允许美军在冲绳放置核武器、驻扎CBR部队，也不会将它们移到本土吧。

这时，诸如贼风一样的东西开始纠缠起那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口号。被那股贼风吹醒的心会在想：在那样的冲绳，迄今都没有进行有效反抗的本土日本人在将论点转移到反对造访那样的冲绳化的本土之前，当然应该还有一个阶段，即首先是：摧毁“那样的冲绳”的现状是否才应该是必须直面的问题。毋庸赘言，知道反对“本土的冲绳化”这样口号的是在进入那个阶段之后的人，他们大概也会不禁生出疑问：那样的口号大概并非在呼吁冲绳的日本人，而仅仅是在呼吁本土的日本人吧。

围绕着冲绳的国际关系问题，在时空上持深远开阔想象力

的人则坚持认为："本土的冲绳化"形象大概具备更为清晰的实体。即便在"冲绳回归"以后日本人也（!）不愿承认冲绳的核基地是在日本国的土地上，在这种条件下，按照暧昧的事前协议，用这种对日本人没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形式进行核查，即使撤除冲绳核基地，那么日本仍然有可能重新持有核武器——这是一场精心的策划。因此，日本重新拥有核武器，伴随着核威胁及其可能性，在面对中国和朝鲜时，日本就会无以逃遁地、赤裸裸地暴露出自己成为中国和朝鲜的敌对国家的面目，并继续充当越南战争中直接的基地。并且，这是日本带着保卫国家的气概自觉地推进的。这样来理解"本土的冲绳化"时，就会让人沉重而恐怖，接受者无疑会遭到冷然一击。

即便如此，我还会感到这里有一阵不舒服的贼风灌进来。那就是，认为尚未冲绳化的本土在上述意义上无瑕疵的人大概最终在事实上并不正确。如果重新审视刚刚那个阶段，我们就不能不认为，在思考方式的展开方面，仍然需要从这个意义上将冲绳从那样的冲绳中剥离出来。

尽管极为一般的普通阶层对"本土的冲绳化"这种语言的理解方式即使尚未达到要将冲绳弃而不顾的程度，甚至比"本土的冲绳化"要好，至少也向本土日本人的利己主义投以一束光，躲开冲绳就能发挥作用吗？这是我最基本的疑问。

至少，从具有"日本属于冲绳"这种定位的思维中大概是不会引申出反对"本土的冲绳化"这样的命题的。我暗自怀疑：在革新党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想法深处，日本的"中

华思想”式的感觉是否依然在蠢蠢欲动？这是我的疑惑。我总是怀疑：与其说那是对某个政党、某个劳动运动团体带有寻衅意味的口号的畏惧，不如说那是对这样的革新运动的壮大寄予期待的人的自省。至少我感到，某天清晨，当站在印有反对“本土的冲绳化”口号的宣传单面前时，我没有勇气与冲绳友人一同去注视它。

且说在华盛顿，首相和美国总统发布了共同声明。“本土的冲绳化”这个词现在已经从反对“本土的冲绳化”的革新运动一方的句式中脱离开、站起来，开始独立。作为在诞生之前或者是在摇篮中应被打翻在地的怪物，它存在于革新政党口号的句式中；如今它已经幸存于把握现实的一方的句式中了。这时，不论是本土人还是冲绳的日本人，都对“本土的冲绳化”状况做出一副挽救的姿态，而所有的日本人如何去承担冲绳当地人的苦难经历，和与之进行尖锐对抗的、累积起来的“恢复的”民权思想和行动，如何让它存续下来，不是还没有找到解决的途径吗？把这些当作自己的问题，我再次感到无可奈何的忧虑。而实际上，就像预感到个人的疾病那样，我恐惧的是：一九七二年的“回归本土”甚至会造成冲绳民众与本土日本人彻底的乖离。即使在初通冲绳史的人的眼里，他们不也能明了地把握：那些乖离的例子活生生如在眼前？

用英语和日语反复阅读共同声明，渐渐地，我感到在内心构成的还有另外一部文本形象。在日本国内的记者招待会上封闭而傲慢——姑且不论是否可能有那样的机会，如果是在来自

冲绳当地报道阵容的见面会上，无疑甚至会表现出蔑视性的倨傲——的首相，在华盛顿的国家记者俱乐部近乎阿谀地夸夸其谈。其间说起核武器问题，声称那是他和总统之间的最高机密——这种让人不可思议的简单让开始讨论发布的共同声明的心情转瞬间化为乌有。而纠缠着我的另外一部文本，无非是面向核专制王朝之王呈递的文本，它也无法不让人想起，那份共同声明中批注着自身的命运。它是迥异于借助英语对美国民众施加影响、借助日语对日本民众施加影响的第三种施加影响的文本。我们自然要认为，这个核专制王朝之王，是把总统和首相的意图放在一起来领会的，然而同时，与他们相比，这个核专制王朝之王则是更为巨大的存在。

在这份以美国总统和日本首相之名签订的声明中，同样全然被践踏般明显遭到歪曲和嘲弄的，无非是冲绳民众的存在及其思想，以及那些在广岛、长崎历经异常沉痛经验的人的存在及其思想。

它并非全然无视。它是以一种并非为了自己的形态呈现出来的，意即，为了自私地提出除此之外的其他主张而将其当作支点，厚颜无耻而又杂乱无章地引以为例加以利用。若是作为冲绳民众，或者是有过广岛、长崎经验的民众，如果从共同声明中找到以下两段文章，那些试图充分发挥想象力的人，可能难免会有被迎面撞来的泥抹布抹了一把脸的印象。

总理大臣阐明意见说：要在日美友好关系的基础之

上，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使冲绳恢复正常状态，这是日本本土及冲绳的日本国民的强烈愿望。现在，回报这个愿望的时候到了。总统对总理大臣的见解表示理解。

总理大臣就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以及在此背景之下日本政府的相关政策进行详细说明。对此，总统深表理解。……

总统表示理解，深表理解。而实际上，这里的“理解”、“深表理解”所反映的，证明了在远东局势中冲绳基地对他们的重要性，并再次证明了日美安保条约中被阉割了的关于核武器的事前协议。而其中任何地方，都没有纳入冲绳民众的愿望和经历过核武器的广岛、长崎民众的思想。

再次对借核战略来推动越战的国家的总统寄予如此期待，这种草率大概是要遭到大大嘲弄的。因此，被嘲弄的同时，我想顺便重新说出一种非常异样的虚无感，它让人感觉到，我国的首相刚说完冲绳的日本民众的强烈愿望，那语言所揭示的全部即刻化为污泥；并且，当他越来越起劲儿地说起日本国民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时，日本人的原爆经历及后继的努力也全都白白地化为灰烬。

作为日本人的切实经历，想要将广岛和长崎一点点剥离的动向迄今依然在有预谋地进行着，而我们自身内部也在类似风化般地自然瓦解着。原爆体验真的成了日本人的真实体验了

吗？大概我们不得不直面这样的刨根问底。如果没有成为日本人的真实体验，那么真正历经原爆的人性之泉恐怕难以恢复，甚至开始干涸。因此，说到底，我们大概还是应该必须去追问自己：日本人是什么？

关于冲绳，它所付出的全部牺牲以及与之相呼应的“恢复的”民权思想，统统遭到来自本土的拱手旁观。作为这样的日本人，必须再次试着去对自己追根究底的，大概现在正是时候。在冲绳的反战、回归运动周密持续的高潮中，与核武器问题一起，这种追问明显沉重起来，也更为表面化。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的两个条件，作为困难然而清晰可辨的课题，无非是指在得不到宪法保护的核基地上那被弃置不顾的冲绳，与那里幸存的民众所揭示的东西，即今日的状况。

首相将这两个核心问题在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就进行草率处理，使出暧昧的糖衣加恫吓的惯用伎俩，意欲将其强加于所有日本民众。他不得不、也能够把上述两个条件作为与自己的本质相关的课题，借此草率处理之机，把所有日本人正面接受的现代史中长久拖欠、应该清算的最为重要的一笔账了结掉，敷衍了事、蒙混过关，于是，一九七二年的冲绳回归似乎也将在充满虚饰焰火的光与声中成为可能。

但是，在焰火燃尽之后，日本人并没有凭借上面两种彻底的自省与经验得到新的坚实存在，反而只是把它们都忘却了。想象着脆弱而其态依旧地站立在那里的日本人的情景，真让人害怕。日本人自行放弃了或许能成为真正武器的东西，他们光

着身子、赤手空拳、心不在焉地照旧坐上美国的核专制王朝那极其脆弱的泥船；而它的对面，是已经不抱任何幻想（如果把成为日本新成员之一的、独立的亚细亚形象称作幻想的话）的真正的中国与真正的朝鲜民众，他们抱着强烈而又正当的敌意。谁还能够用责任所在含糊不清的“冲绳化的本土”之类的词汇来掩盖如此状态下的日本呢？

> 冲绳的归属问题将在近期召开的讲和会议上得到解决。然而必须明白，从现在的世界形势来推测，冲绳人即使那时有陈述自己希望的自由，他们也将被搁置在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境地。他们能够希望子孙们如此活着，却不能够命令他们必须如此。看一看置县后仅仅七十年间人心的变化，即可明白。不，有必要做好精神准备，传统也可能被置换成其他传统。只有将一切委托给后来者的意志，此外别无他途。生活在怎样的政治下，冲绳人能够幸福？这个问题不在冲绳史范围内，所以这里不会涉及。在此，我只想附带说一句话，并就此搁笔：只有在这个地球上的帝国主义宣告终结之时，冲绳人才能从“苦世”中解放出来，享受“甘世”，并充分发挥个性，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

昭和二十二年七月九日，伊波普猷把上述也应被视为遗书的文章添加到《冲绳历史物语（日本的缩图）》中，大约一个

月后，他去世了。这位窘困之时欲在本土迎来生命终结的冲绳学泰斗用异常复杂的视角，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美占领军，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本土政府，并以此清晰地揭示出他自己作为冲绳人的个人视角，面向冲绳的“后来者”传递着信息。面对美国占领军和本土政府双重权力，在“苦世”中勉强幸存下来的刚烈的冲绳人充满了曲折的批判精神。这是一篇昭示此精神之所在的文章，那是随着战后史的发展，在渐趋沉重与尖锐中，借助冲绳的日本人以及冲绳，再次压在意欲思考日本人是什么的本土日本人身上、并且要将他们刺穿的信息。

同年五月，芦田外相[1]对外国记者团说：“日本无意提出重整军备的问题。但是希望归还本岛附近的部分小岛。其中包括冲绳与千岛的一部分。冲绳虽然对日本经济无足轻重，但从日本人的感情出发，还是希望该岛回归。”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中，“感情”这个词同样遭到滥用，只要想一想那讲述冲绳历史、意欲以“现代”为终章的伊波普猷如何痛苦地用他那清醒的双眼一直注视着这个词并引用到刚才的谈话中的，我就感到不寒而栗。

日本人对冲绳回归的感情、对核武器的特殊感情——首先把本质如此模糊的语言作为关键词来使用，这是要进行外交谈

---

〔1〕芦田外相，指芦田均（1887—1959），日本第47任首相（1948年3月10日—10月15日）外交家，政治家。京都府人。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外务省。先后在驻俄罗斯、法国、土耳其、比利时等大使馆工作，1932年辞职。同年参加众议院选举，当选。加入立宪政友会。以后终生保持了众议院议员的地位。——译注

判的本土政府惯用的伎俩。它宛如利刺扎进意识一样引发疼痛。而对冲绳的民众，本土的日本人到底持有怎样的感情？它是否成为所有国民切实的体验？我很怀疑。而它也作为另外一根燃烧的利刺，与广岛、长崎经历相互缠绕着，扎进我的意识之中。伊波普猷是如何看待这次谈话的呢？对此，我们必须超越彼此的共同感受，不断回到自己的想象力中。

关于这次谈话，伊波普猷还引用了上海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方面的反应。“直到日本国民的侵略精神完全消失，联合国必须对日本进行长期管理。冲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的要求完全不合理。”

他还引用了当时居于“权力”核心的强势代表的话。“根据合众社特别报道，六月二十七日，在美国大使馆宴请乘坐周游世界飞机来访的美国新闻人一行的午餐会上，麦克阿瑟元帅在谈话中说：‘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对美国持有冲绳，我们不认为日本人会反对。因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并且日本人放弃了战争。在冲绳设置美国空军对日本意义重大，将明确保障日本的安全。’这则报道好像是对芦田谈话的间接反应，恰好让我们联想起《教条》[1]第一章，并且其中也暗示了冲绳的去向。”

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方面说，冲绳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

---

〔1〕所谓“教条”，是为了确立对农村的管辖，享保十七（1732）年，琉球王国政治家、三司官蔡温所制定的生活改善法规。其中的道德规范主要来自儒家思想。——译注

土；美国的将军称，冲绳人不是日本人，冲绳史专家伊波普猷异常冷静地听着。在讲和会议上，关于中华民国政府的从旁干涉，他预测到这是比日本外相的预料更为严峻困难的局面。这无疑让他的内心再次想起，中国与冲绳的交涉史把日本放置在一个极端，在深层复杂地纠缠着。不，冲绳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这种历史认识作为伊波普猷的自觉，带有冷静的权威性而实际存在着，大概没有疑问。然而也能够想象：并没有因此就轻易地朝着冲绳自古以来就是日本的领土这样的方向展开。站在这两个命题的断裂处，即，不，冲绳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弥留之际的伊波普猷不停地反击，他无非是再次将视线投向冲绳。于是，恰似电影中静止的画面，映出冲绳伟大硕学的剧照。类似遗书的段落是以这种形式吸引我的。

接下来，针对麦克阿瑟谈话中说的冲绳人不是日本人的话，伊波普猷有何反应？对它的想象吸引了我。不，冲绳人是日本人——当然关于那段历史，大概伊波普猷能够轻而易举地予以反驳。然而也因此，伊波普猷将脚踏在到处是裂缝的土地上那坚定而又若有所思的剧照再次吸引了我。与他对中华民国政府外交方面的谈话的反应有所不同，这里有一条具体的线索提供给渴望进入伊波普猷那沉默而复杂的内心的人，它以极其隐晦的手法表现出来。

那是论及《教条》第一章的内容。伊波普猷说，其中暗示了冲绳人应去之方向。对于按照这位老学者的思考方式进行思考的

人来说，到底冲绳人应该走向何方？如何将其具象化？作为伊波普猷所设定的冲绳人应去之方向、所谓告之于“后来者”的信息包含着怎样的内容？即使是这样的询问也一定会有。

在同一本书里，伊波普猷事先写下如下内容：

“《教条》是教授冲绳人应该如何生活的国民读本。使用的语言是极为平易的候文[1]。蔡温在开篇处即讲述了本国的立场。

> 天孙氏既已创立国家，然缺乏像样的政治和像样的制度。又因身为海中小国，最初起即有诸多不便。从事海上贸易仅能满足国家开支，然内乱不断，人民饱尝涂炭之苦。近期因恰通明朝，终建制度。然国人生活较之以前并无大的差别。战乱四起，国内骚动日遽，其后虽战乱平息，因执政手段拙劣，风俗亦愈加败坏。然自生活在本国（萨州）统治下，国内万事遂意，执政渐趋开明，风俗渐渐改善，今日上下万民终于能够安居。形成此种有意义之时代潮流，均拜本国所赐，此厚恩将永记不忘。云云。

此番话也道破了冲绳的孤岛之苦，暗示在岛津氏[2]的监

---

[1] 候文中的“候”是指以“候”作为句尾的日本文言文书信文体。——译注

[2] 1609年（日本庆长十四年），萨摩岛津氏出兵入侵琉球。此后，琉球虽以琉球王国继续存在，但受到萨摩藩的严酷统治和严密监视。萨摩藩讨伐琉球的真正意图在于从琉中贸易中获得利润，因而认为有必要隐藏琉球与萨摩的关系，而让琉球以独立王国之形态存在。本文所谓的岛津氏喻指当时的本土日本统治者。——译注

视之下冲绳人的活动非常有限，然而自己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其统治。要让曾经怀有雄心壮志、多方面发展的岛民在动弹不了的小天地里实现那种生活，这种兢兢业业的政治化苦心非同寻常。伊波普猷预测，自己的同胞终有一天会从奴隶状态中被解放出来，而为了不致到解放之时作为遗骸被发现，必须讲授生存之道。”

想起这篇文章，如果想要探寻伊波普猷针对麦克阿瑟的谈话所论及的——只好始终都采取那个时代暗示性的说话方式——内涵，它大概会渐趋醒目。也就是说，在应对美国将军所说的“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这番话时，伊波普猷大概也再次最大限度地揭示、且近乎绝望地明确承认，在新的岛津氏的监视下冲绳人的活动受到限制乃实际情况。然而，与其去建构那种触及无可救药的现实之根柢的无以言喻的痛苦认识，大概倒不如把那个认识本身当作发条，来获取对冲绳人自立的展望，和对冲绳人应去之方向的暗示。

伊波普猷敏感地预见到美军统治下的“苦世”，但他并没有把回归后的冲绳放置在它的对极、即“甘世”的图景中。他把自此不得不长期在美国的军事统治下生存的冲绳人的命运放在思维的核心，简而言之，他相信冲绳人的独立意志，与此相关，伊波普猷做好了思想准备：哪怕是传统也可能被置换成其他不同的传统，从而呼吁“后来者”、未来的新冲绳人：“彻底自由地解放你们的意志！”我想，伊波普猷对未来冲绳的想象是他临终的思想。

应该说，那也表达了冲绳人对二十二年[1]夏季本土外交责任人的“从日本人的感情出发，还是希望该岛回归”之类暧昧的国族主义论点的严正拒绝。事实上，祈求彻底自由地树立新的思想和行动的“后来者”的确在脚踏实地地推进反战和回归运动。本土的外交方面甚至没有超出芦田的谈话范围，在含糊暧昧的国族主义感觉中推出了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而“后来者”们的运动则在针对以此为由产生动摇的各种势力中起到了抑制作用。我们不能不意识到这种抑制作用的存在所具有的深沉意味。

曾经从上海发出“直到日本国民的侵略精神完全消失，联合国必须对日本进行长期管理”这种强烈抗议的人，现在在台湾就“远东形势”的紧张状态不断传递着信息，希望以冲绳的军事基地为立足点，进一步强化合作态势，而目前他们的满足感也隐约可见。但是，既然是来自现在的上海，当然也就是真正的中国人的声音，他们仍然发出高声抗议“日本国民的侵略精神”的声音。谁能对此充耳不闻呢？毋宁说，对这种声音最敏感的人，大概正是那些凭借空洞的事前协议，为了再次打开持有核武器的通道而暗中活动的人吧。

当美国将军所谓“日本人放弃了战争”的言论彻底成为一句空话时，基地冲绳回归本土才首次成为现实。虽然出现回归的势头，但“冲绳诸岛是我们天然的国境”、它仍然是军事意义

[1] 这里的二十二年，指的是昭和二十二年，即一九四七年。——译注

上的天然的国境——靠着越来越多的新的事实，战争专家的这种认识被严重强化。因此很显然，我们大概不能不说，伊波普猷对于冲绳人应去之方向的考察至今都具有重大意义。

有些人在最大限度内，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方式，将战后二十四年被赋予新的严酷意义的“冲绳的孤岛苦”转化为能动的反战和回归运动，并积极主动地把这些作为经验不断积累起来。将他们与我们贫乏的本土日本人加以对照，在思考“日本人是什么”的时候，在这个问题扩展到普通日本人中间之前，我不得不把它当作我一个人的问题来思考和追问。那同样被称为“孤岛苦”的东西，是否真的在整个亚洲地区受到追究？我必须径直去与这个痛苦的疑问发生碰撞。日本和日本人陷入蚁狮之穴[1]，完全在劫难逃，他们却并不去正视自己身处的现状，反而不断通过自我欺瞒来认识自我。我突然怀疑起来：他们是否能正视现实，并以此为动力，去重新认真地思考日本和日本人的独立这个问题？于是我被拖入深不可测的黑暗漩涡中。

在冲绳，我见到很多人在不断思考“亚洲的冲绳和冲绳人是什么”这个问题，并在身体力行。在他们对本土人严厉拒绝

---

〔1〕 所谓蚁狮之穴，是指蚁狮制造的洞穴。蚁狮这种小动物的外形像蜘蛛，形状似沙和尚的头，沙土一样的颜色的身体，头小，有一对大颚，平常是倒退着走。它会在沙地上一面旋转一面向下钻，在沙上做成一个漏斗状的陷阱，自己则躲在漏斗最底端的沙子下面，并用大颚把沙子往外弹抛，使得漏斗周围平滑陡峭。当蚂蚁或小虫爬入陷阱时，因沙子松动而滑下，蚁狮会不断向外弹抛沙子，使受害者被流沙推进中心，然后蚁狮就用大颚将猎物钳住，并拖进沙里将它吃掉。——译注

的目光中，我再次去关注政府一九七二年的冲绳回归日程。到那个时候，将他们的冲绳经验及思想逐一加以对照，我想到我必须去思考今日亚洲的日本和日本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是翻来覆去的老话题了，不过，我仍打算从这个话题回到“日本属于冲绳”这样的命题。

“独立”的经验与思想是在美国的军事制度下、在残酷的现实中并以此为动力培育起来的，它不可能因为冲绳县的复活而一点点地被消弭掉，对“后来者”寄予的希望超出了伊波普猷的预想，不过它具有现实性，在本质上迥异于本来的国族主义。姑且不论政府会如何，至少本土的革新势力猛然发现，就像钝器亮到自己的胸前一样，自己难以逃遁，他们应该从回归的冲绳以及那里幸存下来的人的“独立”经验与思想开始，来重新开始认识亚洲。而我也企盼着自己去承担那份努力，去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这样的命题。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

# VI 接受抗议

漆黑的夜空，乌云急遽翻滚，风驱遣着云，夹着凄冷的冬雨抽打在纠察队员的身上，他们隐藏在黑暗中，伫立着，看守着通向普天间一个大门的柏油路。

纠察队的基地劳务人员在节日的夜晚化装成农民模样，用毛巾或是围巾遮住面部，并把帽子压得很低，让人感到，那样做并非是为了不让美军方面的情报人员辨认出来，而是为了去抵御凄风厉雨。说到节日，那实在是黯然的节日。不管面部是否会被逐一辨认出来而被列入情报卷宗中，这都是基地劳务人员在单枪匹马地与整个偌大的美军基地孤独地交锋和战斗，这种战斗在本质上具有一种可能性——不得不陷入绝对无底的泥沼的可能性。与其说有意在情报人员的相机下遮盖住自己的脸，毋宁说是别的东西吸引了这些深夜中沉默的纠察队队员。

我在场。“在场”这个词在一般的意义上也许不正确，或

者说它的内涵过于单纯，以至于很难想象它能充分表现出在纠察队现场时我的内心和流露于外表的东西——如果别人、也就是纠察队队员用防水性能良好的手电筒朝着我那被雨水打湿的面孔一照，就应该很容易看出来。靠着沉稳坚韧的耐力，从深夜到黎明，基地劳务人员一直坚持放哨。如果我说，现在我参加了你们的纠察队，那些基地劳务人员也无疑会用直截了当的拒绝性语言将我推开。

在冲绳全军劳第一波罢工浪潮中，面对深夜中的纠察队，我是抱着怎样的想法，登上了从羽田飞往那霸的飞机？依然一如既往，“我为什么去冲绳”这个发自我内心的声音，与“你为什么来冲绳”这个来自冲绳当地的拒绝的声音要将我撕裂。而至此以来的冲绳体验这最为巨大沉重的无力感同样让我饱受折磨。关于当地政治的动向与发展的论述和预测，我全然不知。而借助本土报纸——与事件本质相比，哪怕其报道规模再小——的报道，我想自己对全军劳罢工的前景已有所把握。虽然事件本身隐藏着劈开我的东西——它劈过来，在我内心的要害处留下污秽的伤口——我却能明确预见到，对此次全军劳罢工，华盛顿将做出如何反应，东京将摆出怎样的姿态。

这次旅行是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发表之后我第一次去冲绳。就像预见到的那样，冲绳的基地劳务人员及其现场支援者并非坚如磐石。从佐藤·尼克松的共同声明中大概就可以对这次全军劳的罢工前景看得一清二楚。而事实上，就像背着难以治愈的后遗症般庞大的重负，确实如前所述，不论是谁，都

将准确预见到全军劳第一波和第二波罢工近乎残酷的结局，以及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做出的反应。

电视在播报第二波罢工情形时，报道有人结伙闯入基地纠察队寻衅滋事，并附带讲解说，冲绳民众之间的对立已呈表面化。但是，教职员会的福地旷昭氏[1]被暴力团刺伤，而暴力团与本土和冲绳的保守党有明显干系，对于以该恐怖事件为出发点进行关联性思考的人来说，它就绝不是难以预测的突发事件。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清理脉络进行反省的是，这种恐怖行为绝非冲绳民众之间的对立呈表面化性质的问题，而本土日本人也不应该把它看成是二十七度纬线隔开的对岸的事件。

福地旷昭氏的大腿部X射线照片清晰显示，被暴徒所刺的伤口深处生出的软骨刺激着神经，诱发轻微的疼痛。当这种实际情形摆在我面前时，就像有人指出的，那无疑是溅在本土的日本人自己身上的鲜血，我不得不垂下双眼，认为没有什么隐瞒的权利。上原全军劳委员长[2]遭到暴徒袭击，不就是几个月之前的事情吗？电视台记者报道说，全军劳第二波罢工接近尾声时，首次出现冲绳民众之间的对立，并引发暴力骚乱。以这样的顺序来讲述时，他要么是在故意掩盖什么，要么是自己的意识中欠缺些什么。

---

〔1〕福地旷昭（1931— ），生于冲绳。曾任冲绳边土名高中教师、冲绳朝日新闻记者、冲绳教职员会政经部长、冲绳县教育振兴会事务局长。至今仍担任冲绳人权协会理事长等职务。——译注

〔2〕这里的上原，指的是上原康助（1932— ），政治家、劳动运动家。原国务大臣。——译注

有些人自作聪明地嘲弄道：冲绳的全军劳罢工与全部撤除基地、立刻回归的主张不是很矛盾吗？这些人自不待言，那些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有效解决问题的办法、示以同情的人，如果他们也把这次罢工看成是隔着二十七度线来隔岸观火，那么当然要么是本土日本人在自欺欺人，要么是他们身上欠缺些什么。全军劳罢工实质上强化了冲绳基地，但它也是对某种势力的抵抗，这种势力使日本政府和自卫队一起在长驱直入冲绳之际，将冲绳捆绑到了与华盛顿和东京这两架难以分离的战车上，把它变成能够拥有核力量的庞大基地。而如此一来，恐怕是将战后的日本史推到了最危险的、没有退路的拐角（如果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是在越过那个拐角一两步之处做出的选择，那么，它势必要在不能后退的状态下滚下拐角对面的陡坡）。

也就是说，罢工的矛头多半是指向本土日本人的。那样的佐藤·尼克松声明刚一发布，对冲绳谈判负有直接责任的政党在选举中就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倚靠在飞机座席上的我就是参与如此选举的本土日本人。作为那样的日本人，我前往冲绳，在旅行目的地，能抱着怎样的预感，去期待那温和宽厚的相见呢？

飞机降落在那霸机场。穿过那座小桥，在办理海关手续的途中，我抬头看了一眼接送旅客的天桥，那里原来悬挂的条幅看不到了，只见"欢迎东京官厅高级官员"的横幅。这光景让人想到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之后，本土政权"一体化"进

程中的诸种进展态势及其性质。而我刚过海关，就被当地新闻记者追问道："你是来支援全军劳罢工的吗?"我面红耳赤，而这一点，我同样没有隐瞒的权利。不用说在冲绳，就是在本土，无论劳动者如何诉诸武力，也不能说我是那种能够积极予以支援的人。我是生活在书斋中的人。但是我想，即使我是革新政党活动家，或者是工会的灵魂，在这样的追问下，大概也不能不狼狈不堪、面红耳赤吧。

坦率地说，本土对第一波罢工的支援实在太微薄了，但问题恐怕绝不止于此。因为长期以来，拒绝对其投注想象力的本土人就反复指出，宪法已成为一纸空文。冲绳民众从来没有得到宪法保护，却被禁止罢工、禁止集体进行劳资谈判的一一六号令牢牢束缚着。冲绳那天凌晨就开始的罢工，到了一九六九年六月十五日，达到二十四小时罢工的高潮；而实际成果是，罢工持续了四十八小时，这使得一一六号令本身在与本土对宪法的指摘截然相反的意义上成为一纸空文。因为罢工从开始到结束，它的所有阶段都是无法用本土的罢工标准来衡量的。

福地旷昭氏身居教职员会的政治经济部部长之位。而刚刚说过，他在恐怖事件中深受创伤，留下了后遗症，让他离不开那细小的拐杖。他生性温厚，但绝不退缩，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福地氏说："与本土相比，冲绳的斗争很难轻易达到目的，从外部来看似乎也不见效果。但是我们会逐渐达到的。在本土，总罢工一旦不能实行，就很难重新进行。而我们不同。我们有可能实行总罢工。"继而，他谨慎而又绝非挑战地说："一

九七二年之后，与教育相关的本土法律将逐渐渗透进来，但我们能够把它变成有漏洞的法律。投入这种运动的种子要多少就有多少，无非因为这里有巨大的基地。”这时，我再次体验到在机场时所感受到的浑身震颤的感情。

普天间寒风刺骨。在暴雨中，纠察队队员一直放哨到天明；深夜，我站在沉默的纠察队员身边，尽管时间非常短，却硬要说自己在现场。我反复要说的，也就是：满是毒素的意识堆积在我的内心，已难以清理，却仍然不断地填塞着，像一只忧郁的蟹蹲伏在那里，双手抱着一个个满是引发痛苦的自我嫌恶和无力感的幼仔，作为那样的本土日本人，我出现在现场。

而对第一天的罢工，不仅是美军，日本政府也没有丝毫积极的反应。进入罢工的第二天，对我来说恐怕是终生难忘的一天——一月九日，恰在一年前的一九六九年一月九日，一个男人在火灾中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他死时带着无限愤怒。晴朗正午的蓝天璀璨夺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冲绳那不见月亮、难以言喻的漆黑的夜空。明明找寻不到随风飘动的云，我还是徒劳地昂着头，说起来其实是要试图寻找悬垂在漆黑夜空中那个愤怒男人的幻影。而我不断缅想的中心人物，就是已故的古坚宗宪氏。

不管那个幻影是否出现，深夜中想起古坚宗宪氏，事实上也许比受到任何基地劳务人员的诘问都更为可怕。那些纠察队队员安静地伫立在我的周围，像一团黑影，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现在我想，那天深夜，古坚氏的幻影的确漂浮在黑暗

的空中。有一种类型的死者，我们必须把对他的记忆当作锉刀，来不断检验自身的硬度。这种类型的死者比任何幻影都更为切实地持续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相反，倒是我们期盼着从那样的记忆中逃离，气喘吁吁地跑着，比逃离任何恐怖的幻影都更为迅速。

尽管那天深夜，在冲绳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冲绳领导和民众所抱着的愤怒、不安、焦虑、屈辱感和叹息，各各都是互不相容之物的集合体，然而也许可以说，那一切都汇集到古坚宗宪氏的幻影中，并在那里切实存在着。应该说，将那一切都统括起来、葆有多样性的古坚宗宪氏的幻影，无非在将目光投向本土的日本人，进而投向我，投向那个在普天间的凄风冷雨中沉默紧张的基地纠察队员身边呆然不动的我。

虽然声讨日本人、本土日本人这件事本身包含不同侧面，然而对于来自本土的日本人的我来说，每一个侧面都与对古坚宗宪氏个人性的回忆有关，都是直接针对我的声讨。那么，以古坚宗宪氏的幻影为媒介，遭到冲绳一切声讨的感觉，也是我作为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比如，在我眼前出现要破坏纠察的基地劳务人员，那么我能怎么办？如果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去破坏，他诘问我道："作为本土日本人，你到底有什么资格来大呼小叫？"与纠察队员的诘问相比，那是更为犀利灼热的利刺，抓挠着并弄伤了我纤弱的肉体和精神）参加纠察的想法。古坚宗宪氏死后大约百天，我前往冲绳旅行。经过伊江岛，我前去拜访一个小屋。那小屋屋顶的红瓦是用冲绳独有的

灰浆加固的，白色板门也历经风吹雨打，还记得用朱槿围成的挡风墙上正开着鲜红的花。我站在入口处半开着的门前，从正右方的隔扇后面探出一张清癯红润的脸，看起来精神矍铄。从左侧通向有洗碗池和灶台的土间[1]里，一个老妇人露出一张白皙微胖的脸。我们没能真正地交谈几句。古坚宗宪氏从老人那里继承了原本幽默、一喝醉就胡搅蛮缠的开朗性格；他有时也让人感到近乎怯懦的和善，这大概是从老妇人那里继承过来的吧。关于古坚宗宪氏的人格，我只获得了这么一点具体的解释。看着海水长年侵蚀形成的、成为冲绳战中民众避难所的巨大洞穴，看着不孕的妇人去求子的一块小石头神，我最终乘坐下一班渡轮，离开了小岛。

在这次短暂的拜访中，我看到入口处正面的佛龛上悬挂着古坚氏的照片，表情异常独特：似笑非笑，似悲非悲，似困惑非困惑，这一形象与这一年来不断向我愤怒诘问的古坚宗宪的形象重合在了一起。据悉，某位日本政府总务副长官恬不知耻地说："再也不能姑息冲绳了。"当然，我没想到，古坚宗宪氏对我发出的多样性声讨的幻影，也来针对这种可怕的言论对我进行声讨。那位人伦颠倒的男性是我们政府的高官，正因为我们无法把他从那个位子上拽下来，我才每当在冲绳引用这句话时不能不感到不安。

关于这次罢工，日本政府声称要暂时静观。而古坚宗宪氏

[1] 土间，是指没有铺设地板的房间。——译注

的幻影则明白无误地将声讨的矛头指向我这个本土的日本人。在从羽田飞往那霸的飞机上，我阅读的报纸登载有屋良主席的谈话。他说："希望本土舆论不要认为冲绳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而是要把这个伴随着回归决定同时袭来的难题作为国民性的课题来进行思考。"这番话让我想到，那个深夜大概最为痛苦地忍耐着的冲绳人就是主席了。这时，古坚宗宪氏的幻影栩栩如生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仿佛这样责问我："主席夫妇当选后第一次访问东京时，欢迎会由我来主持。当时我紧张得脸色苍白。会上由你负责献花。面对冲绳诞生的革新主席的现实政治生活，那一小束鲜花不就是你唯一的实际行动吗？"

古坚宗宪氏的面容如此苍白，苍老的皮肤几近紫黑，看起来孱弱多病，这应该不单是因担当会议主持人而紧张的缘故。那时业已进入与本土政府谈判的准备阶段，不少事情让他深感疲惫。而为了协调本土的革新政党、革新团体与冲绳革新主席之间的关系，他奔波于筹备工作，这无疑也让他疲惫不堪。为图工作之便，他夜宿日本青年馆。工作烦琐而又繁重到极点时，他累得喘不过气来，于是依靠烈酒寻求睡眠。那天晚上的火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并置他于死地。他就这样死去了，他的幻影只消诘问道："现在本土的革新势力在为冲绳的全军劳罢工做些什么？"就足以让我们众多人遭到重重一击。

尽管他的故乡伊江岛有一半被占作基地，尽管基地非但得不到缩减，反而在强化的同时解雇劳务人员，尽管他的一位兄长死于冲绳战，但是华盛顿和东京政府却朝着对这样的死者进

行赎罪的相反方向，驾驶着失去制动的可怕的车，使对这一切进行抗议的罢工在孤立无援中展开。这样一来，他的幻影又怎能保持沉默？

黑暗的宇宙中，古坚宗宪氏漆黑的幻影发出的最为犀利的声音逼向我的内心，让人感到，那声音同样关涉宪法，关涉民主主义。在向宪法尚未实施的冲绳不断运送宪法手册的运动中，古坚宗宪氏最为热忱。他死后的一年，不断有人、尤其是学生和年轻工人（那个深夜之后的次日，不如应该说已经是当日，从罢工的总结大会的广场奔向军司令部那浩浩荡荡的庞大示威队中，我看到他们的队伍被夹在好几层厚厚的机动部队的人墙中，凄惨得如死去一般）对宪法的形式化提出质疑。在这一年间，不断有人强烈指责：民主主义、并且被称作战后民主主义的东西是幻象，是有害的假象。

在我的脑海里，古坚氏的幻影又要开始责问我了——对你来说，宪法究竟是什么？民主主义是什么？要是你在自己的内心反复探究过，那你现在就把它的实质给我说清楚！在不受美军命令管辖的本土，你们至少是有一部宪法的，管它只是个空壳还是什么，这个课题不应该清楚地解决嘛？那个课题可以和战后日本历史的全部重量相匹敌。你对这个课题一知半解，现在却又对冲绳提出来，这算什么？你听到过多少次新左翼阵营说要把冲绳当作桥头堡进行战斗之类的话？我死了，只有保持沉默。那么，“对此，要是古坚氏大概会这样”之类承载我终生运动经历之重的话，谁会替我说出来？一九七二年回归的具体

方案，与我不惜牺牲从事的回归运动的真谛实际上截然不同。现在强权在推动着它，你在怎样有效地对抗?

可以说，在那个无休止地被逼问的深夜，在风雨飘摇中，在为自己的肉体感到羞耻中，我出现在纠察队里。“你为什么来冲绳?”坦诚地说，面对这个声音时，我想自己一次也不能昂起头来回答。一九七〇年正开始全军劳罢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冲绳之旅就像是在腰间绑上重重的秤砣一样的旅行。

是的，形势不同寻常。因为是在卡宾枪和暴徒的袭击中作战。

据来自那霸的报道，持续五天的第二波罢工结束之时，一个参加罢工的基地劳务人员说：那确实是特别的战斗。采取非常态势的美军动员了戴绿色贝雷帽的陆军特种部队和海军，将矛头指向并非外敌的冲绳民众。在亮出卡宾枪的美军和民众之间，美军方面不得不强行让浑身都体现了冲绳矛盾的冲绳警备员设置“缓冲线”，而在没有“缓冲线”的地方，便能看出是赤裸裸的现实冲突的罢工。虽然第二波罢工结束了它所有程序，美军也没有予以任何回答，而日本政府则在静观。

明知泥潭深不可测，这场大规模斗争的罢工还是要去穿越。作为一个来自本土的日本人，在刚刚所说的意义上，我也只是在进行如此规模的第一波罢工开始之时，出现在现场。深夜的普天间，或者黎明时分，在从那霸军港通往基地大门的路

上，我把护照放到口袋里，无力地站在纠察队员的旁边，我为此感到羞愧，又想极力掩饰。伫立在那里的体验给我带来了什么？面对强大如墙垣的对手，罢工遭到顽固挑战，但又富于持久性，个中内涵，大概是通过历经很难说成是战后二十五年的冲绳人的肉体与伦理昭示出来的，它彰显了每个人内心的罢工。

“在推进越战的进程中，冲绳居民的玩忽职守及其与美军的摩擦将对美国构成新的障碍。”《世界报》[1]做出这样的观察是在佐藤·约翰逊那场空洞的会谈刚一结束。其后，爆发了这次全军劳罢工；接下来，在表明将它推向总罢工的现在，也就是《世界报》为时过早的观察眼看就要成为现实的现在，我想，自己被赋予了一种理解力，去理解迄今为止的时间，去把握以基地劳务人员为核心敏感的冲绳民众是怎样度过这段时间的，及其所具有的意义。

这些日子以来，冲绳基地劳务人员及其家人无休止的忍耐、不安、失望和愤怒汇合在一起，沉甸甸地充斥着生活的全部空间。其间生出的抵抗并非是跳跃性的，而是在绝对势不可挡的力量中静静地推进着。以冲绳为核心的东京·华盛顿“太平洋亚洲”军事基地结构渐趋稳固，在历史事件发生的现场冲绳，只要去看看基地劳务人员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全部想象，就能够明白：不管领导期待与否，这场运动的大方向都不会发生变化。

---

[1] 《世界报》是法国报纸，日刊。创刊于1944年。其前身是《时代报》。——译注

“由于基层的抵制，罢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刚毅的全军劳上原委员长流泪了。”对此事进行报道的几家报纸还分别报道说：翌日，在宜野湾市学校建设用地举行总结大会，上原委员长轻松地说：“没能得到美方的答复实属遗憾。但最大的收获是，我们获得了突破困难进行作战的自信。”其间仿佛有一个不连贯的对比颇为引人注目。但是，只要不能亲眼看到这种艰难的战斗取得胜利就要斗争到底——在全军劳委员长这种双重面孔之间无疑有一种连续性，而填充其间的就是时间。我以为，正是参加第一次罢工让我认识了时间的意义和它的力量。

第一波罢工的总结大会是在建筑用地中央的斜坡上举行的。在不停起飞的美军飞机和盘旋的直升飞机的噪音中，上原委员长非常笃实地陈述着事实，并且只予以切实的评价。彻夜在冷雨中放哨、肯定已经疲惫不堪的基地劳务人员及其支援者蹲在泥泞难行的地上，同样笃实地互相表明下次罢工的决心。这当然也是对福地旷昭氏平静地陈述着的内容的印证，而此时他正拖着疼痛的腿出现在斜坡上的群众中。

首先，由于让禁止罢工的一一六号令成为有漏洞的法律，这让全军劳罢工本身首次获胜。福地旷昭也说：“冲绳的斗争很难轻易达到目的，从外部来看似乎也不见效果。但是我们会逐渐达到的。”尽管如此，却有必要承认，第一波和第二波罢工均没有得到美军方面的任何答复。不过那些要参加最艰难的战斗的人绝不抱有失败感，他们用力踩踏的斜坡以及美军基地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土地，无疑是应该夺回来还给冲绳民众的土地。而他们

现在正在推进在本土不可能实现的总罢工具体计划。

花瓣已在枯萎凋零，覆盖着斜坡的野草恰似为冬天短暂的冲绳而生，让人感到，尚未整饬的斜坡被烂漫的鲜花装点的日子刚刚逝去。在那一丈高的野草中，在前述意义上，我出现在集会现场。然而，以我贫乏的植物学方面的知识，我是不能完全准确地叫出那些已经开始枯萎的野草的名字的，只知道它们是类似于地榆的植物，或是如同费菜的植物。这些植物再次唤起我对古坚宗宪氏的记忆。战后不久，在担任边土名高中生物老师期间，他在一片焦土的冲绳发现了植物新品种。同样是在边土名高中，福地旷昭氏曾教过英语。诗人兼报社记者的新川明氏从草创期的琉球大学休学，也曾在这所边土名高中短期任教。

在遭到绝望性毁灭的战后冲绳，他们是在将文字刻在瓦砾上接受教育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曾一度作为年轻教师站在现场的讲台上，呕心沥血。而其间，他们又为自己内心冲撞的东西摇撼着，也为了反抗包裹住自己的外部力量，他们重回大学，继续学问之路。

古坚宗宪氏将向学之志和作为现场教师的经验与冲绳回归运动结合在一起，而在冲绳首位公选革新主席刚一诞生，他即死于非命。福地旷昭氏同样通过教职员会和人权协会的工作，为持续推进冲绳革新势力的统一而努力，虽然在白色恐怖中勉强生还，却毫无畏惧。

而新川明氏在踏踏实实地创作完《新离岛风土记》之后，还开始表明不能让冲绳埋没在“太平洋亚洲”中的决心。尽管

他们作为现实的批判者或是被批判者而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仍然可以判明，这里渗透着他们作为冲绳战后一代始终不渝的努力。我想将这些加以对比、汇总并报告出来。佐藤·尼克松声明使参与国政一事在本质上完全变质，现在，在对此事追根究底之前，冲绳的革新政党只是想暂时响应一下号召。新川明氏曾以诗人的声音倾诉温暖的心曲。现在作为报社记者，他对冲绳的一九七〇年代的现状进行分析并作了如下总结，促人反省。

可以说，冲绳今后要“不断提起抗议”。作为现实存在，为了捍卫它独自的存在意义（关乎历史性的、地理性的），在缔结包含反对流血、进行抗议的一九七二年回归内容的“回归协定”和国会承认之前，我们只有战斗，严厉拒绝冲绳参与国政。

在缔结回归协定以及国会承认之前，拒绝冲绳国会议员选举的斗争，从过去以教公二法[1]斗争为开端的各种斗争经验上看，非常有可能——只有成功，在面对强加于

〔1〕教公二法，是指《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两部法律。在回归之前，冲绳公立学校教职员的身份是“琉球政府公务员”或者“教育区公务员”。关于琉球政府公务员，1953年制定《琉球政府公务员法》予以保障。而为了保障“教育区公务员”，制定了《地方教育区公务员法》和《教育公务员特例法》。但是，就像《本土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那样，这两部法律对教职员从事政治活动加以限制，并引入考勤制度，因此遭到冲绳教职员会的反对。——译注

己的“扭曲的回归”的日本政府时，冲绳才能保留“不断提起抗议”的“权利”。仅仅为了政党的利己主义或是个人私欲而积极参与国政时，就等于自行放弃“不断提起抗议”的“权利”。与可以预知的七十年代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诸种森严管束相抗衡战斗，为把自己从被统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而战，这种思想和行动无异于自掘坟墓、自取灭亡。作为“不断提起抗议”的存在，“冲绳”也失去了意义。当它被取消成为地方一县时，在与“日本”的关联中持续受到追问的“冲绳”的战斗，将势必走向绝望。

这确实是正确的分析和意见。也的确，作为本土的日本人，我没有苟同的权利。然而我在想：如果我们一直都没有强烈地意识到，我们要接受冲绳“不断提起抗议”，即使过了一九七二年，如果不把冲绳看成是在我们的肉体和精神内部燃烧着的灼热而尖锐的利刺，那么，将来日本人不论是在国际政治上，还是国内的、甚至是个人伦理层面上，都势必走向绝望。读了这篇评论，让我弄清楚了这一点。因此，我想在强烈的拒绝力量所不具备的坚韧的温和中，来回答那些正在看我文章的冲绳人，并且希望继续自己的脚步，探寻明天的答案。

正是在那样的行走中，我似乎要把自己卷进那年年加深的最为根深蒂固的无力感，和“所谓日本人，真的是这样的人吗?”这种内心黑暗的漩涡中，对出现在深夜的普天间那漆黑的幻影发出呼唤。古坚氏，我们政府对全军劳罢工所说的“静

观”一词的含义，是指直到一九七二年之前，只消等待以全军劳为首的冲绳所有革新势力、毋宁更应该说是最具冲绳特性的冲绳民众的抵抗力——他们或是作为组织或是个人——消耗殆尽。但是，我要说，从但是开始的事情还是有的，而所谓的但是，对于确实理解冲绳不断提起抗议的人来说，是被赋予力量的但是。

我知道有人在对我冷笑：“你似乎对现实政治一无所知，说出的话却很慷慨激昂。”那么，要真正理解冲绳不断提起抗议，第一步就是要在知道别人对自己的冷笑后，把认为是最为复杂的意义都考虑在内，向比谁都懂得现实政治的古坚氏的幻影发出呼唤。那就是，寻求所谓战后民主主义的持续、或曰复兴、或是首次去实践的人，一跃而提倡废除国家的人等包括几乎所有战后日本人在内，在自己作为人的根基上，沉潜到羞于启齿的隐秘的内心深处，去思考：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吗？

关涉到冲绳的历史和战后的现实，有很多人悲愤而死。尽管各有所志，继林世功、名城里之子亲云上之后，其中最为典型的幻影，当属古坚氏了。

（一九七〇年一月）

# VII 战后一代的坚持

在东京数寄屋桥——若就一般日本人的都市意识而言，它也是日本地理和日本人想象力的中心地域——一伙暴徒冲进这里的冲绳全军劳罢工宣传募捐现场，他们的头目在宣传车上叫嚣不停。我无意于写“一伙右翼杀来了”，也不会用“右翼在发表妨碍演说”这种说法。这并非出于害怕，实事求是地说，是一帮最为卑贱可怜的“丑陋的日本人”杀来了，是盛气凌人的“丑陋的日本人”在叫嚣。虽然与上原全军劳委员长和代表冲绳受害者的仲吉县劳协议长一起，我也忝列在呼吁募捐的队伍中，毋宁说，我与结伙闯来、使用污言秽语的那帮男子血脉相连。

我道出事实真相，并非仅仅关乎伦理道德。宣传车上的那位男子用充满歪曲意味的言语大声鼓动着，几近荒唐且露骨地要在日本人和“冲绳人”之间砸进歧视意识的楔子。不用说，他是在冲绳不合理的、遭到歧视的历史的蛊惑下意欲发表更为

厚颜无耻的演说的。那个男子盲从强权而歧视冲绳，他硬是一错再错，无视事实。而可怜的暴徒们则把他那语言的楔子换成棍棒，鬼鬼祟祟地闯进来，处心积虑地要挥舞起棍棒。他们违逆整体日本及每个日本人补偿冲绳牺牲的意志，跳过伦理问题，摆出一副不合逻辑且极不讲理的怪异的强硬态度，气势汹汹地要把歧视的楔子砸下去。

这个楔子与它背后更为隐蔽的本土强势政府的政治家和官僚纠合在一起开始有效地砸进去的楔子在结果上是同一种东西，是所有日本人半是无意识地、半是装作无意识地开始偷偷紧握不放的楔子的最锋利之处。不论哪个日本人，一旦同意去握这个楔子，握住楔子的手就将承受日本那沉甸甸的强权之重和冲绳那沉甸甸的悲惨历史之重。不是哪个右翼煽动家费尽心机就能将凭空的幻象当成素材刻出纤弱的楔子来的。他们手持坚硬的楔子，并且是凶器的楔子，却丝毫不带有对自身及对日本人的羞耻感。

因此，即使把凶器对准上原全军劳委员长，他也同样处于毫无防备的状态。面对这些猖獗横行于本土和冲绳之间、把歧视冲绳的楔子当作凶器猛然袭击过来的暴徒，他必须站立在公众面前。他并没有流露出内心的愤怒就返回冲绳。对于令人心寒的、绝对的轻蔑，他恰恰时常表现得冷漠淡然，不流露愤怒，不赤裸地呈现自己。而在如此露骨且极尽卑劣的楔子与迟钝冷漠的挡箭牌猬集之时，至少对于注视着他的冲绳人来说，没有必要故意流露出愤怒。

新川明氏主张要面向未来，把冲绳作为不断提出异议的场所。他也非常公正地讲述了全军劳罢工所受到的支援。越南南部解放阵线副主席曾经郑重地说："与其接受日本诸位的募捐，倒不如希望他们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想起这番话，新川明就预先发出警告："我想说的是，捐款箱里投入了众多市民或工人的无数善意，但是这些怀有善意的人却仅止步于和全军劳联合战斗这种自我满足的程度，这样就有忽视全军劳战斗（和冲绳的战斗）与日本自身战斗的紧密关联性的危险。"

而事实则更为糟糕：捐款箱里并没有投入任何"善意"。挥舞着棍棒结伙闯进来的人（现在这些暴徒受到正义使者的严重打击，最后却露出正义使者般的表情，当清晰地回想起这些，我感到很茫然）打落接收捐款的锅，从锅里滚落出少得可怜的几枚硬币。一直站在那里，带着与自我满足完全不同的感慨，我切实感受到自己陷入那深不可测的暗黑的忧郁，思考着"日本自身的问题"。不用说，由于真相大白，批判者向来都从冲绳发出犀利的声音。而我写下这些，并非是要躲避那批判的声音射过来的坚硬飞石。在此，我只想回个信：我已被那猛烈的飞石准确无误地击中，大概还将被击中。

我现在要讲述的，是戏剧团体"创造"的诸位。继承新川明氏这一代在琉球大学的学生运动和运动的核心《琉球大学》，新一代琉球大学学生支撑起了学生运动中最为激烈的阶段。他们经历过一九六〇年，通过戏剧来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愤怒，进行自我超越，并且始终保持这种势头和方向性。上原全军劳

委员长默默地注视着暴徒的所有行径，心中充满了厌恶和愤怒。作为其兄长一代的报社记者，他们的内心同样满是厌恶和愤怒。除了思考把冲绳问题视为“日本自身的问题”，他们预见到不可能有什么“支援募捐”。在这坚持不懈的十年间，这些戏剧专家借助造型艺术戏剧的想象力，清晰地将这些表现出来。

一九六一年四月，他们在“在填补冲绳戏剧空白的同时，要通过戏剧来构筑现实变革的理想”这一口号下聚集到一起，上演了藤田朝也的剧作《太阳的影子》。他们在作品中借助在阿尔及利亚叛国的法国人来猛然甩开“祖国”日本，对“祖国”日本进行重新思考，并且把它作为自己课题的起点。

与这些大致同龄的年轻人相遇，是在我的首次冲绳之旅中。那时，他们在艰难中支撑着的戏剧事业已经进入第五个年头。而构成其独特的戏剧基础的现实生活则在更为艰难的状态中持续着。现在他们谨慎而切实地维持着根深蒂固的 identity[1]之根源。而艰难状态下的坚持，正是以这种形式被迫开始的。关于戏剧活动，用这样的语言来表现尽管不失妥当，但关于他们在实际生活中的坚持，我写的是“被迫开始”，本来就其实际生活乃至他们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想状态而言，准确地说，有难言之处。对那种实际生活的坚持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至少，是为了作为堂堂正正的人而活着，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如果硬要对戏剧加以比喻的话，就像是在明亮的舞台上，

---

〔1〕 意为“认同”、“身份”。——译注

“创造”剧团的年轻人、也是剧团成立以来的核心力量静静地坐在昏暗的土间，让我无法不感受到，他们正用那犀利批判的、可怕的眼睛盯着桌子前面的我，并且，从那昏暗的土间传来的各种批评之声也分明是在刺向我。声音的形象很具体，因为它至今仍然回荡在我的耳朵里。就在全军劳第一波罢工的支援者来到深夜放哨的集合场地之前，在越来中学的某个教室里，“创造”剧团的年轻人正在进行发声练习，那刺向我的声音无疑就是这明显经过训练的声音。就读于这所中学的孩子的身上体现了胡差市充满矛盾的市民生活的多样背景，就在这所中学的教室一隅，深夜，我听着那发声练习，读着“创造”剧团的一个成员正在撰写的有关谢花昇生涯的戏剧未定稿。

那些声音说：你说作为堂堂正正的人？思考着“日本自身的问题”、日本人自身的问题，思考着无非是你自身的问题，你却不抱有任何灼热的羞耻感，面对我们，你能说是“堂堂正正的人”吗？如果是那样，那么在冲绳不做堂堂正正的人同样能想方设法活下去，你能够堂堂正正地去谴责那些做出我们之外的选择的人吗？

我做好全部接受那些反抗声音的精神准备，斗胆在这里写道：他们作为堂堂正正的人在坚持着，过着切实的生活，举办戏剧活动，并且毫不畏惧地出现在政治性示威游行的现场。

本土的日本友人对我说：我不得不在你的这篇迂回往复的文章风格中找出被害妄想的征兆。我想让他们知道，比如在二月份的一份报纸上，政治版面报道冲绳全军劳陷入二重、三重

困境，又发现社会版面登有如下新闻，可以说，我不能不发现，在政治版面与社会版面之间，有个扭曲的自己。那条新闻叫“抢劫公寓一亿元　冲绳混血青年”。仅看这条新闻的标题，就让人感到，它一下子射出一道可怕的光束，照出当下日语中最令人作呕的“昭和盛世”、与这个词语相称的本土消费生活的膨胀，以及刻进冲绳的肉体而留下的伤痕——贫困。

生于那霸市的青年从青山附近的某别墅盗窃出贵金属和饰品。他属于某冲绳人团体，这个团体里的人不能很好地适应本土环境，过着贫穷的下层生活。他们内部是想把赃物换成现金，结果遭到逮捕。所谓“别墅”，是在当下日本风俗中被赋予特殊意义的异样生活圈。青年人从那里偷出来的，相当于日本工会总评议会要为全军劳募捐的目标额度——一亿，这一个亿全由一个青年敛齐了。但是，这些价格高昂的赃物在本土这个孤立而贫穷的冲绳人小圈子中倒来倒去，终究无法换成足够的现金，于是在某个清晨，团体所有成员均遭逮捕。所谓不堂堂正正的人是什么人？堂堂正正的风俗在哪里？一个从来没有干过赃物买卖的蠢贼，从东京随处可见的某个别墅、官邸内，顷刻间偷出的就高达一亿，那些堆积如山的贵金属、饰品之类的东西，是用什么手段，或者是借助什么跳板囤积起来的？我绝不认为那些思考今天“日本自身的问题”、注视着冲绳的人，看到这条“抢劫公寓一亿元　冲绳混血青年”的新闻，有谁能做到无动于衷。

回到“创造”话题。关于那些创始人，当说自己和他们大

概同龄时，我要加上这样一条注释：这种话就像是带着沉重的铅锤，擦着喉咙而出。历经一九四五年的体验、生于一九三五年的本土人与冲绳人之间有一道令人昏眩的深渊，注视着这道深渊，我才敢说，自己与他们同龄。

但是从一九六五年初次见面，到最近的相遇，"创造"剧团的青年人是最为频繁地讲述自己冲绳战体验的人。参加铁血勤皇队战斗的一代，如大田昌秀氏和外间守善氏几乎从不主动提及自己参加的冲绳战。在他们充满痛苦的沉默背后，隐藏着沉重的记忆。在这些学者各自从事的专业的根柢，有一种无法不让我们敬畏的道德力量，它应该就植根于那种体验。仲曾根政善氏一代学者则引导那些虽被从战场上拖出来、最终还是遭到抛弃的女学生朝向生之微光，让她们不屈不挠地穿过死之暗渠。他们在讲述冲绳战时，带着阴郁沉默的反抗，让听者渐渐地无不体味到想要钻进地缝的感觉。这位温和的日本文学学者在广岛发出具有强烈冲击力的声音，那应该是极为痛苦的沉默使然。正因为如此，广岛人真正理解了那声音。他说："如果在广岛有核基地，诸位将作何感想？我们在冲绳体验着的，正是那种事情。"

在这样一群人中，倒是"创造"的青年在我们第一次邂逅时主动向我讲起冲绳战体验。自不待言，与那位来自本土的近乎犯罪般迟钝的冲绳残酷物语搜集者不同，他们的口吻不带有任何兴奋。下面是他们剧团规章的前言，其中的含义，仅仅是为了重新明确其自身的经验与状况。

让这个时代为我们所拥有。
所有的屈辱是我们的，
所有的悲痛是我们的，
在这痛苦的坐标轴上
来创造明确的梦想。

我常常想起，在我第一次旅居冲绳时，“创造”剧团的年轻人把我带到距离胡差市仅有几步路的具志川巨大的垃圾焚烧场。站在荒野般的现场，我感受最为强烈的，就是在巨大无边的美军基地，从那里排出的垃圾堆得一望无际。适逢雨季，在冬季冲绳的小雨中，焚烧垃圾燃起的淡蓝色烟尘伴随着臭气，在垃圾的荒野满地乱爬，迟迟不向空中扩散。从垃圾中对可能再生物做拣选处理的人劳作着，浑身沾满烟尘和臭气，这与基地铁丝网内几乎不尽情理的富足和肆意消费的日常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创造”的年轻人为了公演也常常到这里拾拣小道具。那些表现阿尔及利亚和纳粹德国暴力的演员为了表演，需要一些令人胆寒的小道具，他们从这里拾拣一些可能变作小道具之类的东西。

我不能忘记，在从垃圾的荒野返回的途中，面对着茫然无措的我，“创造”的年轻人用一种不可思议的客观、甚至是漠不关心的平静口吻，相继讲述起他们的冲绳战。生于一九三七年的中学教师、“创造”的核心人物说，尽管父亲阻止，他的当学生的姐姐还是偷偷跑去运送弹药，最终没能生还。

同为支撑“创造”的另一位核心人物、一位高中老师也直截了当地讲起一个像是用沾满血污的手戳进本土人内心的事实，也就是在生于一九三五年的他所寄身的庆良间列岛的渡嘉敷岛上进行的集体自杀。这位老师一五一十地讲述着正好在现场的人的经验：由于受到本土军人的强迫，在这个集体自杀现场，与祖父一起躲起来的幼童在旁边的防空洞里，偷看到一个父亲用力踩着孩子的胸部，挥动着凶器——那转瞬间也将成为他自杀的凶器，祖孙二人于是一起逃往山里。在庆良间的确发生了从被迫集体自杀、因违逆而遭到日军击毙和美军的炮击这三种死亡之网中痛苦逃生的事件。

并且，从他们讲述自身和身边事情的口吻中流露出的某种不可思议的客观和漠不关心，现在我也多少能够理解了。实际上，我一直在反复回味这一天的所见所闻。就像把凄惨地滴着血的尸体随随便便地抛到别人眼前，通过直截了当地讲述冲绳战体验，应该能够给本土脆弱的旅行者以最为鲜明、最为强烈的打击。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骄傲与自尊，他们是不愿意如此赤裸裸地自我表白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绝不容许自己去参与讲述庸俗的冲绳残酷物语之类的东西的。他们是一群自负的人。

那无疑也意味着：他们以其自负在表达着坚韧的拒绝，但又超越了这种自负，把自己的冲绳战体验深植到想象力的根柢，来试图重新把握，他们都不允许、也不能允许自己将过去的体验藏而不用。他们用想象力将自己的和同志的经验紧密连

结在一起，无非是为了更新自身的经验。通过不断更新、不断地重新把握来理解戏剧。因此，如果听者对埋藏于过去的悲惨回忆故事流下安全而多愁善感的泪水，那么他们不仅仅会用客观展望全局的态度把那种体验讲述出来，而且，他们还会用绝对拒绝且强硬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平静而切实地讲述在冲绳战中发生了什么，又可能发生什么。

为了把幼年全部的冲绳战体验化作“今日的经验”，他们和自己的同志在不断地、最大限度地发挥着想象力。如今他们要更为明确并且深入地不断重新体验的事业，无疑是“创造”剧团的戏剧活动。

一般而言，亲历者的讲述所带来的冲击予人以这样一种印象：随着与讲述者的再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体验越是凄惨怪异，就越容易在日常性的马马虎虎中被淡化。但是，对于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再次聆听的我来说，听着这些从七八岁到十岁就亲历冲绳战的“创造”的年轻人讲述自己的时候，我感到他们的体验鲜明而浓重地复活了，完全不同于上述遭到风化的现象。最初，听他们讲述自身体验时表现出来的不可思议的冷漠甚至让我怀疑：他们是不是记忆有误。渐渐地，我感到，他们每个人的冲绳战体验、对戏剧事业以及现实生活的执著的分量在增加，内容在浓缩。

比如在去年春天，边坚持从事“创造”工作、边在越来中学教书、执著于现实生活的幸喜良秀氏在说起他的学生到基地打工，做的是清扫 B52 战略轰炸机的工作时，带着愤怒的阴

郁，表情异常复杂。我不得不重新认识距此四年之前在具志川垃圾焚烧场，他用三言两语向我讲述他姐姐一事的真正意义：为了运送冲绳战的弹药而离家出走，还是妙龄少女的她就死掉了。

中里友豪氏任教于中部高等农林学校，同时也是“创造”剧团富有魅力的演员。他同样清晰细致地再现的渡嘉敷岛那个幼童眼中残酷的经历，如今依然存在。就像是执著于一个妄念一样，中里友豪氏始终不渝地坚持着他的现实生活。我真正碰触到那锐利的刀尖，是他讲在自己的学生中，有个掌握农业技术同时还在学习西班牙语的学生说应该移民的事情。

所谓的祖国是什么？所谓的日本人是什么？正是激愤而执著地去追问这具体的命题，连同战后二十五年间对冲绳“战争”的认识，成为“创造”剧团的一贯主题，今后我将对此展开论述。不过，我要说的，是生于战后冲绳、也就是说出生之后从来没有拥有作为日本人合法国籍的少年，却想移民到一无所知的国家这件事。那些诚实的教师不遗余力地教育着这些孩子，他们勇于把对庆良间艰难幸存的幼童的思考挑选出来，作为自己内心最为本质性的经验，并不断加以重新理解。

现在，只要打开与他们具体接触时写下的篇篇札记，我就能确切地了解，“创造”的年轻人在他们一贯的戏剧和现实生活中，是以什么为其核心、是怎样坚持不懈的。一九六五年春天，面对说起来是第一次将头撞到冲绳之壁上的懵懂无知的我，幸喜良秀氏讲起回归日本之事。他怀疑，冲绳县是否将成

为日本最右倾最保守的地方，是否会成为保守党的温床；他预料：如果不改变日本的政体，冲绳人即使回归日本也终将遭到背叛。借助一九六一年《太阳的影子》首次公演，他本人也参加了演出。通过这出戏，他明白无误地发出如下言论：

> 我认为，回归祖国的运动不能不成为叛逆祖国的战斗。老一辈虽然强调自己是日本人，实际上他们对此抱有最深的怀疑。我对于是日本人之类的话既没有强烈的认同，也没有强烈的怀疑。年轻人也如此。因此，与老一辈之间就出现了裂痕。我虽然是中学老师，但是最反对“众所期待的人物形象”，反对没有国家主义观念就是憎恨世界这样的想法。在冲绳，的确，即使说敬爱天皇就是……国家也是不成立的。关于这一点，孩子们的意识发育得很健全。众所周知：国家的本质就是国民，就是自己。

一九六七年冬，我目睹了佐藤·约翰逊会谈的真实情况，幸喜良秀氏再次痛苦地对我说：现在的冲绳人不相信依靠日本政府能迎来理想的回归日本。只是因为自己看透了蛊惑日本民众的幻象的真实面目才参加回归运动的。“带核回归”这种想法不正是本土的统治阶层一百年来施加给我们的歧视吗？冲绳战的牺牲非但没有得到补偿，反而在战后加深了，这不是再次让冲绳成为最恐怖的牺牲品吗?!

作为不仅美国军部、连本土的日本人都承认了的核基地的

冲绳，不是将重新出现在这里吗？他追问我，而我也无法否认。面对痛苦地保持沉默的我，他说：自己想象中的所谓日本回归，“是以‘和平’本身为依据，将冲绳‘返还给’日本”。

一九六九年冬，为了对在太平洋彼岸进行的佐藤·尼克松会谈表明冲绳的抗议，“创造”剧团将《日本的幽灵》选作第九次公演的剧目。在胡差剧场公演的第一天，即佐藤·尼克松发布共同声明的翌日，演出拉开序幕。剧场座无虚席。观众内心蕴藏的灼热、忧郁，与参加演出的幸喜良秀氏说的下面一番话径直碰撞，擦出黑暗中的火花。

> 在新安保体制下，我们开始了戏剧运动。作为思考并且去实践的人，在一九六〇年代终结之际，有些东西我想写下来。
>
> 在我们成立“创造”剧团时，安保一代陷入绝望的情绪中，孤独感沉潜到我们的意识里。我们在抑郁中为了让自己高昂起来，为了“活着”，开始在戏剧活动中寻求意义。
>
> 直接从本土输入的革新思想只是作为标语口号被吸收到迄今为止的冲绳运动中。在保守派以保守的方式、革新派以革新的方式推进一体化的过程中，我们不断摸索着冲绳人和关于冲绳运动的进步性。我们不会把自己埋没在日常生活中，为了致力于成为具有真正主体性的人，在自己与现实激烈紧张的关系中去追求戏剧，在那里为了确立自己的生而试着去反复战斗。我想，我们的剧目和我们行动

的历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本土，虽然空洞无物的安保斗争在所谓“六十年代斗争”这一口号下向前推进，从本质上来讲，宪法的空洞化凭靠权力在顽强地持续着，并取得了成功。对此，我们要做何反省？要对运动做何展望？把什么作为我们的核心目标才好呢？

在冲绳，尽管热爱祖国、回归祖国的运动在推进，其实很明显，我们必须将运动定位在为了和平而与现实做无止境的斗争之上，我们的运动必须是对迈向军国主义化的日本国家进行的反体制运动。然而，一旦枪口朝向撤除基地的斗争，一个困惑就成为人们心目中的阴影出现在我们中间，这到底是为什么？

为参加全军劳罢工的纠察队，多达一百五十名教师深夜待命。在安全、安静的大众食堂二层大厅，这个导演兼中学教师的冲绳人自己也在待命出发。说起表现阿尔及利亚战争、《安妮日记》[1]和以广岛为背景的《岛》剧目中，常常以战争、抵抗

---

〔1〕《安妮日记》是德国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1929.6.12—1945.3.?）在二战中遗留下来的一本个人日记，真实地记述了她与家人以及另两个犹太家庭为逃避纳粹迫害而度过的长达两年的隐蔽生活。安妮的家庭原居德国法兰克福市。纳粹兴起后，开始对犹太民族进行迫害，安妮全家迁移至荷兰阿姆斯特丹避难。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二日，安妮生日，她收到的生日礼物中有一本日记本，遂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他们的隐居地被德国党卫军查抄前不久。这个不到十六岁就被纳粹夺去了生命的孩子的日记在战后成为人们对那场人类梦魇进行深刻反思的珍贵教材。《安妮日记》的日文名是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德文名是 *Das Tagebuch der Anne Frank*。——译注

运动、大量杀戮为主题，表明在这十年间，他们用亲历的战争现实来丰满那首先作为铅字表现出来的东西。因此，这十年尽管上演一些海外或者本土戏剧，也无非不得不总是通过它们再回到冲绳问题上来。

这些经历让他们获得了独特而有活力的国际主义意识。他们以此为基础，为引爆七〇年代的感情，要上演一部真正的戏剧。这时在他们自己中间产生了一位作者，他把谢花昇的生涯编成剧本，然后大家对剧本展开具体讨论。我理解“创造”的剧目是他们自身的证明，在持续行动的历史的一幕，他们的行动甚至周密到侦查出美军弄破铁丝网偷偷挖掘准备逃跑的地道，从而让自己的活动留在历史记忆中。而刚刚阅读的关于谢花昇的戏剧未定稿，却始终使我的内心翻腾着灼热的漩涡。

那么现在，追溯一下一直贯穿于冲绳战后一代的戏剧和现实生活中的执著，我不能不再次被另一个黑暗恐怖的执著的存在所吸引，并且是在“创造”的执著之光的照耀下、作为影子的实际存在而被吸引。那无非是面对迎面而来的冲绳抗议之声，日本和日本人予以坚决的打压、践踏，其实也可以说，他们是抱着怎样持续扭曲下去、怎样持续歪曲的认识，朝着彻底摧毁冲绳的方向前进的。就像幸喜良秀氏悲观地预见到的那样，十年前就已看透的敌人沿着预先谋划好的轨道轰隆轰隆地猛跑。在最前端，也就是本土人谁都难以回避连带责任的现在，用持续不断的总

量构筑起来的不祥之物，最终从黑暗中突然亮出它的全部，那就是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是对从过去持续到现在的难以逃脱的认识。

就像是完全赤裸裸地、脑袋被强行按在污水中一样，我沉痛地意识到，我必须承认以下事实，必须承认这个简单而且难以抗拒的事实。在那个原本清楚的事实面前，虽然一个劲儿地摇头，却不得不承认，我注意到了它。也就是说，根据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在冲绳，带有核武器的现状仍在持续，成立“创造”的年轻人在亲历战后的冲绳，又在与这样的战争状态共生。冲绳正在以这些年轻成员最为憎恶的形态，在最令人厌恶的状态中“回归”日本，而我们在本土却无法与之对抗。

与全军劳罢工的“支援”募捐有关，冲绳将自己的声音带给越南南部解放阵线的一个代表，对于最终不得不如此认识现状的本土“有良心的”日本人来说，那最为剧烈的毒素难以中和，冥顽不化：“与其接受日本诸位的募捐，倒不如希望他们考虑一下自身的问题。”

“创造”的年轻人在用他们自己的肉体还击破坏教公两法案的运动中，是最勇敢的干将。由于其中主要成员作为初中、高中教师而执著于现实生活，他们才必须成为坚忍顽强的活动家。对于思考这些问题、面对冲绳教育现场的见证人来说，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首先会带来的毒素的味道就无法避免了。文部省鼓足干劲要把冲绳教育办成“本土水平”，二月十六日的

报纸刊出这样的新闻。报道说，等到五月完成四十五年度[1]预算，决定在文部省内设置冲绳回归筹备室。

我们文部省的着眼点，是要将冲绳教育委员会制度从公选制转换成任命制，并且将教育公务员身份加以明确化。最为明显的，是作为一九七二年冲绳回归的印象，不，是作为以前、马上也打算开始的把教育办成“本土水平”的歪曲印象，我看到这样一幅痛苦的光景：坚守宪法回到冲绳的初中老师幸喜良秀氏和高中老师中里友豪氏，他们即便在军事统治下也在抗拒束缚，勇敢抵抗，并不断付出牺牲。作为自由教育的实践家，他们的活动范围遭到极大的限制。如果据此把他们的活动搬到困难重重的戏剧舞台，我眼前就会依次清晰地浮现出这样一副景象：他们的手脚被捆绑着押解前行，他们用异常犀利的目光注视着包括我在内的日本人。关于教育这个“日本自身的问题”，我们到底要让它下滑到怎样的水平？他们重新明确地把这个问题提示给我们，而我们发现捆绑他们手脚的绳索无非是战后二十五年间我们自己搓成的。

他们正是为了和这个绳索抗争才采取行动的。在宪法尚未实施的地方依据宪法坚持教育，而在一九七二年之后，要做好从本土涌向冲绳的“有良心的”戏剧之旅的公演的精神准备，也要做好为贫困观众分摊不利局面的精神准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计划用七千美元的基金来建一座会馆。这的确是一群不

〔1〕 指昭和四十五年，即一九七〇年。——译注

屈不挠的人。但是，为了在一切意义上彻底粉碎他们战后的执著，为了一举阉割他们累积起来的抵抗成果，我们的文部省正在动员一切强权，要鼓足信心大干一场。

（一九七〇年二月）

## Ⅷ　日本的民众意识

我从电视上看了万国博览会开幕式，它营造了几乎所有日本人都积极参加的巨大幻象。一来，我想，就在现在、此时此刻，在冲绳还有很多人注视着同一电视画面，我感觉到他们的视线投向电视显像管，穿过万国博览会全景，一直达到另一个显像管前的我这里。二来，只好说这是个甜美的期待了，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我想看看操办万国博览会的日本人到底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来把握和呈现冲绳的。

那些绝非我主动愿意邂逅的意想不到的景象和关于世界秩序最为乐观的声音，几乎要把我的眼睛和耳朵挠伤了。至少我没有从那里听到任何关于冲绳的讲述。那天清晨，报纸轻描淡写地报道了解雇冲绳基地劳务人员的最新通知，然而电视上围绕着人类进步与和谐为主题的各种悦耳变奏响彻千里山岗，并没出现相关的演讲或者解说。

《圣弗朗西斯科条约》[1]的缔结是割让冲绳的政治家的“国葬”日。那一天，我碰巧逗留在那霸。转播本土电视讯号的播送中心、冲绳电视台没完没了地播放着“国葬”的情景，报道充斥着极尽装腔作势的庄重和悲哀。在某食堂或理发店沉默地定睛凝视着电视画面的冲绳人的形象，至今仍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是很多黑糊糊的相互重叠的背影，是沉默地凝视着的背影。正在凝视转播的冲绳电视画面人的形象，当然无法不让我浮想起众多沉默的、黑糊糊的相互重叠的背影。

我第一次碰触到与冲绳相关的东西，是在那天几近深夜之后。听到邻居家的电视里传来的冲绳音乐，我重又回到电视机前，漫无目标地切换着频道。这时，看到一群人围着低矮丘陵上的一小片洼地，就像观看运动会一样，人山人海。那是一张张地地道道的冲绳民众的面孔。而且奇怪的是，在那人群中，还弥漫着宛如在美国独立纪念日公开举办义卖会的氛围。镜头

---

〔1〕《圣弗朗西斯科条约》在中国一般称《旧金山和平条约》，又称《对日和约》，一九五一年九月八日在美国旧金山（圣弗朗西斯科）签订，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八日生效。它是美、英等国对日本的战争和约。和约由序言、正文七章二十七条、两个宣言和一项议定书组成。主要内容有：日本与各盟国间的战争状态自本条约生效时起即告终止；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朝鲜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附近岛屿的一切权利和要求；日本同意联合国托管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硫磺列岛等岛屿，并以美国为唯一管理当局；各盟国承认日本的主权国家资格；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在日本驻扎或留驻军队的双边或多边协定；放弃对日本的一切赔偿要求。由于这一和约实质是强化了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占领，并且是在中、朝等国缺席的情况下签署的，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八日和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两次发表声明，不承认《旧金山和平条约》。——译注

对准高级专员兰帕特[1]夫妇，给了他们一个特写，又对着观众席上无所事事、老实乖巧的年轻美国士兵，大书特书殖民地的一个好日子。在那片洼地上，两头硕大壮美的牛激烈地对决着。牛的身体异常粗大笨重，动作却惊人地柔软灵活，画面定格在牛灵巧地摔倒、四脚伸向灿烂的天空这样一瞬。

自不待言，攫住我的强烈情感是多愁善感。但是，我也愿意承认，洗掉多愁善感之后，那种体验就像是从贫瘠的土壤中顽强生长出来的灌木，让我难以忘怀。实际上，我想冲着画面中英雄豪杰般的牛（我没有在冲绳的现场观看过斗牛赛，但是逗留冲绳期间我很喜欢读当地报纸上斗牛的具体评论，因而对这些英雄豪杰的名字耳熟能详）大声吼道：不要斗了！不要在营造包括高级专员兰帕特夫妇在内的殖民地居民享乐气氛的镜头前斗了！万国博览会开幕式认为冲绳与己无关，电视在向看完转播稍事休息的日本人展现着独特的南岛风情，就为此，英雄豪杰般的牛啊，别再斗了！

我也知道攫住我的强烈感情有些滑稽，所以没有叫出来。而是回到书架前，读起中野重治[2]的一段文章。文章充满了幽

---

〔1〕莱帕特，是指詹姆斯·B.莱帕特（James Benjamin Lampart，1914—1978），陆军中将，一九六九年二月至一九七二年五月担任美国统治琉球群岛时期第六任最高官员“高级专务员”。——译注

〔2〕中野重治（1902—1979），生于福井县，日本小说家、评论家、诗人。曾任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中央委员，主编机关刊物《战旗》。一九三一年加入日本共产党，任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中央协议员。一九三二年被捕，出狱后发表《不能写小说的小说家》等作品。中野在艰难的生活和法西斯迫害下度过了战争年代。战后重新开始文学活动，1945 年和藏原惟人、宫本百合子、德永直等人发起成立新日本文学会，任秘书长。1964 年因意见分歧被日共开除出党。——译注

默，既对冲绳真正的东西喷涌出一股具有浓厚人情味的敬意，也对践踏冲绳的行为饱含愤怒。我的内心希望那敬意和愤怒激励着我没有吼出声的英雄豪杰的牛，也鞭挞着我自己。“……把牛打翻在地，扭下牛角并将它杀掉。把这种犯罪电影当作拳术片宣传，并且通过了‘映伦’[1]的审查。面对那群残酷无情的人，在那种时候，牛才应该用拳术来自卫。我相信，那样的纪录片对拳术、对冲绳，对原本的人性都是奇耻大辱。”

明治三十六年也曾在大阪举办博览会。我从那次劝业博览会和这次万国博览会中发现一个与冲绳相关的日本人共同的意识构造。明治三十六年，冲绳完成了土地整顿，修正了地租，也就是说，这一年暂时完成了琉球处分。如果在保持多样性的前提下全面审视有关琉球处分的诸多评价，那么，即便评价时常相互冲突，倒能够让人感到琉球处分后它的全貌。因此，姑且不论对琉球无知的那些民众，就是在日本领导者的意识中，他们也认为，在明治三十六年这一年，可以说“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而民众并不掌握准确信息，他们与领导者共同分享着同样的心情。

一九七〇年，云集到万国博览会开幕式上的诸多日本“领导者”就抱着“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的心态。而他们这种“总算松了口气”的安心感，其不可靠的依据就是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领导者并不确切地把握其中直接或间接隐藏着

---

〔1〕“映伦”是“电影伦理规章管理委员会”的简称。——译注

的危机和背叛，并且那些被拣选出来、受到款待的民众大体上追随并顺应着“领导者”，也觉得“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从而气定神闲。这与明治三十六年的情形何其相似。

以这种冲绳意识为背景，在明治三十六年，就发生了一起的确有可能发生的事件，即所谓的“人类馆事件”。据说，在劝业博览会上，学术人类馆内陈列着两位冲绳女性。她们把高丽烟袋和蒲葵叶团扇夹在腋下，坐在茅草屋里。持鞭男子一边称呼她们“这东西”一边进行解说。大田昌秀氏从旧《琉球新报》中翻出冲绳人投稿，这个冲绳人当时就在博览会会场，见证了那个场面。

> 县妇人就像被关在动物的窝圈里，没有进退自由，一举一动都要照着解说员的要求去做，她们在困境中呻吟着。有人却把这当成向社会推介、满足他们各自生活居住条件的口实，委实让人心生怜悯。

一九七〇年的万国博览会上倒是没有开设新的人类馆。但是，万国博览会闭幕式完全无视冲绳的存在，让人联想到甚至连与体制合作的科学家也深感莫名其妙地被淡化、模糊化的广岛体验。日本人的冲绳意识与广岛、长崎体验让他们制造的人类进步和谐的失衡景象暴露无遗。如果真正涉及广岛、长崎体验的本质，或者直面今日的冲绳，那么用不堪一击的想象力构筑起来的人类进步与和谐景象将马上岌岌可危。这种建立在危

险平衡之上的秩序因其自身而将崩溃之端倪大概随处可见。

将近两百名来自冲绳考札高中的学生观看了万国博览会。他们到底见证了怎样的进步与和谐另当别论。不过那些以为"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的人却心满意足。他们以为那是冲绳在迈向欢乐祥和的"一体化"，他们也在万国博览会中享受着二十世纪后半叶版的醍醐赏花宴[1]。然而，餍足的脚下却裂开了洞穴。冲绳高中生宿舍是预制件组装式板房，四面灌寒风，只是名字叫"游手好闲万博××庄"。因寒冷、疲惫而难以入眠的高中生的脑袋里在琢磨什么呢？也就是在这前后，冲绳经济振兴恳谈会的冲绳代表尽管住在更为体面的饭店，大概也决不会安然入睡吧。本土政府和企业虽然多次向冲绳派遣实地调查团，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冲绳代表对此不得不表示不满。那些政府官员和企业家端起架子，傲慢地断言"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对一切佯装不知，用力踩踏着巨大推土机的加速器，让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留在那里。在他们的背后，冲绳人有意无意地都会撞到随处可见的一个个凹坑，因而发出诘难。推土机的轰鸣，或者赞美"人类进步与和谐"的歌声压倒了这些诘难之声，但这轰鸣、这歌声能作响到几时？到了诘难之声渐趋衰弱而终至灭绝的时候了吗？

如果日本人真正试图思考冲绳和冲绳人问题，那么一九七〇

---

〔1〕所谓"醍醐赏花宴"，是指庆长三年三月十五日（一五九八年四月二十日）丰臣秀吉在京都醍醐寺举办的盛大赏花宴，出席盛宴的除了丰臣秀赖、北政所等近亲，还有诸大名，多达一千三百人。歌咏这次赏花的和歌至今还保存在醍醐寺三宝院。——译注

年就应该是至少站在琉球处分以来强加于冲绳的所有重负和牺牲的面前，再次自我拷问“所谓日本人是什么”的年份，是面向我们身为亚洲人未来理想的状态应该因如此发问而获得新的想象力的年份。但是，“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这种无稽之声却像号炮一样鸣放起来。以此为契机，日本民众簇拥到万国博览会，宛若猬集在“人类进步与和谐”这种计算机时代风潮的菊花偶人周围。

面对着播放海底光缆输送图像的电视，沉默的、黑黢黢的背影重叠起来的冲绳人凝神注视。冲绳人的这种凝视，自然而然地彰显出另一番人类馆光景。只是钢铁导管组合、充满数条荧光屏光芒和电子音乐的建筑取代了茅草小屋，也不再是高丽烟袋加蒲葵叶团扇，而是舶来品和土著品的混合。那无非是一幅二十世纪的日本人正撩拨着难以满足的欲望，蜂拥袭来、东跑西窜的光景。

冲绳最清醒的眼睛在凝视着这一切。若是设定如下清晰的视点，从更深更广处发掘冲绳的民众意识，那么它的反光将会不断地给在自己内心发现并且不得不探讨日本民众意识的人以可怕的震撼。就像大田昌秀氏那样，他的眼里充满冲绳独有的、并且借此超越了日本式界限的知识分子的苦涩，他用那清醒而痛苦的眼神凝视着。

概言之，在此提出的两个疑问（引用者注，指“所谓冲绳是什么？所谓冲绳人究竟是怎样的人?”与“冲绳目前所处的事态假设放到本土，大概不会像在冲绳那里那样被弃绝不顾

吧?”这两个对本土日本人及其政府的疑惑）会被认为愚蠢无聊。但事实上可以说，它与“所谓的日本人是什么”这种根本的诘问密切相关。我之所以特意把冲绳从“日本人”这个总括性的逻辑关系中分离出来论述，无论是就冲绳状况而言，还是从弄清几乎从来就没有被认识的日本人本质这一侧面而言，这样做都很方便。

有必要把“所谓冲绳是什么，所谓冲绳人是怎样的人”这样的诘问与“所谓日本人是什么”这样的根本性问题连结起来的桥梁首先当作歧视问题来把握。当然，我们必须来讨论歧视力量的对抗关系，使之受到强烈震撼，并搅起多样的、有活力的漩涡。

一般而言，被捆绑在本土日本人那一端的歧视的纽带是单纯的。如果剥去假面具，一切都将袒露无遗。即便如此，甚至应该说，在那种单纯的形式中，在对冲绳那一端纽带的把握上，存在着歧视冲绳的最为本源性的东西。自人类馆事件之后，在现在的冲绳，经常会碰到诸如“英语是日常语吗”这样的询问。几近荒诞扭曲的“与现实一模一样”的各种各样神话，在冲绳不胜枚举，到处都是。由于本土日本人的无知，简单化的冲绳形象广为传布。自此日积月累的歧视瀚为观止。此外，还故意选择无知的人对冲绳形象加以简单化。不用说，与上述的歧视相比，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歧视则具有更多故意的恶劣品质。

还有两种对冲绳的歧视。一种是因为自己对冲绳形象的认

识有缺陷，有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对冲绳产生歧视。而由于发觉自己对冲绳形象的认识不足并加以弥补，那么自己的精神平衡将被打破，或是由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的时候出现了不相宜的制约，就故意对自己的不足蒙上眼睛、视而不见，从而阔步向前地行动，同样会造成对冲绳的歧视。这两种类型的歧视各自构成日本人本质的结晶面，只是角度略有差异。它们在现实中常常相互重叠，相互碰撞，无可辩驳地呈现出构成百年来日本近代国家民众与权力的面孔。

在姬百合塔（建有该塔的南部战争遗迹呈现出的景观也堪称以本土所有都府县冠名的“塔”之荒野。如果将冲绳战中各自蒙受的灾难按比例来表现的话，那么冲绳县民所建之塔的分量至少应该与所有刻上本土都府县之名的塔的分量相匹敌。不过当然，在这里没有采用数字）前，首相流下了眼泪。如果冲绳战裂开漆黑幽深的缺口，只要投射进去一道意识之光，那么琉球处分之后所有的变形歪曲都将超越仅仅刻在历史上能够作为物质把握的东西，带着为什么冲绳的日本人比本土的日本人更满怀“忠心”这种内化为民众意识的东西，应该构成复杂的层面显现出来。然而就在那决定性的瞬间，首相的眼泪将一切简单化了，那几乎是暴力性的眼泪。从那幽深的裂缝处飘过来的恶臭，实际上无疑就是窥探者自身的恶臭。但泪水化作迟钝厚重的盖子，盖住了那裂缝。

一些冲绳少女被迫参加了冲绳战。就生还的可能性而言，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难以想象。少女的凄惨死去，可以

说是琉球处分之后所有致力于要成为最理想的日本人的冲绳少女涵盖了所有历史渊源的死亡。然而首相的泪水却将其简单同化为抽象、虚构的少女之死。本土的日本人则仿效他，只哀叹一声“无论如何花季少女死在战场上总是令人心酸的”，就泛化了她们的死亡，并以此保护自身，以避免冲绳之毒刺向他们作为人的根源，从而安全稳妥地流着泪水。泪水干了，“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大概也就满不在乎地完成了他们的计划。

在不得不去窥探那漆黑幽深的裂缝时，几乎是被揪着脖领拉扯过去，却在最后关头闪开。本土的日本人对冲绳惯用的伎俩被再次纳入计划，正试图朝着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七二年回归的方向去完成。在这里，也和因对冲绳的无知、因故意视而不见而造成的简单化一样，一百年来阴险毒辣、冷酷无情的日本人在亚洲的生存状态暴露无遗。尽管在侵略并不疯狂的时候，日本人也是以对亚洲人的简单化认识而造成实质性的歧视存在于亚洲的。为死在战场的少女流下的泪水无须等到枯干，就在泪水流着的时候，就清晰地孕育着歧视的种子——对冲绳的简单化认识。

所谓冲绳的战后，毋庸赘言，是战火中的“战后”。一些少壮学者在亲历着这样的战后，去探讨冲绳人意识的理想状态，并试图去充分理解新冲绳人自身。据我们所知，他们的事业建立在几个共同点上。如果把这几个共同点连结起来，那么，大田昌秀氏的“冲绳的民众意识”就与从事“冲绳人意识构造的研究”的东江平之氏的意识重叠在了一起，它们似乎也与不同

领域的冲绳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联系在了一起。虽然从中可以看到一以贯之的学问的方法意识，但是我常常不禁暗自怀疑那是一种简单化的东西。但是现在致力于对“所谓日本人是什么”进行追根溯源，当我接触到那些被重新整理的“冲绳人”的民众意识、意识构造时，我注意到，日本人的民众意识、意识构造正在被清晰地挖掘出来，一百年来，隔着二十七度线结成赤裸裸的歧视的纽带，如果摇动冲绳这一端的纽带，日本本土那一端也将明显摇晃。

东江平之氏分析说：“冲绳人显著的行为模式可举事大主义和自卑这两点。”而自卑或者自我贬低无非就是事大主义的支柱，我们可以选择“空道的人格”这样的说法来理解两者互为表里的特性。

此外，东江平之氏还提出封闭性和“差别意识”这样的命题，并试图进一步把它与对以下的观照和心理学分析联系起来。他说：“对冲绳人而言，弄清初次见面的对象是冲绳出身还是其他府县出身通常来说极为重要。如果知道是冲绳出身，地域差别等等几乎不成问题。一旦知道对方是‘本土’出身，意识上的差别将超过现实的差别。此后，至于那个人是青森县出身还是山口县出身则不成问题。相似的东西总被认为比实际上更为相似，反之，不同之物则被认为比实际上更为不同。”

大田昌秀氏的工作，是通过把视线投向报纸的所有细屑之处，依据事实，或者重返事实的报道现场，来再现异常绵密的冲绳近代史。“其主要目的之一是，在漫步近代冲绳史中来探

索冲绳人的意识和行为模式，来明确它们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大田昌秀氏坚韧不息的工作就是把现代冲绳迄至战后今日的冲绳贯穿起来，精当地揭示出过去丑陋、现在丑陋、将来依然丑陋的日本人的本质。

但是，冲绳知识分子在探讨“冲绳的民众意识”、“冲绳人的意识构造”时，首先就把对日本的民众意识、日本人的意识构造的具体形象亮在我这个本土日本人面前，二者就像是面对的镜子中的影像，又像是影子，恰好被对立放置，难以分离。那当然是一种令人生厌的印象。我内心好像鱼肉冻般凝固起来的日本、日本人形象，也就是作为冲绳的影子、冲绳人的影子呈现出来的日本人形象。大田昌秀氏通过探究“丑陋的日本人”来发出声讨，用极其温和的语言引起了焦躁的冲绳年轻一代的共鸣。

这一百年间，正是在冲绳人的事大主义得以发挥的现场，总出现与之形影相随的日本人——日本政治家、官僚、商人和学者。那仅仅因为与冲绳民众的事大主义相匹配的、有事大主义性格倾向的日本人钻了进来。所谓事大主义，甚至应该说是拉在冲绳人与本土日本人之间的一道绳索。如果说这绳索像从冲绳人的事大主义本性中生长出的植物般活着的话，那么，如同从榕树枝干上垂下的气生根一样活着的绳索，便是在本土人事大主义性格中重新扎根、汲取养分的绳索。

但是，与冲绳人常常意识到自己的事大主义不同，本土日本人以冲绳人的自卑为垫脚石，来找出佯装无视自己的事大主

义的逃避通途。谢花昇所进行的反抗，就是要克服事大主义，是勇往直前地从自卑中解放出来的冲绳人对日本人的事大主义的抗争。在谢花昇辉光的照耀下，正是执念于事大主义和表里不一的自卑，才形成奈良原县知事内心的阴暗。至于他手下的日本小官僚，则更为变本加厉。他们是怎样捅出冲绳民众的自卑，并在上面踏上一只脚，从心理上去适应的？总之，从中可以清楚地看见他们歧视的意图。

虽然没有像谢花昇那样勇敢地反抗，掌握冲绳近代史诸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也在一切意义上都对“事大主义和自卑”那样的简单化倾向进行抗争，以复杂的面孔存在于历史中。他们大多迫于强权，不论希望与否，他们自己都与“事大主义和自卑”捆绑在一起。但是，他们反而去自觉主动地承担这一切，并因此顺利推进自己与本土日本人之间的关系，因而即便在战争期间，他们也不得不选择被视为御用学者的生存方式，那却是简单化的“事大主义和自卑”、冲绳岛的封闭性、对本土日本人的“差别意识”等无法包容的，它具备用普通的方式难以处理的巨大复杂性。

关于“空道的性格”的“空道”，有这样的记载：“康熙年间动乱之际，冲绳使节则手持递呈清帝和靖南王的奏章，并且平时琉球使节也手持盖有琉球王国之印的白纸，以便紧要关头无论跟哪一方都能够通融。这张纸，即称为‘空道’。冲绳人的境遇是没有资格谈大义名分的。为了生存，冲绳人要忍辱负重。”“侮辱本县人要适可而止。把这种人驱逐到别处！”当然，

受到威胁的年轻的伊波普猷对这种“空道的性格”有足够清醒的认识。那清醒的意识是对美军占领下的冲绳的寄托，并将其延续到自己最后的工作中。不过，出现在最近公开的比嘉春潮氏年轻时的日记中的伊波普猷，毋宁说对本土日本人和强权持有远远超出他们视野的自由展望，亮出反以“空道的性格”为武器的倔强神色。他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最终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想象“御用学者”的结构能够容纳他。相信伊波普猷作为御用学者能被笼络的本土的学者官僚，他们才是闷在事大主义和自卑的框框中，完全任由自由的想象力枯萎而死。

这种天真的日本官僚，现在还可以举出仅仅挂名、由真境名安兴氏著的《冲绳一千年史》的合著者高仓龙治。他是那霸地方法院检察官。他写的序中有如下一段话：

> 余亲见英明仁慈的东宫殿下于去年辛酉春巡幸欧洲。途中屈尊鹤驾莅临本岛，亲察民情，皇恩厚宠，让人无不感激涕零。……夫纪念巡幸，报宠恩万一之途虽多，然余以为，应以阐明历来等闲视人之冲绳千年沿革、使县民精神觉醒、讲保本返始之道为第一要义。

如果说起那次所谓东宫巡幸是否令所有冲绳民众感激相迎，这里有反证。有一位出身久米村、自称是蔡家十八代的冲绳传统艺人，他儿时曾与父亲一起观看了那次巡幸。归途中，父亲说了句“裕仁到底是有身份的人啊”，至今他也没有忘记。

就像尚家王族拥有威严一样，本土的王族也有与其地位相称的庄严，那无疑是冷静的评论。在天皇制国家，刚刚提及的本土出身的检察官，与这位冲绳父亲谁更具有事大主义，已经一目了然。与自己试图要去唤醒的冲绳县民相比，检察官哪怕连异常有限的自由的想象力也没有。他一定想不到，自己只是相对地领承了恩宠之光，而民众则看到了那恩宠之光所照耀不到的对面。

我在最初的冲绳之旅中有幸邂逅大田昌秀氏和东江平之氏。这两位优秀的学者是曾经在冲绳战中艰难战斗的十五岁或十岁的娃娃兵。如何让这种体验跟年轻一代连结在一起？他们首先把这个问题置于根本处，对冲绳的近代史与今日之现实进行分析。在追溯历史、从心理学的深度对冲绳民众的意识构造进行挖掘的过程中，首先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果敢地砍断自己与事大主义的瓜葛，砍断与事大主义有干系之物的瓜葛。

大田昌秀氏清晰地表明了自己坚韧的意志。他说："我认为很普通但又重要的是，对照我们过去痛苦的经历，要充分领会参与国政的原理及其内涵。在将其化为血肉的基础之上，要不断努力，尽可能有效地利用现实政治。"与此同时，结束自己在本土的研究生活，回到一片废墟的故里。等待着他的，大概是与那些为了让冲绳作为不断提起异议的存在而拒绝在回归之前参与国政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以及跟那些完全没有冲绳战体验、更为年轻激进的一代激烈讨论的日子。其间不乏正面冲突，甚至也有断绝关系的，但是所有加入讨论的人都毅然决然

地远离以事大主义为特征的意识构造，他们是新“冲绳人”，是新亚洲人。

我按照“本土日本人＝我们”的公式做了置换，反复回味着刚刚提及的大田昌秀氏的一番话，我感到它正是参照了过去可耻的经历。然而毋宁说，要充分领会“参与国事的原理及其意义”，必须将其化为血肉则又是我们的课题。然而，我们恰恰是持这样一种意识构造的民众：我们无法从根本上克服事大主义和自卑感而成为新日本人，我们难以主张，面对自己的政府仰赖新的事大主义将责任推诿给冲绳的现状，我们闭上了眼睛，并且遮盖住面孔。

如果回到我的个人成见——它带着深重怨恨渐渐在我的耳边回响——上来看，“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悲惨的渴望是立足于那种自觉的意识构造之上的，但它并不是出于伦理上的要求向我提出的命题。因为克服“冲绳的民众意识”、“冲绳人的意识构造”，用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视野展望亚洲人的想象力，与被日本的民众意识、日本人的意识构造束缚住的自己的想象力之间有着令人颤栗的落差。如果充斥着万国博览会上的计算机遍及所有神圣的角落，我们就能够被赋予足以填平这个落差的新启示吗？

（一九七〇年三月）

# IX “本土”实际并不存在

我意识到，在此写就的以冲绳为核心、作为日本人志在自我检验的札记，尽管渐渐地在逻辑上趋于终结，但尚难以封笔。或许在内心我将一直打开它。本来在我内心，是从追问“所谓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把自己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开始的，那么现在怎样？你那无力的胳膊推着沉重的蜗牛车向前走了多远？我无法不感到内心的动摇。对此，我做了无效的中期报告，诉说自己的视界越发被暗淡的薄雾遮蔽了。但是，我希望把这种追问当作自己内心的永动体永久留存。那种追问就像无法后退的齿轮一般，径直从旁侧抡进我那纤弱的大脑和肉体，因而我愿意把它当作语言的橛子记在这里。

《冲绳救济论集》中收录的东京报社记者的游记虽然稍微嫌驳杂，却能触摸到冲绳的现实，让人感到它有一种直逼人性

根源的洞察力。下面是其中的一节。

孤岛苦是什么?

——你还活着吗?

——还活着。

——切断你的动脉、去中断血液循环!

我并不想把这种语言理解成肤浅的比喻，相反，我认为它是驱动想象力的源泉。然而实际上，就如同反复切断自己的动脉、中断血液循环一样，我致力于去思考刚才的命题。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之后，在冲绳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日本人的自私，与他们在以冲绳和冲绳人为核心思考问题时想象力的贫乏，其诸种实例越发频繁地显现出来，在我的视线里堆积如山。

比如在冲绳参与国政的问题上，冲绳现场或本土从事研究的冲绳学者各自深入冲绳和日本全部近代史及其未来图景，在相互激烈的正面冲突中进行着他们的探讨。而本土政治家是在通晓这些冲绳研究的基础之上来发挥他们的想象力、来思考参与国政的课题的吗?难道他们不是赤裸裸地唯自私卑劣的本土主人之命是从、在愚弄冲绳的国政参与吗?

三月中旬，本土突然宣称：为了冲绳参与国政而向国会提出法案陷入了令人担心的状态。并解释说，原以为首相的倡导能够打响迅速实现冲绳参与国政的第一炮，却因调整其自民党

公认候选人（!）而难以展开，目前正采取拖延对策。在冲绳现场以参与国政为中心课题来深究冲绳存在的历史及其本质时，我们的保守党连只言片语的答复也没有，他们只是观察着党内主人的脸色，在张罗算计着提出法案的时机呢。

不过，他们要首先根据反应来确定自己对参与国政所持的保留条件，这也无甚例外。在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上，有人说："在彻底回归之前，不仅涉及冲绳问题，针对冲绳代表议员的所有议案授予表决权都有可能触犯宪法"，即使是在党内的宪法调查会上也有意见说是"宪法上有疑义"。

数日后，自民党政调审议会故意提出对"以冲绳居民免租税负担为理由"的异议，不过中期报告指出：承认冲绳居民参与国政的特别措施法案已成大势所趋。报告说，等出访中的党内实力人物回国之后，召开政府·执政党首脑会议，总结思路。经过与此相伴的"党的实力人物（!）"这种并非意在冲绳的自私的迂回，是要装模作样地让一连串的资金借贷工作由冲绳人自己处理，而最终，冲绳参与国政的问题则由自民党及议会来决定。很显然，在整个过程中，发自冲绳的声音不仅是次要的，而且实际上，没有任何人对宪法进行认真的逻辑思考。

对冲绳民众而言，此前姑且不论，自此以后日本人议会上更为直接表决的"所有议案"都将是"冲绳关系"，一切都将关涉冲绳及冲绳人。然而即便不如此具体地展开问题，现在冲绳的实际状态就没有触犯宪法之虞吗？宪法就没有疑义了吗？关于冲绳参与国政，自民党政治家实际上在恣意愚弄程序的同时，还滥用宪

法之名，这时他们不会因为廉耻心而双手发抖吗？难道他们没有丝毫的道德想象力（moral imagination）——这是去河内旅行的美国人苏珊·桑塔格发明的用语——吗？我原本是以日本人的名义，把那沉重而漫无目标的愤怒的声音与他们联系在一起的，而当腥臊之风从那里刮过来时，我就垂头丧气了：那愤怒的声音莫非只是朝着我那可憎的灵魂深处发出的？

为了强化这种印象，报纸还报道说，在庆良间列岛的渡嘉敷岛上，那个因强制冲绳居民集体自杀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男子——无论怎样保守地说，至少在美军进攻时拒绝在阵地上收容居民，把以前来劝降的居民为首的几个人当作间谍处以死刑则是确凿无疑的。在那种情况下，明显招致引发“被命令的”集体自杀这个结果的守备队长——和战友（!）一起，为了出席渡嘉敷岛的追悼会而前往冲绳。想起这个昔日守备队长在一则新闻中曾说“如果有机会，我想再去一趟渡嘉敷岛”这句话时，我感觉自己身体的幽深处就像被一股近乎窒息的力量猛抓般难受。

如果有机会。这个壮年日本人推断：正是现在，机会来了。于是，他降落在那霸机场。我并不愿意因为自己没有直接采访他，就对这个有着怪异体验的人的个人秉性进行怎样的推测。毋宁说，他个人是无足轻重的。那大概应该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想象力问题来把握，是致力于挖掘出横亘在事件深处的课题。想象力的契机则是语言。也就是说，如果有机会这样的语言。一九七〇年春，一个男子在想，二十五年来，他反复

在谋划如果有机会，正是现在，机会来了。他是在怎样的幻想鼓舞下前往冲绳的呢？他的幻想是在当今普通日本人怎样的道德想象力的母胎中孕育的呢？

大概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如果人不经常让自己的记忆更新复苏的话，无论那种记忆如何讨厌、恐怖，其具体本质的分量都将逐渐减轻，当他试图尽可能迅速并完全地将令人讨厌的记忆变成舒适惬意的记忆时，尤其如此。他不仅在撒谎欺瞒他人，也在对自己撒谎。这种寡廉鲜耻的谎言和自我欺瞒，充斥着多少诸如“冲绳战记”之类的东西?!

例如在美军包围中，不论是军队，还是遭到军队抛弃的冲绳民众都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在那种情况下，军人二话不说就去强奸素不相识的冲绳妇人。时隔二十年，这位军人滥用感伤而庸俗的形容词，把自己的强奸行为自行描绘成极限状态下瞬间的爱。他们不仅将她们弃绝不顾，反而把应刺向敌人的武器倒过来，赤裸裸地实施卑劣的强奸。起初是欺骗自己，接着是从容易受骗的到多疑的人，他一再说谎歪曲事实。于是某一天，他发现，包括自己在内，无论在谁的眼里，那确凿无疑的强奸行为都被置换成了美丽的瞬间的爱。受害的冲绳妇人在冲绳现场声讨道：“不，那就是强奸！”但他是不会靠自己迟钝的想象力去理解出现在自己眼前的谴责的声音的。

庆良间集体自杀的责任者大概也在不断地反复试图如此欺瞒自己、欺骗他人。但作为人要为深重的罪孽赎罪，他还是希望想方设法堂堂正正地活下去的。他依靠日渐稀薄的和歪曲的

记忆将罪孽加以相对化，接下来，为了给自己撬开辩护的余地，又不遗余力地篡改过去的事实。“不，事实不是那样的。”实际上，本土任何人都难以忘却在冲绳犯下的罪行，所以在日常市民化生活中，这种立足于一九四五年事实发出的反驳声是传不到他的耳朵里去的，因而，意欲立足于一九四五年的情感和伦理而发出的声音只能在沉默中渐趋衰弱。也许正是谁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内心唤起一九四五年，在那样的潮流中，他那欺瞒的羽翼才渐趋丰满起来。

在本土，机会来了。于是他虎视眈眈地瞄准冲绳，看什么时候机会来临。他梦想在冲绳乘进入渡嘉敷岛之机蓄意篡改一九四五年的事实，让它彻底改头换面——以突破这种难关开始，来完成他长年的企图。面对他，有声音说：“不，那可不像你主张的那样轻而易举。那是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父母折断木柴打死孩子的事。而你们这些从本土来的全副武装的守备队不去流血就轻易投降，然后回到二十七度线那边追究不到战争责任的地方，却摇身一变又成了善良的市民。”他则幻想着：这种声音即使在冲绳也已经听不到了吧？并且直到那时，他仍然在继续幻想：时隔二十五年，刽子手和幸存者再会时，是否有可能甚至沉浸在甘甜的泪水中就此和解了呢？不过对清晰记得在渡嘉敷岛实际发生的情形的人来说，那一切大概都是不堪正视的被扭曲的幻想。然而他却耽于这种自私的一厢情愿的幻想，没完没了。如果有机会，他在期盼着那样的机会。而正是现在，他认为机会来了。

日本本土的政治家和民众把冲绳和冲绳人打翻在地，试图粉碎他们提出异议的声音——是这样的机会来了。对一个战犯来说，他为什么就不能以自己的方式来把冲绳扭倒在地，并碾碎基于事实的抗议之声呢？像渡嘉敷岛的“土著民”[1]那样，他们在接受集体自杀命令的时候，不是比自己这个年轻将校更为驯服，更为平静，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吗？当一个日本人这么考虑的时候，我们的确亲眼看到，在一九四五年的渡嘉敷岛上，具有怎样意识构造的日本人是怎样将人逼到集体自杀的绝境的，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决断正在以完全相同的形式重新再现。

那些缺乏道德想象力的人犯了罪，却一错再错，还进行自我正当化，他们带着虚假的被害意识，并且在此基础之上，抱着不可思议的倒错的使命感，把离奇的恐怖当作警醒自己的东西。汉娜·阿伦特关于艾希曼审判的书我在此前曾引用过其中一节，该书收录了艾希曼自己的主张。带着一种“昂扬感”，艾希曼说：

> 大约在一年半之前（即一九五九年春），我从一位从德国旅行归来的朋友那里听说，一种犯罪感正折磨着部分德国年轻人。……而犯罪情结这个事实于我而言，说起来

〔1〕当时军队内部称呼冲绳住民为“土著民”。“土著民”是用来称呼南方殖民地住民的语言，带有“不能信任”这样的情绪。参照《独立混成第15连队本部阵中日志》，收入日本防卫厅战史室资料《冲绳战资料》。——译注

就如同载人火箭首次登月一样，是划时代的事件。这个事实是以此为中心众多思想结晶的核心。当知道搜查班向我步步紧逼时，就为此我没有逃走。德国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结束关于德国年轻人之间罪恶感的谈话之后，我以为再也没有逃匿的权利了。这也是在调查开始时我以书面形式……建议在公众面前判处自己绞刑的理由。这是我为了消除德国年轻人内心罪孽的负重而尽的分内义务。因为毕竟对于此前战争中的诸多事件和父辈的行为，这些年轻人是没有责任的。

料定机会来了，昔日的守备队长降落在那霸机场。不过，他遭到了冲绳年轻人的责难，并且在意欲前往渡嘉敷岛的码头上，被拒绝搭乘渡轮。其实，他大概理应像艾希曼站在以色列法庭上一样，在冲绳法庭接受审判。然而长年以来，冲绳人虽然愤怒不已，却表现得很平静，并没有将他强行拉走。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去自由地想象这样一幅光景：让一个日本人站在虚拟的冲绳法庭上，从他嘴里发出上面引用过的艾希曼的话，将德国置换成日本，我们可以痛苦而自由地详尽描绘出这样一幅让人作呕的光景：他会带着“一种昂扬感”说，他很愿意为消除日本年轻人内心罪孽的重负而尽分内义务。

充斥着这个法庭的比以色列法庭上的更为荒诞，因为一般而言，实际上，“日本年轻人”内心并没有背负罪孽的重负。就像阿伦特说的，实际上当不作恶反而有罪恶感时，会予人以满

足感。这个昔日守备队长在尽分内义务时，实际上（相信）他是什么坏事也没做的人的那种伪罪恶感就能够被铲除。“日本年轻人”仿佛在对冲绳发慈悲，认为只要对其加以补偿就万事大吉了，一副神清气爽的表情。他们用一张张天真烂漫的面孔看着冲绳，浑身洋溢着纯真自由的活力，不去体味那曾经切实感受到的罪孽的苦涩，大概想以此来获得心灵的安宁吧。就这样下去，直到将来，在他们新一代的内心，歧视冲绳的复苏势头将无论如何也无法得到控制，不是吗？

一味地想着如果有机会，不断瞄准以冲绳为核心的逆转机会的，不止那个渡嘉敷岛的昔日守备队长一个人。实际上，的确为数甚多的日本人都是这么想的。毕竟对于此前战争中的诸多事件和父辈的行为是没有责任的，大部分新一代人正在追随着这股潮流。在现在年轻一代的道德想象力的世界，看看围绕在日朝鲜人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吧。看看那些极为普通的糊涂的高中生殴打朝鲜高中生的实际情形吧。他们在莫名其妙的使命感和“一种昂扬感”的驱使下，甚至连纯真的廉耻心都丧失了。这些事情与此前战争中的诸多事件和父辈的行为完全没有区别，当看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罪恶感、有可能重蹈覆辙的样子时，仅仅去铲除他们那伪罪恶感，却不去努力催生他们道德想象力中真正罪恶的种子，不就等于在重新一点一点地构筑迈向大规模国家犯罪的错误结构吗？

要碾碎冲绳无止境的抗议之声，不但要装作听不见，而且还要培养听不见的耳朵，那不是同样在部署实施国家犯罪吗？

在佐藤·尼克松共同声明之后，我们政府所进行的工作和宣传正在赤裸裸地朝着那个方向迈进。由于反复声称“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这种咒语姑且不论冲绳的罪恶感、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它不仅要碾碎冲绳的抗议之声，甚至要覆灭“冲绳”本身，这实在是从根本上具有完全破坏性的恐怖的咒语。

啊，三味线的弦断了。真没想到。噗哧哧哩。大和与冲绳民族之缘，中断的弦啊。

战败翌年之秋，在折口信夫追忆冲绳的文章结尾，他激愤地说道：“随着冲绳风土人情的毁灭，综合到组舞中的音乐、舞蹈和戏剧也消亡了。”这是基于错误的推测而发出的感慨。冲绳的音乐、舞蹈和戏剧被顽强地守护着，并且是由民众自觉自愿地去做的。从即兴喷涌而创作的表演艺术到组舞完成的样式，其中每一个层面都没有灭绝。这无非是冲绳民众在用自己的双手来守护着。即便在反抗土地接收的现场，三味线音乐与即兴琉歌所蕴含的内发性也始终洋溢着活力，而大和民族并没有为它的复兴做什么。

也许毋宁说，在关涉折口信夫敏锐洞察的最关键之处，大和与冲绳民族的因缘之弦果真噗哧一声断裂了。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就像断了的三味线一样，大和与冲绳民族的因缘之弦在根本上是断裂的，而且也许应该断裂。因为在现在全然反历史的定位中，坦率地说，我们有理由怀疑：在挤满美军基地的冲

绳，在军事统治下过着使用美元的生活的同时，却执拗地守护着冲绳艺术的行为中，不就包含着对占领军的严正拒绝吗？不就包含着对大和民族的巧妙拒绝吗？

我想起收入《冲绳的母亲——她们的生活记录》一书中的一段插话，它提出了普遍性的追问，远远超出插话的界限。它讲述了这样一段场景：一个在本土纺织工场就业、不得不与歧视进行斗争的年轻女工回冲绳省亲之后，面对新的日复一日的斗争，她回想起过去。在第一次婚姻中，她因为不孕而遭到休弃，后来成为一位有五个孩子的教师的继室。冲绳战中，丈夫被动员到南部前线，她则留守家中，不得不一个人伺候年迈的婆婆，照料孩子们。为了躲避空袭和炮击，她们一家藏身于龟甲墓中。

> 就这么过着，有一天，美国兵突然来了。当时的情形至今也难以忘掉。奶奶突然从墓场里出来，突然唱起唐船道伊[1]：
>
> 三啦一恰噶思一啦（意思是，三郎怎么办？是混乱之际的戏谑用语），瓦啦宾恰——矛——来（孩子们，跳起来吧）！

---

[1] 唐船道伊是一种冲绳民谣。所谓“唐船”，是指冲绳的王府时代（15世纪至1879年）与明、清进行贸易时使用的船。——译注

就在田间狂舞起来。

那霸民谣《唐船道伊》以人们的喊声为开头，他们噌地冲向码头，向历尽艰险、从中国漂洋过海而来的唐船打探亲友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歌词的意义与老妇的激情舞蹈似乎没有必要完全吻合，一一加以牵强附会。在战火中遭到日军的离弃，而在异常强大的敌军面前又不得不投降，穷途末路之际，边歌边舞的激狂老妇就是以这种方式来拒绝日军和美军、在作为冲绳民众的自我表现中燃烧释放所有情感的。

也许会有声音说：你也太夸大其词了。但是，你真能想象得出一个老妇用无论是本土的哪一种方言唱着呼喊“孩子们，跳起来吧”、在庞大的占领军的武器面前狂舞的情形吗？如果难以想象，大概我们必须承认，在这位无名的冲绳老妇与我们之间，横亘着一条难以逾越的幽深鸿沟，对面狂舞的老妇首先就在巧妙地拒绝我们。日军在战火中将老妇抛弃，美军在战场上让老妇投降。然而连结两种强权的所有要素无非就是我们，也就是今天的课题，都正在被她一一甩开、抛弃。有谁真的能让这位狂舞的老妇屈服吗？

作为冲绳民众意识构造的一种形态，人们常常提起它的“中央指向性”。这是历史上从本土强行进入的强权的要求。而渴望摆脱歧视的人们，也自行选择中央指向。面对最底层民众，强行要求中央指向的强权暴力做了些什么？在大战中以重庆为中心活动的日本反战同盟发布的一份教材中有极为具体的

记述。面对为数众多的冲绳士兵，前线传来这样的声音。

> ……庆良间发生的是事实。有一个叫赤神的当兵家庭为生活所困，没有缴纳税金。村公所办事员前来大吵大闹。“什么，口口声声说没钱，不是有值钱的东西吗？孩子也是日本人，也有奉上效劳的义务。现在国家处于紧要关头，把孩子卖了交税吧！”母亲哭着说：“说的倒是，可他是我那上战场的丈夫唯一的骨肉，还是等我丈夫平安归来再说吧。”“你虽然这么说，还是好好想想。反正我们平民百姓早晚都不得不去效劳的。再说了，为了父母，孩子不管多苦都要尽孝，父母当然也有让他们尽孝的权利……”最终办事员说服了母亲，让她决定卖掉孩子，所得金钱全部作为税款收缴上来。那位年轻的母亲后来沦为那霸街头的妓女。

稚拙的叙述口吻反而让人难以质疑它的真实性（这让人想起已故古坚宗宪氏的兄长，他也说起过自己幼年差点儿被卖给系满渔夫的经历）。毋庸置疑，故事的讲述者、这位年轻士兵以其行动和思想超越了赤裸裸的国家权力强制下的中央指向。那岂不是证据不足的单方臆测吗？在政治宣传下来看人性选择及其思想发展岂不轻率？——如果出现这样的犹疑，那么，为了克服它，只要想象一下日中战争前线对面眺望日本和冲绳现实的人看到了什么，又是怎样看的，就足够了。

反过来说，到底是谁，又是怎样把这位士兵的视野纳入日

本“中华思想”式感觉的框架内，局限在面向日本本土的中央指向性范围内？这位反战士兵接下来又做了汇报，告知大家这样一个消息：昭和十六年八月的八重山反战集会和冲进集会现场想要逮捕发表演说的学生的巡警遭到民众群殴，“不过，冲绳士兵啊，你们的家人饥饿到了不得不把孩子卖作奴隶的地步，但你们的同胞中，也有人已经觉悟到这场战争的侵略性罪恶，并勇敢地参加了反战反军部运动。”

如前所述，以伊波普猷和仲原善忠为首的冲绳先驱知识分子，他们一度成为本土体制的合作者，却超越了战争。即使是这些先驱，在回顾他们整个人生的时候，并且是仔细体察他们自我表现的细节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绝对没有被日本的“中华思想”式感觉所吞噬，即使面对支撑天皇制国家金字塔的中央指向性，他们也摆出一副不放弃相对主义自由的倔强姿态。

战后二十五年，在作为连美军的核武器也包括在内的前沿基地，在与数量庞大的毒瓦斯共处、海港和鱼类被核动力潜水艇所污染、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到越南战争的战争现场，遭到日本及日本人弃绝的冲绳人是如何重新获得痛苦的民众意识和意识构造的，在对日本、亚洲和世界展开敏锐而不抱幻想的展望的中心，他们是如何置身其中的？如果联系起来思考，那么更年轻健硕的冲绳人将以鲜明的多元姿态站在我的面前。

基于对现实的这种认识，人们将怀疑：所谓冲绳人的中央指向性，说起来不只是坠落的幻象而只为本土日本人拥有吗？

例如一方面，人们已经明确意识到：战前冲绳选举中由本土派来的候选人赤裸裸地表现出的中央指向性思维，大概断然不会为现在的冲绳和冲绳人接受。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却又认为，今天也许能再次向冲绳“派去”候选人。我们以为，考虑到有可能存在“中华思想”式感觉的强权幻想，对于本土日本人自身而言，正是去关注这两者间的落差才是今天切实的课题。在此，我不得不重新面对自己迄今为止一直使用的“本土”一词，以及与之相关的二十七度线两侧民众的意识构造、日本强权及其内涵。与“冲绳”这个词一样，我大致同样频繁地使用了“本土”这个词。并且每当写下这个词的时候，我的内心就悄然滋生出反抗，也会膨胀起令人担心的异样感，那与必须附加某种保留条件的欲望相关。所谓“本土”到底是什么？所谓“本土”日本人到底是怎样的人？

“本土”作为一个词，首先必须分成两层意义来讨论。只要前往冲绳的旅行者、滞留冲绳的记者并非过分迟钝，那么一般来说，当他与冲绳人交谈时，他不会吞吞吐吐、犹豫不决地说出“本土”这个词。由于自己不愿使用冲绳——内地、或者冲绳——日本这种暗含对比关系的词语，或是考虑到对方，访问冲绳的人才迫不得已发明了这个用语。那是因为不希望使用“内地”这个词，或者对与冲绳对比使用日本这个词心怀顾忌，也就是说，是抱着消极的动机选用了这个词。因此，与“本土”这个词相对应的实体果真积极地实际存在吗？我自己并不愿意一边质问一边去使用它。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并且因为“本土回归”

这种政治性的决定，从而稀里糊涂地消解掉冲绳——“本土”作为词语的鲜活内容的现在，我想重新致力于去积极把握“本土”这个词的本质。

《冲绳精神风景》一书的作者是位诗人，同时也是位发挥着指导作用的新闻工作者。他深入到冲绳知识分子那复杂而微妙的意识隐蔽处，对其加以捕捉，具有难以掩藏的强烈平衡感。他带着多重曲折感，讲述着“本土”一词的构成、用法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心理之网。

> ……如今冲绳的确处境异常。对其异常性了如指掌而活着的一方，与注视着这种异常性而滋生出某种猜疑的一方，立场迥然有别。在冲绳，称“日本”吗？这在日本是不允许的。于是就想出“本土”。报纸编辑搜肠刮肚、绞尽脑汁想出的名称，不是内地，而恰是本土。
>
> 也许冲绳人会说，战前以来，由于冲绳人的自卑情结，“内地”一词就成了禁忌，最后就改说成“本土”了。这分明是苦肉计。这个“本土”现在已经堂堂正正地在本土通用了。
>
> 去体察对方的脸色的时候，对方越是率直自己就越显得不自然。如果充满善意就更加如此，反而还会成为多余的负担。某人与冲绳人交谈甚欢之际，冒出“在日本……”这样的话。他当然是日本人（?）。听者也自认为是日本人（?），对此毫无怀疑的余地。但如果对方急急忙忙地改口

说“不，在本土”，他则很难堪。

这篇文章本身具体而清晰地揭示出：就词语的质量而言，在“冲绳人”这个词的分量及其可靠性面前，“本土”这个词是多么的无足轻重。深深地沉默、却又不失稳重地微笑着，面对也许是“充满善意”的日本人（?），这个冲绳人如果再次追问：你所理解的本土、本土人，其积极意义究竟是什么？无疑，大概对方这才彻底哑口无言。“本土”一词的积极意义尚未明确，出于消极的敷衍，作为权宜之计被编造出来，继而通用起来，而“本土回归”这个词则正在一点点地蚕食着二十五年来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明确下来的真正的冲绳式存在。

据此，“本土”日本人就像令人担心的异物一样坚持自己的存在。如果去认真倾听他的坚持，就会发觉，它化作不停的抗议之声回响起来，进而就有人要把无法不让人生疑的“本土”日本人的根基的、悬而未决的冲绳课题放置到事先决定的清洁无害的箱子里，收藏起来。也据此，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拒绝去理解植根于冲绳的新亚洲观，拒绝去理解用自己的血清洗的、在尘土飞扬中坚守下来的宪法精神及独立的民主主义感受。

本土在不加选择地继承“日本属于冲绳”这个命题的负面意义、即自己重新接受将日本列岛捆绑到几乎永久化的核基地冲绳的尾巴上这一状态的同时，也要连根铲除这个命题的正面意义，即现在在冲绳被发现的、被承认的、依据经验不断强化

的、持续不断的新亚洲中对日本的展望，并致其枯死。

现在冲绳把核时代所有日本人的死亡与再生的契机转化为现实，把裂开的伤口显示给世人。面对伤口，却视而不见，直到无法后退就僵直在那里——如果大多数日本人根据这种现实就推测“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那么到了那个时候，应该也能够清晰地听到太平洋彼岸传来“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的声音，他们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轻松表情。到了那时，不会也听到一个充满更为切实的愤怒和苦涩的声音在广袤的亚细亚大陆宣告：“日本问题已经了结了”吧？

东江平之氏分析了冲绳人的意识构造，他指出：“‘本土’这个变通语变成通用语，本身就让人不可思议。由于所有人都认为‘本土’是同质化的，以至于要说‘到本土去’，那么意味着要到哪里去并不成问题。”克服了这种陈旧意识构造的新冲绳人，就冲绳、冲绳人的本质，向“本土”日本人提出无止境的抗议，直截了当地教导那些认真倾听的“本土”人：“本土”这个消极性词语中除了包含暧昧的幻想，不存在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如果那些不相信“本土”假象的人从正面受到撼动，恐怕我们“本土”人那虚幻的安定状态就会转瞬即逝。

相对于冲绳的“本土”果真存在过吗？这种质疑的声音立即会引导我们去联想相对于中国的“本土”日本、相对于美国的“本土”日本这种没有实质性意义的语言。当重新反省自己在冲绳屡次使用“作为‘本土’的日本人”这个词的事实时，我站在一个令人窒息的出发点上。作为只是消极地获得的“本

土”日本、“本土”人的日本人，这种认识、也正是这种凹型认识成了最恶劣的绳索，它束缚着重新展望亚洲时那积极的、凸型的、丰富的想象力。

战后冲绳培养出的新人，他们注视着迄至“本土回归”在冲绳现场一步一步展开的一体化过程，主张把冲绳作为不断提起抗议的场所，让它持续发挥功能。对于这些新人而言，消极的“本土”的单纯形象实际并不存在。在眼看着要连带岛屿在内将他们吞噬掉的巨大困难的漩涡面前，他们恰恰要凭借自由而丰富的想象力去理解冲绳、日本、亚洲和世界。也就是说，他们是在整体展望中来理解冲绳那依然流着血的历史伤口的。面对他们的存在及其视线之所及，我希望能常常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若非如此，我就要承认：“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追问本身行将枯萎，变得丑陋；行将腐朽，让人可怜。

虽然在内心我无论如何也不能阖上这些冲绳札记，但那是对战后民主主义和伦理想象力进行思考的线索，它就像螺丝钉一样拧入我那黯淡血腥的内心深处，因而我强烈地需要它。因为渐渐地我也强烈意识到：舍弃它，我自己将被弹射进最为可憎、最为恐怖的摇摇欲坠的虚空。

我从便携式收音机里收听到决定回避冲绳全军劳第三波罢工的报道。无须闭上眼睛，暴风戾雨中的集会与放哨、上原全军劳委员长及其周围人的风采和声音、在他们背后众多参加示威的面孔就都鲜活地浮现在眼前。一个声音说，他们屈服了，

他们肩负着反战重任，独自承担基地劳务人员的矛盾，负荷太重。这里，又一个“冲绳问题已经了结了”。然而我强烈反对这种声音。恐怕我断然接受不了这种意见。他们没有屈服，他们还在用弯曲的脊背继续顽强地背负着充满苦涩矛盾的沉重梁桷。他们的存在也许是在践履劈开日本现状的柴刀这一职责，而作为冲绳人，他们自己依然在为了作为真正的人活着，并执拗地抗争。我通过多次冲绳之旅才体会到他们的信心。

昔日守备队长想要再次拜访引发集体自杀的岛屿而遭到拒绝。冲绳诘问他道：“你是来做什么的？”他的回答是：我是来祭奠英灵的。画报报道说：这位昔日守备队长挤过抗议队伍，乘坐悬挂星条旗的美国民间船只，终于来到渡嘉敷岛，献上了花圈。

“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这种深刻反省的漩涡重新开始把我卷进更深的深渊，且日复一日。虽然我也知道，宪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有脱离国籍的自由，但既然是继续做日本人，那么，用什么方法来结束自己内心的冲绳札记呢？

（一九七〇年四月）

# 代译后记　当内心的法庭遭遇世俗的法庭

二〇〇八年三月二十八日，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清晨。在东京的一位友人家里，当看到电视里在围绕《冲绳札记》引起的诉讼中大江健三郎氏胜诉的画面时，我和友人相拥庆祝，为公理战胜而喜悦。而接下来，大江氏在采访中所表现出的平静——那张脸很难读出笑意——倒让我感觉自己有些滑稽，有些无所适从。因了我的喜悦和无所适从，内心生出想要了解大江氏、了解《冲绳札记》的急迫。

要了解《冲绳札记》，就不得不追溯到自琉球处分至冲绳战乃至战后的琉球·冲绳那段历史。十四世纪确立的琉球王国接受明朝册封，在明朝的海禁政策下从事中继贸易，其时日本处于战国时代。就在日本结束战国时代，从“天下统一”到建立幕藩体制的过程中便出现征服琉球的动向。一六〇九年，萨摩藩出兵入侵琉球。因为萨摩讨伐琉球的真正意图在于通过统

治琉球而获得琉球对明朝贸易上的地位，在对琉球实行禁武政策的同时，极力保密攻占琉球之事，仍然让琉球以独立王国之形态继续存在。这样，琉球一方面沿袭了明朝的册封体制，一方面逐渐被纳入幕藩体制。也就是说，幕藩体制下琉球的地位，是以东亚册封体制的存在为前提建立起来的。就在清朝日趋衰落之际，日本决定通过打破册封关系实现其入侵海外企图。一八七二年日本设琉球藩王，完成琉球所属第一步。一八七四年征讨台湾，制造否定清朝对琉球册封关系的既成事实。次年，强迫琉球国王停止向清王朝朝贡。一八七九年，强行“废藩置县”，改“琉球”为“冲绳”。甲午战后，日本乘占领台湾之际正式“解决”琉球的归属问题。至此所完成的“琉球处分”，使日本迈出走向殖民国家的第一步。

如果说“琉球”会唤起近代以来我国知识人的乡愁，那么在时隔半个世纪后的太平洋战争末期，在冲绳岛上发生的惨绝人寰的冲绳战对于我们来说则是遥远而陌生的，那场战争只让我们记住了凶残的日本，或者依稀还有广岛、长崎的原爆记忆，十万冲绳岛民的血痕不仅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一点点地被抹拭，也为我们漠然视之。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美军为掌握整个琉球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建立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攻占冲绳岛。为了达到尽量迟滞美军进攻日本本土这一目的，日本军队决定在冲绳全力抵抗美军。当时，驻守冲绳的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官下达“军官民同生共死”的命令，军队还下达“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

勇自决”的命令。而冲绳岛民认为成为敌军的俘虏是最为可耻的事，加之军方宣传“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强暴”，并向岛民提供手榴弹，在美军登陆、进攻之际，至此而进行的所有这些准备使得集体自杀一下子成为事实。而在太平洋战争结束后，于冲绳人而言的“战后”，只不过是“战火”中的战后：冲绳又成了贮藏美军核武器的基地，并成为从朝鲜战争一直持续至越战的战场。自琉球处分以来，冲绳不断遭到日本和日本人的弃绝，那里的人们痛苦而执著地斗争着。

在围绕《冲绳札记》的诉讼中，大江氏明确表示，作为本土的战后一代，他在该书中想要阐明的主旨有三：其一，自明治近代化以来，通过不断的琉球处分，冲绳人被纳入日本体制。在这个过程中，彻底的皇民化教育塑造了怎样的民众意识？如何酿成一九四五年冲绳战中的悲剧？其二，随着《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离开本土的冲绳在美国军事政治统治下将继续忍受大规模军事基地的存续，以及由此带来的苦难。其三，在太平洋战争之前的近现代历史中，本土日本人对冲绳一直持歧视态度；战后，本土的和平与繁荣又是以冲绳付出的巨大牺牲为代价的，大江氏在思考：本土的日本人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追问：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并努力寻找答案。这些问题的探讨让大江氏陷入深暗冥晦的精神深渊，陷入瘫软无力和绝望的状态，故而行文处常常出现“深渊”、“无力”、“绝望”等字眼。原因是，那些向冲绳投以歧视目光的、用冲绳巨大的牺牲换来自己的和平、

繁荣的本土日本人，就是自己的同盟、替身，或者是血脉相连的兄弟，甚至就是他自己。尽管属于战后一代，作为本土日本人，他无法自外于那场战争，无法自外于冲绳人的鲜血，冲绳人的牺牲就是对生而受苦的他的惩罚，他被判了罪，他感到苦涩、颤栗、恐怖，但他无法、也不愿意澄清自己存在的无辜，并且发自内心地、真诚地认同冲绳人对自己的拒斥。以自我批判、达成自我认识为契机，他清晰明了地揭示了上述一系列问题，并揭发了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事实。

也正是札记中有关集体自杀的记述，使他日后成了这一场民事诉讼中的被告。尽管其间时隔几十年，内心法庭的审判——无论是就过程而言，还是就其意义而言——尚未终结，他却突然被推上世俗法庭的被告席，无法不让人感到担当存在的荒诞，这或许就是被宣告胜诉后的大江氏面无表情的真正理由？在大江氏看来，自琉球处分以来，以琉球、冲绳民众之死作为抵押来赎回本土日本人的生，这个命题在血腥的冲绳战场清晰有形，并一直绵亘至核战略体制下的今天。只要冲绳的现状还在持续，那么从公共的立场上讲，对于冲绳和冲绳人而言，本土的日本人就罪不可赎，也不存在真正的忏悔。

然而事实上，集体自杀事件的责任人安然无恙地回到二十七度线隔开的追究不到战争责任的日本本土，隐匿在人群中，摇身一变，成了“善良”的市民、慈爱的父亲，直至今天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相反，他们依靠日渐稀薄的、歪曲的记忆将罪孽加以相对化，并不遗余力地篡改过去的事实。比

如，把自己对陷入孤立无援境地的妇女实施的强奸行为置换成“美丽的瞬间的爱”；又比如说，为了不妨碍军队行动，让军队在作战中没有后顾之忧，冲绳居民自行选择了死亡——这样的死不是很美、很壮烈吗？并且幻想着，如果有机会去冲绳，当本土的刽子手与冲绳的幸存者再会时，是否有可能沉浸在甘甜的泪水中就此和解了呢？

还记得德国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二战后在经历漫长的逃亡生涯后，遭到逮捕。一九六一年在耶路撒冷受审时，他建议在公众面前判处自己以绞刑，说，这是他为了消除德国年轻人内心罪孽的负重而尽的分内义务。大江曾经想象过这样一幅光景：让一个日本人站在虚拟的冲绳法庭上，从他嘴里发出艾希曼说过的话，将“德国”置换成“日本”。之后连他自己都觉得这幅画面令人作呕。理由是，冲绳虚拟法庭上的守备队长是相信自己什么罪孽都没有的；而另一方面，日本年轻人的内心并没有如德国年轻人那样背负罪孽的重负。大江因而担心：战后的日本在重新一点点地构筑迈向大规模国家犯罪的错误结构。而只要看一看二〇〇八年八月十五日那天在靖国神社反对大江一案审判结果的签名活动的火爆场面，就可以想象，有多少日本国民因为无知、或者装作无知所置身的可怕险境。

让我们再回到那场官司上来。二〇〇五年八月，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味间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以及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岩波书店和大江健三郎，认为《冲绳札记》中有关军方强令民众集

体自杀的表述是“虚伪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该书作者大江健三郎以及岩波书店停止发售，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精神损害补偿。

其实《冲绳札记》中根本就没出现集体自杀事件责任人的名字。起初，大江是通过上地一史写的《冲绳战史》和冲绳时报社编的《钢铁暴风》这两本书了解到关于在冲绳战中发生的集体自杀的详细情况的。他原本打算引用《钢铁暴风》中的相关记述的，但考虑到其中出现有赤松的名字，最终决定放弃。在大江看来，个人无足轻重，只有将其作为一个普通日本人的想象力问题来把握时，才能挖掘出横亘在事件深处的课题，而这个课题就是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皇民化教育渗透到冲绳的国民思想——日本军第三十二军强加于冲绳民众的“军官民同生共死”的方针——列岛的守备队长这种纵向构造，它的形成及其运作形态。如果说置于该纵向构造顶端的守备队长抗拒上级的命令，去阻止集体自杀，从而避免了那场悲剧，大江则认为有必要记录下他的名字。然而守备队长只是谨守军纪，认真执行命令，绝对服从帝国命令，驯服地参与“由国家机器所组织的行政谋杀”，充当犯罪国家的代理人——这也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平庸的恶”——最终酿成极权主义之极恶，因此，就不能把引发悲剧的罪责全部放在具体行为者的身上，应该是每个普通的日本人都要接受审判。否则，那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它的危害不在于让历史留下空白，而在于危害人类的未来。

在青年大江的思考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汉娜·阿伦特的影响。阿伦特指出，极权主义无论在哪里实行，它都以摧毁人的本质相始终。艾希曼的罪恶在于他心甘情愿地参与了极端统治摧毁人性的“伟大事业”，毫无保留地将体现这种“伟大事业”的法规当作至上的道德命令，并心安理得地逃避自己行为的一切道德责任。大江氏在文中多次引用她的观点，不仅一样具有洞见、睿智，也同样表现出了在黑暗时代勇于承担公共政治的责任。焦点稍有不同的是，阿伦特系统地探讨了极权主义的酝酿、产生、发展的详细过程，以及极权主义下人的责任问题；作为作家的大江则侧重探讨上述日本极权主义下的纵向构造，和这种构造中人的——而非某个具体人的——责任问题，这是他从耶路撒冷得到的教训。

大江氏从耶路撒冷得到的道德教训还有：对极权主义所造成的罪恶是无法用友情去宽恕、用爱去容忍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刽子手和受害者是无法在泪水中和解的。当然，那罪恶也无法用恨去复仇。

那么问题就浮现出来了：其一，在《冲绳札记》中并没有涉及原告梅泽裕和赤松嘉次的名字，也没有对他们的个人攻击，他们的名誉怎么就受到损毁了呢？其二，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在二战末期，《冲绳札记》刊行于一九七〇年，为什么时隔几十年后以损坏名誉之罪提起诉讼，实属罕见。为什么在此之前不见抗议，而今突然提起诉讼？其三，在创作《冲绳札记》之前，大江氏尽可能多地阅读了冲绳当地出版社出版的与冲绳有

关的书，并走访了冲绳众多的知识分子，其间的所学、所闻成为他创作《冲绳札记》的基本资料，也形成了他基本的冲绳观，也就是说，《冲绳札记》并非首次、也不是唯一揭露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书，那么，为什么大江氏会成为被告？

或许我们可以从这场官司的出炉经纬中找到端倪。战败之初的日本文化界曾发出追究文化人战争责任的声音，此后日本的文学艺术着力于凸显普世性或传统日本美的特性，极力淡化“日本鬼子”的形象。川端康成于一九六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及他在获奖仪式上的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就极具象征意义。说到影视，谁又能否认电影《追捕》不是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中国人的爱情启示录？而我及我那一代人也不可抗拒地领承着《聪明的一休》等作品对我们幼小心灵的滋润丰满。但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责任的清算极不彻底，再加上九十年代经济的持续衰退所造成的不安心理，日本政界渐趋保守“新民族主义”抬头，兴起一股右翼势力美化、淡化或是否定侵略战争的潮流。在这股潮流中，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以反对历史教育中的“自虐史观”、“黑暗史观”为由，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参与编纂新的历史教科书，以此对抗“东京审判史观”。他于二〇〇五年四月呼吁开展“冲绳研究课题”，声称要在“战败六十年之际，揭开‘冲绳战集体自杀事件’的真相”，在否定南京大屠杀、歪曲从军慰安妇的性质的同时，否定冲绳战中日军下达集体自杀的命令。而在他的系列活动中，也出现了梅泽裕的身影。同年八月五日，梅泽裕和赤松秀一即向

大阪地方裁判所提起诉讼，并在二审中出示了日本文部省审查的教科书，认为文部省的立场同样是否定集体自杀命令的真实性。而日本文部省的确于二〇〇七年三月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在遭到冲绳十一万民众于同年九月二十九日举行的大型集会抗议之后，仅仅将“强制”改成了非常具有日本官僚特色的“参与”这样暧昧的字眼，还表示：如果送审的出版社要求撤回该稿，可以维持原来的表述。在自由史观的理论教唆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扶持下，借庞大的三十人的律师团壮胆，就这样，尚未通读过《冲绳札记》的当年的刽子手理直气壮地走上了法庭，将战时国家机器操纵的犯罪行为巧妙地转换为个人的名誉问题。在历经两次败诉之后，原告并不讳言其强烈的政治诉求，声明自己提起诉讼的目的并非仅在挽回个人名誉，而是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敦促通过审查的教科书删除“命令”、“强制”的字眼，重写历史教科书，进而重塑国民的历史认识。作为“战后的民主主义者”，大江氏反对一切凌驾于民主主义的权威和价值观；对国家主义和天皇制持严厉的批判态度——相对于川端康成的演说词“我在美丽的日本”，大江氏获诺贝尔奖时的演说词“我在暧昧的日本”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为保守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的理念，与加藤周一等人结成“九条会”，在全国各地举办演讲会。大江氏何以成为被告，还原到时代脉络中，他在冲撞、挑战、触犯逐渐右翼化的日本社会的道德、禁忌、伦理；他暴露了历

史真相，颠覆了某些规范，强化了某些意识：而这些，是某些权力所不允许的。

一次民事诉讼由此演变成一场政治对决，一场挑衅与护卫历史之战。这也说明那一段历史还没有过去，依然是一段活着的历史，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冲绳札记》在与历史同步，或者说，走在了历史的前面：时至二〇〇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尽管大江氏在两次审判中获得胜诉，他所要揭示的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美国和日本政府依然在用强权践踏着冲绳的心。所谓"冲绳的心"是冲绳的和平祈念资料馆的建馆理念，其内涵是：人性的尊严高于一切，坚决反对一切与战争有关的行为，追求和平，格外珍惜发自善良人类灵魂深处的文化遗产。如今，冲绳人抗议日本政府修改教科书的声音淹没在政治家的私念中，淹没在媒体的欲望中，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无法天天持续，日日抚琴而歌总是可能的吧？但愿冲绳不是在这个意义上才被称为"艺能之岛"、"歌岛"的。

就我而言，是为大江氏的理性、激情与勇气所召唤的其中一个。在人生的彷徨期偶然地、或者又是必然地碰触到这位作家之后，就愈加痛苦，并且从那时起就未能摆脱，也不愿意、甚至害怕摆脱，我害怕痛苦摆脱之后那难以承受的"轻"。我喜欢他那双充满温情而又冷酷的眼神，那眼神直击人性的怯懦、自私与麻木，执拗地阻挠着那些只关心自身利益的人和政权。说到这本书的翻译，我以为它实在是上帝对我的慰安，给了我

这只黑暗中的飞蛾兴奋与追求，在生活的磨难中安定了我的灵魂。同时，我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情。凭自己的日语语言功底，无论怎么努力，面对这部内涵丰富的作品，都不禁无力叹息。我能感受到文字的声音之美、意义之美和文气文体形式之美，却常常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望其体，无法把文义文神文气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是我众多师友的不断鼓励与谬奖让我勇敢地走到了今天。我首先愿意把这本译作献给我两年的东大留学生活以及在那里遇见的众多师友。那两年，尤其是第二年，只要是一出门，无论是上课、去图书馆，还是远足，随身携带《圣经》与《冲绳札记》的情景永远都是清晰的。而那种种生活图景则因为周围师友而变得格外生动。第一次走进我的导师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室，我就开始用蹩脚的日语跟他交流，从那以后，他很少给我说中文的机会，无论在每次论文发表前我如何试图讨价还价。是尾崎文昭先生的鼓励，让我走上了日文翻译的道路。我无法忘记与寺田德子先生相处的点点滴滴，她用她那独有的温柔与严谨熔化了我，让我对日语、日本文化和日本生出更为亲切的感觉。感谢董炳月师兄的信任，在得知我翻译这本书时，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主动帮助联系出版事宜，并且帮助校译了部分内容，可谓一路扶持。我在东大的语伴、中国古典文学博士生荒木达雄君热情、有耐心，是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给我帮助最多的人。每周在东大留学生中心与户田聪子女士的对谈，也帮助我解决了不少问题。好友关立丹君、陈春莲君分别帮我校

对了日文的翻译和中文的表述，她们的严苛让我感受到友谊的力量。感谢刘晓峰先生和偶然相遇的冲绳友人内原英聪君的不吝赐教，让我在翻译冲绳民谣、冲绳官职称谓等特有的文化现象时能做到更为精准的理解。叶彤先生和三联出版社慨然答应出版拙译，让我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自己变得更加严苛，同时也衷心感谢叶彤先生在编辑过程中提出的宝贵意见。我不讳言对挚友张兆林君书法的喜爱，而他遵循拙意为封面题字，自是欣喜。有些人，比如家人、同事，比如闻敏师、黎湘萍师、王向远师、柳书琴师，比如东大读书会的诸位友人，比如李娜、钰淩、晓星、雪鹰、郭蓓等等师友，我并不曾就该书翻译的具体问题与他们谈论过，但一路走来，无论风雨，总有他们的陪伴、批评与鼓励，也兼申谢意。

关于拙译，其中的讹谬，尚希鉴谅，亦望方家匡正，然而我愿承担全部责任。

陈　言

2009 年 5 月 5 日记于一二书房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冲绳札记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著
页数＝１８５
ＳＳ号＝１２４５２５８５
出版日期＝２０１０．０２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